大跃进与大饥荒研究文集（一）

所有论文皆来自网路，排列不分次序时序。

观察电子书屋收藏

目 录

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

李若建

【提要】 本文澄清了有关大跃进以后困难时期人口损失的几个概念,并且对该时期的人口损失作了初步估计,根据高死亡率地区的特点,对国外学者的一些论点提出商榷,研究了人口负增长地区的空间布局,指出困难时期人口损失与大跃进的破坏和自然条件之间存在一定关系。

【作者】 李若建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

研究中国当代人口史无法回避对大跃进以后困难时期的人口研究。虽然早在 1985 年,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先生就提出要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研究(李成瑞,1997),但是国内关于这一时期的研究依然很少。由于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有限,加上统计数据的可靠性有问题,因此使一些人口问题带有扑朔迷离的色彩。本文旨在对若干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1. 损失人口估计

对于当时的死亡人口有不同的估计,而且主要是国外学者作的估计。早期有人估计在 1958～1961 年间有 1650 万人过量死亡,有人估计在 1960～1961 年间共死亡 2300 万,也有人估计 1960 年的死亡人数在 1100 万～3000 万。到了 80 年代中期,随着人口资料的增加,对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死亡人口的估计又有所变化。一种估计是在 1958～1963 年有 2900 万婴儿没有出生,2700 万人过量死亡,有人估计因饥荒死亡人口为 800 万(L. R. 布朗 L. R. Brown,1985),甚至有估计 1960 年的死亡人口高达 4090 万(彭尼. 凯恩 Benny Kane,1993)。目前国内对大跃进后困难时期的死亡人口作的研究不多,有估计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 4319 万人(程敏,1993)。

对于众多的估计,首先要搞清楚几个基本概念:(1) 全部死亡人口;(2) 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3) 因饥荒而损失的人口。全部死亡人口就是在这一时期死亡的人口,包括正常和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是死于饥荒和饥荒引起的疾病的人口。因饥荒而损失的人口包括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饥荒而外流的人口。

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人口死亡率计算,1957～1963 年中国死亡人口为 6424 万。根据班尼斯特(J. Banister)估计数计算结果为 10186 万人,后者比前者多 58.6 %。政府公布数是根据各级统计部门的户籍登记,班尼斯特是根据全国 1 ‰抽样调查的估计,两者都有一定的依据,也有误差,因此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

对于因饥荒而死亡人口的估算,最简单的办法是以 1957 年的人口死亡率为标准,凡高于此标准的死亡率均归为饥荒的作用。用此方法计算的 1958～1961 年饥荒死亡人口分别是:用政府公布数计算结果为 1530 万,占同期死亡人口的 34.9 %;用班尼斯特估计数计算

的结果是 2470 万,占同期死亡人口的 34.4 %(见表 1)。用这种方法估计因饥荒死亡人口,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没有考虑年龄结构。在饥荒发生初期,老弱病残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对人口的年龄结构产生影响。在有大量人口死亡的饥荒时期,饥荒初期与后期的人口年龄结构有相当的差别,因此对死亡率的高低有影响。第二,没有考虑地区差别。中国各地的情况相差很远,例如在 1957 年云南的人口死亡率高达 16.3 ‰,这个水平高于 1958、1959 和 1961 年的全国平均水平。用统一的标准估计中国全国的情况,必然存在较大误差。

表 1　饥荒死亡人口估计

年份	用政府公布数			用班尼斯特估计数		
	死亡率 (‰)	超高死亡率 (‰)	饥荒死亡人口 (万人)	死亡率 (‰)	超高死亡率 (‰)	饥荒死亡人口 (万人)
1957	10.8	-	-	18.1	-	-
1958	12.0	1.2	78	20.7	2.6	168
1959	14.6	3.8	253	22.1	4.0	262
1960	25.4	14.6	974	44.6	26.5	1 724
1961	14.2	3.4	225	23.0	4.9	316

注:饥荒死亡人口根据超高死亡率和年中人口数计算。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1991)》,中国统计出版社。

(2)J. Banister:"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0 No.2 1984

因饥荒而损失的人口可以分为三部分:(1)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2)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3)人口外流,这里指的是流出国外。这一部分人数相对来说不多。比较难估计的是因饥荒而没有出生的人口,因为在困难时期过后有一个补偿性生育高峰。一些家庭在困难时期放弃生育,过了困难时期就多生孩子;一些人在困难时期没有结婚,过了困难时期马上结婚生孩子,造成一个生育高峰。这里用类似估计因饥荒而死亡人口的方法来估计因饥荒而少生的人口,不同的是考虑了补偿生育问题。在 1958～1963 年间,用政府公布数估计少生 2017 万人,用班尼斯特估计数计算少生 3458 万人(见表 2)。这种估计可能夸大一些,因为补偿生育可能延续到 1964 年,甚至是 1965 年。如果把补偿生育期延长到 1965 年,那么在 1958～1965 年间,因饥荒而减少生育人口会少些。

表 2　因饥荒而减少生育人口估计

年份	用政府公布数			用班尼斯特估计数		
	出生率 (‰)	出生率增减 (‰)	出生人口增减 (万人)	出生率 (‰)	出生率增减 (‰)	出生人口增减 (万人)
1957	34.0	-	-	43.3	-	-
1958	29.2	- 4.8	- 314	37.8	- 5.5	- 356
1959	24.8	- 9.2	- 613	28.5	- 14.8	- 968
1960	20.9	- 13.1	- 874	- 26.8	- 16.5	- 1074
1961	18.0	- 16.0	- 1057	22.4	- 20.9	- 1 348
1962	37.0	3.0	200	41.0	- 2.3	- 150
1963	43.4	9.4	641	49.8	6.5	438

注: (1)出生率增减指与 1957 年相比出生率变动的千分点。

(2)出生人口增减指与按 1957 年出生率计算的出生人口数比较多或少生人口。

资料来源:同表 1。

前面已经估计了因饥荒而死亡的人口在 1530 万～2470 万人之间。估计在困难时期以合法或非法方式出国的有几十万人。加上在困难时期减少出生的人口 2017 万～3458 万，可以推算在困难时期中国损失的人口在 3000 万以上。

2. 高死亡率的地区分布特征

困难时期死亡的人数超过平常两三倍，大部分死亡是因为食品不足导致患病而死，1960 年有 5 个省的死亡率超过 40 ‰，一些县的死亡率超过 100 ‰，问题突出的是河南省的信阳地区，全区有 9 个县的死亡率超过 100 ‰（许涤新，1988），当时还有一些地区，如四川、安徽省的一些县的死亡率都超过 100 ‰。1959 年死亡率最高的是四川省石柱县，人口死亡率高达 183.5 ‰；1960 年死亡率最高的是河南省光山县，人口死亡率高达 218.9 ‰。表 3 是 1960 年人口死亡率超过 100 ‰县的名单，由于缺个别地区的详细资料，该表有些不足。有的资料表明，当时全国有 40 个县人口死亡率超过 100 ‰（《中国人口总论》，1991），也就是说还有 7 个县的资料在表 3 中没有反映。

表 3　1960 年人口死亡率超过 100 ‰的县

省区	人口死亡率超过 100 ‰的县								
安徽省	太和	无为	宣城	亳县	宿县	凤阳	阜阳	肥东	五河
河南省	光山	商城	新蔡	息县	固始	正阳	上蔡	遂平	
湖南省	古丈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环江								
四川省	石柱	涪陵	容县	资阳	秀山	酉阳	荥经	南溪	屏山
贵州省	湄潭	赤水	金沙	桐梓					
青海省	民和								

资料来源：各地历史人口资料。

一些国外学者注意到了死亡率的地区差异，指出由于不生产粮食，在那些种植经济作物的地区和牧区，如山东省西部棉花种植区和宁夏南部的牧区的死亡率比较高，并且引用了国外饥荒的分布作佐证（J. R. 麦克法夸尔 J. R. Macfaruahar，1990），有的研究则指出在云南省的边境地区受饥荒的影响比较大（彭尼 凯恩，1993），这些看法都有待商榷。

1960 年山东有 19 个县的人口死亡率超过 30 ‰，这些县基本集中在西北部的华北平原，但是并不完全是棉花种植区（见表 4）。根据宁夏的历史人口资料，该地区在困难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并不特别高，1960 年只有永宁县的人口死亡率超过 20 ‰，而且这个县不是牧区。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观点，选择了农业形态较多，并且在困难时期出现高死亡率的甘肃省做分析（见表 5）。从表 5 中可以看出高死亡率的地区分布并不一定在牧区和半农业半牧业区。还有对 1960 年云南省人口死亡率超过 30 ‰的县的分布来看，真正的边境地区的情况并不比其他地区更加严重（见表 6）。由此看来，决定中国困难时期死亡率高低的并不完全是农业的形态。

表 4　1960 年山东省人口高死亡率县与棉花种植

死亡率水平（‰）	1980 年棉花播种面积占全部播种面积的比重（%）								
	＞10				5～10		＜5		
＞50	惠民				齐河	乐陵			
41～50	平原	高唐	临邑	茌平	沾化	博兴	垦利	寿光	泗水
31～40	郓城	成武	单县	邹平			即墨	无棣	益都

资料来源：(1)《山东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4)》，山东省统计局，1985 年；(2)《中国分县农村统计概要(1980～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年。

表 5　1960 年甘肃省人口高死亡率县的农业形态

死亡率水平(‰)	农业形态													
	农业											半农业、	半牧业	牧业
＞50	西礼	高台	清水	文县	武山	定西	陇西	张掖	临夏	静宁	和政	岷县	定西	
41～50	酒泉	武都	武威	秦安								民勤		
31～40	会宁	东乡										临潭	永昌	阿克塞

资料来源:(1)《甘肃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7)》,甘肃省统计局,1988 年;(2)《中国分县农村统计概要(1980～1987)》,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年。

表 6　1960 年云南省人口高死亡率县的地区分布

死亡率水平(‰)	县城到边境距离(公里)											
	＜100						＞100					
＞50	元阳											
41～50	剑川	维西	丘北	富宁	红河	元江	南涧	云县	鹤庆	易门	峨山	姚安
31～40	石屏	西畴	建水	澜沧	临沧	碧江	寻甸	凤庆	绥江	宁蒗	中甸	牟定
	双江						大理	永平	丽江	通海	禄丰	

资料来源:《云南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8)》,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3. 人口负增长的分布

人口负增长指的是人口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也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负数。有三种情况会导致人口负增长,一是不正常的大量人口死亡;二是不正常的低出生率;三是通过计划生育使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困难时期出现的人口负增长是前面两种情况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中国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全国 29 个省级地区中,只有 12 个出现人口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12 个地区中只有 3 个在沿海地区,其他 9 个在内陆地区。在一些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沿海省份,实际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大部分在省内的内陆县。有 4 个地区连续两年出现人口负增长,这 4 个地区中 3 个在内陆地区(李若建,1991)。由此看来,三年困难时期对人口的不良影响,在内陆要比在沿海更为严重得多。一些沿海地区全省总人口没有出现负增长,但是,这些省份中的一些内陆县市也存在人口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在各类地形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表 7 是部分地区的人口负增长情况,虽然资料还不完整,但是大体上可以判断出总体状态。当时至少有 1200 个以上的县市出现人口负增长,笔者收集到的只有 1132 个县市的人口负增长资料。在这 1132 个县市中,平原地区 320 个,丘陵地区 286 个,山区 526 个,所占的比重分别是 28.3 %、25.3 %和 46.5 %。从数量上来说山区居多,从比例上看也是山区县的比例高,如果以 80 年代的建制(与 60 年代相比建制没有太大变化)计算,55 %左右的山区县、45 %左右的丘陵县、40 %左右的平原县出现人口负增长。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平原县市基本集中在华北平原,这点与中国黄河与淮河流域的自然条件比较差有关,黄河和淮河流域是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地区,黄淮中下游地区就有 170 个平原县有人口负增长的情况,占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平原县的 53.1 %。

虽然资料有些欠缺,但是如果在现有的资料中把人口负增长一年与两年以上(含两年)的县按照地形分类,在出现一年人口负增长的 560 个县中,平原、丘陵和山区县所占的比重分别是 34.4 %、26.8 %和 38.8 %,在出现两年以上人口负增长的 582 个县中,平原、丘陵和山

表 7　1958～1962 年各类地形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县分布

地区	1 年负增长			2 年负增长			3 年负增长			4～5 年负增和		
	平原	丘陵	山区	平原	丘陵	山区	平原	丘陵	山区	平原	丘陵	山区
天津				2								
河北	20	5	3	20	5	3	6			1		
山西	6	4	2		2	3		2				
辽宁	9	20	3	1								
江苏	15	5		9	3		5					
浙江	1	1	4									
安徽	37	15	17									
福建		2	12		1	8						
江西		4	12			2						
山东	19	11	2	22	1		5	2				
河南	36	12	8	23	5	2						
湖北	5	18	26	1		5						
湖南	10	14	12	4	23	23	1		1			
广东	3	4	9			2						
广西	5	8	7		13	22		1	13			
四川	1	1	8		4	9	6	29	42	10	39	41
贵州		12	24		7	19		1	9			
云南		4	29		2	27		2	16			6
陕西						11						
甘肃	4		13	5		17	2		11			3
青海			19		3	10			3			
宁夏	6		5		1							
新疆	16		2	2		1	2					
合计	193	140	217	89	70	164	27	37	95	11	39	50

注:(1) 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没有县市出现人口负增长;(2) 天津、广东、安徽、内蒙古、西藏资料不全。

资料来源:各地历史人口统计资料。

区县所占的比重分别是 21.8 %、25.1 %和 53.1 %。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负增长延续时间比平原地区更长一些。

困难时期的人口问题是一场悲剧 ,导致这场悲剧的原因十分复杂。通过对高死亡率的地区分布与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分布分析 ,可以看出 ,大跃进的破坏、自然条件和灾害几个因素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或许用刘少奇同志当年的一句话概括比较准确 ,就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客观地评价当时的灾害 ,不否认也不夸大自然条件与自然灾害因素 ,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助于让后人了解历史。

参　考　文　献

1.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
2. L. R. 布朗:《经济、社会、科技. 1984》,科技文献出版社 ,1985 年 ,255 页。
3. 彭尼. 凯恩:《1959～1961 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99～101 页。
4. 程敏:《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 ,1993 年 ,364 页。
5. 许涤新:《当代中国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74 页。
6.《中国人口 ·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 ,180 页。
7. J. R. 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398 页。
8. 彭尼. 凯恩:《1959～1961 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88 页、117 页。
9. 李若建:《当代中国人口转变的时空分析》,《人口学刊》,1991 年第 3 期。

(本文责任编辑:　朱　犁)

第25卷　第5期　2001年9月　　人口研究
Vol.25，No.5 September 2001　　43　　Population Research

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

李若建

［内容摘要］　本文对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从整体上认为当年男性人口的损失比女性大，年龄大的人口损失比年龄小的严重。对被海外学者高估的婴儿死亡率和认为女孩在困难时期损失更加严重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作者简介］　李若建，男，1956年生，1987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邮编：510275

1959～1961年，史称困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口遭受巨大的损失。对于这一时期人口损失的研究已经不少，但是相对深入的研究不多。由于当时社会比较混乱，人口资料的登记和保存都有问题，因此至今为止，对当年的人口问题研究，特别是人口损失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估计和推算。由于种种原因，各种估计之间出入很大，有的估计甚至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今天应该有必要对当年的人口问题作一些深入的研究，还历史本来面目。本文旨在从比较微观的角度，对当年不同年龄与性别的人口死亡率作点初步探讨，同时对国外学者的一些估算和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期望对进一步了解当年的人口变动有所帮助。

在困难时期，各地人口死亡率相差很大。例如，根据政府公布的人口资料，1960年全国人口死亡率最低的是上海市，只有6.9‰，基本上是在正常的范围内；死亡率最高的是安徽省，高达68.6‰，表明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①]安徽省人口死亡率接近上海市的10倍。由于缺乏全国性的资料，本文在许多地方是通过局部性的资料分析来重现当时的人口情况，这样的结论是有所局限的，这是读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1　1953、1964与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对比分析

今天已经无法准确计算当年的分年龄、分性别死亡率，只能从人口普查资料中的年龄与性别结构来推算饥荒对各个年龄人口的影响。然而用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时间间隔长，而饥荒只是其中的一小段。例如第一与第二次人口普查分别在1953年和1964年进行，间隔11年，而饥荒主要发生在1959～1961年间。用1953～1964年的整体资料无法准确反映1959～1961年的实际情况。第二，人口普查资料本身的准确性，虽然人口普查资料可靠性比较高，但也存在一定的误差。例如1953年的人口普查中，在中国大陆有840万人属于间接调查人口，这部分人口的年龄是空白，这影响了1953～1964年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可比性。因此用人口普查资料推算1959～1961年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死亡率只能是大体上的描述。

正常的人口死亡率的年龄结构是两头高中间低，也就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死亡率高，中青年的死亡率低。在一般情况下，同一年龄组是女性的人口死亡率比男性的低。根据1953

~1964年间与1964~1982年人口的平均生存率的比较，大体上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在发生大饥荒的1953~1964年间，男性人口的平均年生存率比1964~1982年间要低许多，相比之下女性人口的平均年生存率变化就没有那么大。第二，饥荒对老年人的影响比对年轻人的影响强烈，表现在50岁以上年龄组在1953~1964年的平均年生存率大大低于1964~1982年的水平。老年人受饥荒的影响大，其主要原因是老年人的体质差，难以承受饥饿。饥荒对男人的影响大，恐怕是因为男人承当的工作更辛苦和更危险所致。

表1 1953~1964年与1964~1982年人口的平均年生存率

年龄	1953~1964年		1964~1982年		生存率变化（%）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0~4	99.18	99.97	99.47	99.73	-0.29	-0.76
5~9	99.28	99.66	99.70	99.82	-0.42	-0.16
10~14	99.09	99.73	99.75	99.86	-0.66	-0.13
15~19	99.94	99.63	99.84	99.77	-0.10	-0.14
20~24	99.85	99.47	99.95	99.72	-0.10	-0.25
25~29	99.76	99.40	99.67	99.68	-0.09	-0.28
30~34	99.03	98.98	99.67	99.67	-0.64	-0.69
35~39	98.32	98.66	99.33	99.40	-1.02	-0.74
40~44	97.60	98.42	99.02	99.24	-1.43	-0.83
45~49	96.78	98.12	98.18	99.67	-1.43	-0.56
50~54	95.36	97.26	97.16	97.98	-1.85	-0.73
55~59	93.09	95.58	95.40	96.56	-2.42	-1.01
60~64	90.36	93.24	92.80	94.47	-2.63	-1.30
65~69	86.77	90.12	88.83	91.02	-2.32	-0.99
70~74	81.49	85.17	83.81	86.35	-2.77	-1.37
75~79	75.14	78.81	78.82	80.69	-4.67	-2.33

说　明：(1) 年龄指起始年的年龄，例如对1953~1964年间是1953年的资料；

(2) $\frac{生存率变化 = 1953\sim1964平增多年生存率}{1964\sim1982平均年生存率} - 1$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2 婴儿死亡率

婴儿死亡率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婴儿死亡率的高低往往体现了社会进步的程度，同时婴儿死亡率也是人口死亡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困难时期大量的非正常人口损失中，婴儿占的比重可能不小。可是当年的婴儿死亡率究竟多少，却是一个比较难准确估计的数字。

国外学者班尼斯特对当时的婴儿死亡率有一个估计（见表2），然而这个估计可能偏高。因为在困难时期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在饥荒严重的地区出生的婴儿很少，能生下的婴儿应该受到相对的重视。世界银行对当时的婴儿死亡率也有个估计数（见表3），这个估计比班尼斯特的要低得多。根据部分省的局部资料，江西省在1960年婴儿死亡率是104%，在困难时期是人口损失比较少的省，可以认为江西代表了当年人口损失小的地区的情况，河南是人口损失最严重的地区，基本上可以代表当年人口损失最大地区的情况，根据河南省1960年的人口资料，婴儿死亡率与班尼斯特估计的全国数字接近，由此可见班尼斯特的估计反映

的只是灾荒严重地区的情况。因为全国各地在困难时期人口损失程度的差异很大，所以无论是用河南省还是用江西省的婴儿死亡率来说明全国的情况都不准确，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因此笔者认为世界银行的估计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还有一个原因不能把困难时期的婴儿死亡率估计太高，这就是在饥荒中，许多妇女实际上暂时失去了生育能力，这种情况以饥荒最严重的地区特别突出[②]。因为在饥荒严重的地区人口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使这些地区婴儿死亡数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相应下降，因此这些地区对全国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也就比正常年份小很多。

表2　班尼斯特估计的中国婴儿死亡率与零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年　份	婴儿死亡率（‰）	零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岁）
1957	132	49.5
1958	146	45.8
1959	160	42.5
1960	284	24.6
1961	183	38.4
1962	89	53.0
1963	87	54.9

资料来源：J. Banister. Analysis of recent data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0 No.2 1984

表3　1957～1963年全国及部分地区的婴儿死亡率　　‰

年　份	全国	江西	山东*	河南	贵州
1957			85.3	88.2	
1958		74.4	11.2	74.4	106.2
1959			86.7	137.5	
1960	165	104.0	13.2	276.8	
1961				70.0	
1962		79.8			38.9
1963	90**			88.6	87.1

说　明：* 系0-14岁儿童的死亡率；

** 1965年的数字。

资料来源：1　全国资料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79

2　中国人口．各相关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　贵州省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4）

3　分性别死亡率

根据前面对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饥荒对女性人口的影响小于男性，这里对此作进一步分析。然而国外有的学者持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饥荒对女孩的影响更大，[③]这种看法的依据是有些不充分的。

对于饥荒带来非正常死亡的性别情况，可以利用历年的分性别人口数来粗略估计。在1960与1961两年，中国的男性人口净减少了1010万人，在1960年女性人口净减少了393万人，如果把这些净减少的人口看成饥荒带来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性别比大约是257，也就是说因为饥荒而每死一个女性大约要死2.6个男性。虽然可以认为男性

的人口损失超过女性，可事实上男女人口损失的比例未必如此之大。要特别强调的是，表4中的数据有明显的人为估计痕迹，如1960年人口正好比1959年减少1000万，因此上述分析只能作为参考。有关大跃进时期统计数据的可信程度一直受到质疑，现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的统计数据是经过修正的。如现在公布的当年粮食产量，是薛暮桥和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在浮夸数字上核减出来的，根据什么方法核减没有说明。[④]人口数字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

表4 1957～1963年中国分性别人口数量及其变化 万人

年份	全部		男		女	
	人数	增减	人数	增减	人数	增减
1957	64653		33469		31184	
1958	65994	1341	34195	726	31799	615
1959	67207	1213	34890	695	32317	518
1960	66207	-1000	34283	-607	31924	-393
1961	65859	-348	33880	-403	31979	55
1962	67295	1436	34517	637	32778	799
1963	69172	1877	35533	1016	33639	86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表5 1957～1963年吉林死亡人口与全部人口性比（女=100）

年份	全部人口	死亡人口
1957	107.7	111.8
1958	112.0	111.0
1959	107.7	111.6
1960		110.9
1961	129.0	108.7
1962	111.4	109.0
1963	105.0	107.8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216～219

从吉林省的情况看，在1957～1963年间死亡人口的性别比与全体人口的性别比，除了1961年男性死亡人口明显偏多外，没有明显异常。云南1960年死亡人口的性别比是105，同年全部人口的性别比是98，男性偏多。从吉林与云南的情况，可以进一步验证困难时期对男性人口更为有害。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认为，在困难时期女性人口损失超过男性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发生的大量人员在工作中的伤亡情况是影响死亡人口性别构成的重要因素，因为因工伤亡者以男性居多，导致死亡人口中男性比重相对高一些。

大跃进形成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伤亡事故高峰。如果以1957年全国县以上企业因公死亡人数为100，1958年增加了3.39倍，1959年增加了4.84倍，1960年增加5.92倍。[⑤]有资料显示，1958年全国工伤死亡人数高达5万人，同年因工受伤的有10万人。[⑥]1958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数是5194万人，也就是说这年的工伤死亡率在1‰左右，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如此高的工伤死亡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在狂热的气氛上，不按照科学规律蛮干，导致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在铁路部门，由于大跃进期间的不良作业，行车事故激增。1960年全年的行车事故比1957年增加2.2倍，其中重大行车事故增加2倍，经济损失增加6倍。[⑦]打开新编的地方志，可以看到当年大量的事故记录，例如广东的惠州市当时生产事故频繁，仅在1958年的10～12月就因工伤受伤31人、死亡3人。当时惠州全部职工只有9214人。[⑧]据此估计全年因工作死亡人数占职工总数的10‰左右，这进一步验证当时工伤事故频繁，增加了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当时的水利建设也是事故频繁发生，人员大量伤亡。甘

肃省在大跃进时期动工的"引逃工程"，最多时投人劳动力近17万人，先后逃跑劳动力2万人，死亡人口逾千。[9]

4　死亡人口年龄结构与分年龄的人口死亡率

在分析不同年龄的人口死亡率之前，可以先了解死亡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如果把1958年死亡人口的年龄结构视为正常的话，1960年的情况是不正常的。根据笔者见到的1958～1960年贵州农村和天津市死亡人口资料，可以大体上认为贵州省农村反映的是当时农村的情况，天津市反映的是当时城市的情况。根据贵州农村1957～1960年死亡人口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到，当饥荒逐步来临时，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在死亡人口中占的比重上升。然而根据天津的情况，在饥荒来临时，中青年人死亡人口在全部死亡人口中占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老年人在死亡人口中的比例上升。

表6　1958～1960年贵州农村和天津市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　　%

年龄	贵州农村			天津市		
	1958	1960	变化幅度	1958	1960	变化幅度
0	21.1	8.5	-0.60	16.4	12.9	-0.21
1～4	29.0	10.6	-0.63	13.1	11.7	-0.11
5～9	6.1	5.5	-0.10	2.6	2.6	0
10～14	2.7	3.8	0.41	1.1	1.0	-0.09
15～19	1.9	3.4	0.79	0.9	1.0	0.11
20～24	1.8	4.1	1.28	1.5	1.2	-0.20
25～29	2.1	4.5	1.14	2.1	1.8	-0.14
30～34	2.0	5.6	1.80	2.1	2.1	0
35～39	2.2	5.3	1.41	2.1	2.3	0.10
40～44	2.9	5.9	1.03	2.9	2.6	-0.10
45～49	3.1	6.3	1.03	3.9	4.0	0.03
50～54	3.4	7.1	1.09	5.0	5.3	0.06
55～59	4.6	6.8	1.48	6.0	6.5	0.08
60～64	4.7	6.7	0.43	7.1	6.9	-0.03
65～69	4.1	5.8	0.41	8.8	9.2	0.05
70～74	3.6	4.2	0.17	9.6	11.0	0.15
75～79	2.6	3.1	0.19	7.7	9.8	0.27
80+	2.1	2.7	0.29	7.1	8.1	0.14
合　计	100	100		100	100	

说　明：(1) 此表根据部分县的资料统计作出，表中的农村人口是县人口；

(2) $变化幅度=\frac{1960年比重}{1958年比重}-1$

资料来源：1　贵州人口普查办公室．贵州人口统计资料．

2　天津人口普查办公室．天津人口统计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从1958～1960年贵州农村和天津市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见表6）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在比较正常的1958年，城乡之间的死亡人口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农村的死亡人口中，婴儿和儿童占的比重远高于城市，如1958年贵州农村死亡人口中，9岁以下儿童占56.2%，而天津市这一比重是32.1%；相反在天津市60岁以上的老人占死亡人口的40.3%，而贵州农村这一比重是17.1%。其次，与1960年相比，贵州农村与天津市的死亡人口的年龄结构都有变化，但是变化幅度不同，除了老年人口外，贵州农村的变化幅度均远大于天津市。第三，贵州农村在1960年的死亡人口中，20～59岁的中青年人口占的比重明显上升，

天津市则基本没有变化。第四，无论是贵州农村还是天津市，都是婴幼儿占死亡人口的比重下降，老年人占的比重上升。

云南省的死亡人口年龄结构分布进一步说明了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城乡之间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见表7），与城镇相比农村在中青年年龄组的死亡率高一些。城镇死亡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占的比重高，农村死亡人口中，中青年人占的比重高。除此之外，云南的情况还表明了在大部分年龄组（除了1～4岁组的农村人口之外），死亡人口的性别差异并不突出，这种现象说明在饥荒时期，并不存在明显的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这也进一步说明认为在饥荒中女性人口损失更大的观点未必正确。

表7 1960年云南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 %

年份	全部		城镇		农村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0	9.0	9.4	9.2	7.9	9.1	10.8
1～4	16.2	18.8	15.6	15.4	16.8	18.6
5～9	5.8	5.5	4.3	5.2	6.7	6.1
10～14	2.1	2.2	2.4	2.3	2.3	2.1
15～19	1.7	1.6	2.6	2.2	2.2	2.2
20～24	2.0	1.8	1.6	1.7	2.3	2.0
25～29	2.6	2.2	1.7	1.6	3.1	3.1
30～34	2.8	2.6	2.2	2.5	3.5	3.9
35～39	3.4	3.1	3.1	3.4	4.6	4.1
40～44	4.0	3.6	3.9	4.4	4.7	4.7
45～49	5.4	4.2	5.4	4.3	5.4	4.9
50～54	7.4	5.5	7.9	4.8	7.8	6.5
55～59	7.8	7.3	8.0	6.5	7.5	6.3
60～64	8.8	8.2	9.7	9.3	6.7	7.8
65～69	7.2	7.6	9.6	9.0	5.5	5.4
70～74	6.3	7.1	6.1	8.0	5.5	4.9
75～79	3.7	4.5	3.1	5.0	2.9	2.7
80+	3.8	4.8	3.6	6.5	3.4	3.9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说明：（1）全部人口是10个县市、9个城镇、13个社、队乡典型死亡人口年龄状况，其中男37952人，女36157人；

（2）城镇人口是9个城镇的情况，其中男2459人，女2828人；

（3）农村人口是10个公社、乡的情况，其中男2404人，女2465人。

资料来源：云南人口统计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通过一些地区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比较，可得出结论：第一，在农村饥荒是普遍发生的，因此对各个年龄人口的死亡都造成影响，导致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二，在城镇饥荒只是产生供应短缺，由此而带来营养不良，主要导致抵抗力弱的老年人死亡率上升，对其他年龄组的死亡影响不大。

在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只有河南省的资料可以推算当时分年龄组的死亡率。由于资料的不完备，推算的准确程度不一定非常高，但是从河南的分性别与年龄死亡率来看，饥荒对

男性的影响高于女性，对婴儿与老人的影响比较突出。这与利用人口普查资料、部分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推算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从表8中可以看出，除了0岁、1～4岁两个年龄组女性人口死亡率略高于男性之外，各年龄组均为男性人口死亡率高于女性，基本上符合男性人口死亡率高于女性的客观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在30岁以上年龄组，男性人口死亡率比女性高出一倍左右。河南省在困难时期是人口损失惨重的地区之一，河南的情况可以进一步证实饥荒对男性的影响超过女性。

表8 1960年河南人口与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与推算的分年龄死亡率

年龄	占全部人口%		占死亡人口%		死亡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0	1.1	1.0	6.1	9.0	267.2	286.4
1～4	7.4	7.4	8.1	12.4	53.1	55.5
5～9	13.0	12.9	3.2	4.1	11.5	11.8
10～14	11.7	11.6	1.4	1.6	5.6	4.6
15～19	9.6	9.0	1.0	1.1	4.8	4.2
20～24	8.1	7.2	1.6	1.3	9.2	5.8
25～29	8.0	7.3	2.1	1.7	12.3	7.6
30～34	7.3	6.8	2.5	2.1	15.9	10.2
35～39	6.9	6.6	3.5	2.7	24.1	13.2
40～44	6.0	6.1	4.5	3.3	35.5	18.0
45～49	5.1	5.3	5.8	3.8	54.0	23.8
50～54	4.6	4.9	8.2	5.6	84.1	37.4
55～59	3.8	4.2	9.3	6.5	115.2	50.4
60～64	2.9	3.4	10.6	8.6	173.1	84.0
65～69	2.1	2.6	10.6	9.3	235.8	117.1
70～74	1.4	1.9	10.5	11.5	360.5	198.4
75～79	0.7	1.1	6.7	8.1	435.8	248.3
80+	0.4	0.6	4.1	7.4	435.9	390.1
合计	100	100	100	100	47.1	33.1

说明：(1) 死亡人口是36个县市、公社死亡人口年龄状况，其中男105477人，女72342人。
(2) 1960年河南全省死亡人口1937996人，根据表中死亡人口的比重推算全省各个年龄组的死亡人口，并据此推算分年龄死亡率。

资料来源：河南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河南省统计局，1989

注释：

①中国计划生育年鉴．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②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家庭、婚姻与生育研究．开放时代，2000；5

③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19～121

④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56

⑤当代中国的劳动保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16

⑥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82

⑦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6

⑧尹兰河，蓝兆浪．惠州市劳动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118

⑨甘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档案史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462～511

（责任编辑：宋 严 收稿时间：2001－04）



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

作者：　李若建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
刊名：　人口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POPULATION RESEARCH
年，卷(期)：　2001，25(5)
引用次数：　4次

参考文献(9条)

1. 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86

2. 李若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家庭、婚姻与生育研究 2000

3. 彭尼・凯恩 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 1993

4. 薛暮桥 薛暮桥回忆录 1997

5. 当代中国的劳动保护 1992

6. 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 1994

7. 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 1990

8. 尹兰河.蓝兆浪 惠州市劳动志 1992

9. 甘肃省引洮上山水利工程档案史料 1997

引证文献(4条)

1. 辛逸.葛玲 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期刊论文]-中共党史研究 2008(03)

2. 李若建 概念的可操作化与资料评估: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人口研究的难点[期刊论文]-南方人口 2007(04)

3. 中山大学MPA课题组 2000-2005年珠海市常住居民死亡情况分析[期刊论文]-南方人口 2007(02)

4. 耿化敏 学术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期刊论文]-教学与研究 2006(07)

2003年第6期 第40卷 (总156期)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2003 Vol. 40 General, №156

·当代史研究·

"大跃进"时期的河南农村公共食堂*

贾艳敏

(南京大学 历史系, 南京 210093)

摘　要:农村公共食堂是"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的产物。公共食堂严重脱离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因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靠政治压力强迫农民建立起来的。河南省是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农村公共食堂的数量和比例均居全国首位。河南农村公共食堂出现了种种问题,它的解散是必然的,但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上血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和记取的。

关键词: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 "大跃进"; 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3)06-0060-08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是建国后极"左"思潮的一次大泛滥,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人民公社化运动既是"大跃进"的产物,又加速了"大跃进"的进程。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农村举办了公共食堂。农村公共食堂加剧了"大跃进"的恶果,是导致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河南省是"大跃进"运动的重灾区,举办公共食堂也是全国的典型。学术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人关注公共食堂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是对全国范围内公共食堂的举办和解散过程的描述,尤其侧重解散的过程。至今还没有对河南这一典型地区的农村公共食堂的专题研究,本文分析河南农村公共食堂举办和解散过程以及由此造成的恶果。对河南这一典型地区农村公共食堂的分析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和反思那段历史。

一

成立于1958年4月20日的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卫星人民公社成立的同时,就建立了公共食堂。这是河南农村普遍兴办公共食堂的先声,也是"大跃进"时期危害巨大的全国农村公共食堂的第一个样板。

人民公社的出现,与"大跃进"运动有关。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即《农业40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的12年发展目标,即粮食平均亩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

* 收稿日期:2003-06-11

作者简介:贾艳敏(1968-),女,河南永城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河南省商丘师院历史系讲师。

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1](p.666)。对这个12年的计划,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河南一年左右即可实现。1958年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3月18日,会议印发了《河南省委吴芝圃同志在电话上谈的几点意见》。《意见》说:“河南麦收前可以做到水利化”,“实现‘四、五、八’就是今年或者明年的事情,而不是很远的事情。”[2](p.237)3月25日毛泽东说:“河南今年四件事(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2](p.250)8月初,毛泽东实地考察河南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8月6日,他来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先进典型——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参观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红专大学、公共食堂、敬老院等,并听取了公社成立的经过。他对吴芝圃说:“吴书记,大有希望,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3](p.6)毛泽东表示对人民公社的发源地——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有兴趣,吴芝圃电告正在遂平县嵖岈山考察工作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火速赶回郑州。8月6日晚,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并带来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3](pp.52-59)这份《简章》是在由创刊不久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九、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河南日报》社负责人、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带领地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到嵖岈山“大会合,大研究”之后,由李友九执笔7月底才写出来的。[4](p.101)《简章》规定:“社员的一切私有财产全部交给公社,作为公社公有”;公社担保“对缺乏劳动能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废者在生产和生活上进行照顾,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必要的保证”。《简章》特别规定“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组”;“实行义务教育,全民武装”,“统一建立住宅”;“建立公墓”;“建立医疗合作制度”等等。[5]毛泽东看了《简章》,惊叹道:“宝,真是个宝呀!”他批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6]9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全文发表了《简章》,并配发了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看如何办公社》。直到后来庐山会议上当面批评彭德怀时,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当初发现这份《简章》时的欣喜心情。他说:“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嵖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简章,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我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7](p.137)

1956年3月,嵖岈山地区的老垄沟曾经出现过部分青年农民自发组织的垦荒队食堂。[8]青年垦荒队员们起初自带干粮,喝生水,许多人因此生病。办起食堂后,大家能吃热馍,喝开水,有菜吃,生活得到了调剂,《河南日报》对老垄沟食堂进行了宣传。[8]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在不久的麦收中,全区(1958年10月遂平县成立县联社后,原嵖岈山人民公社称为管理区)范围内先后建立了许多临时农忙食堂。麦收之后,建立了更多的几户、十几户、几十户不等的食堂。一个月之后,(嵖岈山)管理区党委将临时农忙食堂都改成常年公共食堂。全区4 369户农民全部加入了食堂。1958年8月6日,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时说:“公社办起了大食堂,全体农民一日三餐去大食堂统一吃饭,节省了各家各户的做饭时间,又使一大批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毛泽东听了,面露笑容,称赞道:“看来大食堂

倒是个新事物。”[3](p.55)

毛泽东的称赞,使公共食堂优越性的强大宣传接踵而至。

首先是遂平县和河南省的积极响应。1958 年 8 月 14 日,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在《河南日报》上发表《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建立》一文。文章总结了公共食堂的十二大好处:解放妇女,改善伙食,节省劳动力,节省烧柴,节省粮食,节省灯油,节省家具,减少婆媳之间的吵架,减少失火,便于除四害,对改造二流子有利;从群众来说,便于开会,从干部来说,便于领导。

8 月 17 日,《河南日报》发表了《睢县社会主义生活福利事业遍地开花》和《公共食堂在登封》两篇报导以及题为《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作好社会主义生活福利事业》的社论。睢县的报导说,1958 年夏收夏种时,全党办食堂,大大加强了集体主义观念,树立了共产主义思想,有力地推动了生产任务的完成。公共食堂节约用粮,节约用柴,减少家务纠纷,进一步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出现了互助友爱、团结生产的新风尚。登封县的报导说,登封县的公共食堂解放了 30 000 多个劳动力,节约了开支,养成了农民的集体观念,加强了团结,和睦了家庭。社论在总结全省各地办食堂的好处时借沁阳县农民的话称颂说:“食堂好,食堂好,省粮食,花钱少,又节约,又吃好,吃饭齐,去地早,家庭和睦学习好,生产增加收入高,集体生活真正好,共产主义快到了。”社论最后说:我国人民几千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幼有所育,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变为现实。

遂平县和河南省对公共食堂的大力宣传很快得到《人民日报》的支持。8 月 18 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农村公共食堂又多又好》一文。文章报导说,河南省农村已经建立公共食堂 31 万多个。同时《人民日报》还转载了 8 月 14 日《河南日报》刊登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的文章。

《人民日报》对公共食堂的报导鼓舞了遂平县委。8 月 18 日、8 月 24 日、8 月 26 日中共遂平县委分三天召开会议,对公共食堂的优越性进行总结。会议把公共食堂的优越性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认为它“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想,在精神上进行一次革命,有利于培养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主义精神,从思想深处挖掉资本主义的温床”[9]。

1958 年 8 月底,河南宣布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村公共食堂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据统计,1958 年底河南省的总人口是 4 943 万人。[10](p.15)截止到 1958 年 11 月底,河南共计建立农村公共食堂 237 545 个,参加食堂的人口有 4 534 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91.7%。另据 1959 年底的统计,全国农村公共食堂 3 919 000 个,参加食堂吃饭的有 4 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 72.6%。河南省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 97.8%,居全国首位。[11](p.297)到 1960 年 3 月,河南农村公共食堂达 335 931 个,就餐人数增加到 4 555 万,占河南省农村总人口的 99%。[11](p.295)

二

公共食堂严重脱离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因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靠政治压力强迫农民建立起来的。农民没有不参加的自由,否则,即被视为右倾保守或资本主义思想严重,遭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的批斗。在

人民公社化的发源地——遂平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也是利用了强迫命令的手段。麦收前的农忙食堂在麦收后有些自行散伙，经过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又把食堂办起来。[12]据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1958年10月29日的统计，全队共写“大字报”550张，提意见821条。[9]偃城人民公社春庄大队也是利用“阶级路线教育”，开展4个多月的“鸣放”，到1958年10月31日，共“鸣放”出3 500多条意见，“批判”各种不愿意加入食堂和对食堂不满的思想和言论，才把食堂建立和巩固起来的。[13]

河南农村公共食堂从一开始就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和“敞开肚皮吃”的政策。大吃大喝，挥霍浪费，各地严重吃了过头粮。《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和河南省委1958年9月制定经过两次修改的《河南农村人民公社试行章程（第二次修正稿）》中规定：“实行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力多少，都能按家庭人口得到粮食的免费供应。供应的标准是吃饱、吃好、不浪费和‘有多吃多，有少吃少，有啥吃啥’的原则。”“公社对社员除实行吃粮或伙食供给制外，还可以根据具体条件，在其他方面按需要和可能，逐步扩大供给的范围。”[14]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糟糕，许多地方反映：“做饭没有计划，形成孬饭吃不多，好饭不够吃。好饭多打，余剩下顿吃。不大好的饭倒了喂猪，浪费了许多粮食。”[15]据商丘县新华人民公社的调查，1959年元月之前，食堂里“每桌四个盘（白菜、红萝卜、白萝卜、粉条）”。[16]孟津县红旗人民公社横水管理区第17食堂是河南省的先进食堂，1958年10月底这个食堂公布了11月份的饭菜单。就饭菜单上的主食来看，这个食堂一个月里有29顿早餐吃面，1顿吃米饭；一个月中午饭全部吃面；晚饭28顿吃面，1顿吃小米。饭菜单还记载，这个食堂每天平均有180人吃饭，开支粮食1 114斤，平均每人每天吃粮6.2斤。[17]

公共食堂的另一个问题是食堂掌握着农民的口粮，农民自己没有支配权，支配权在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手中。干部和炊管人员利用职权克扣、贪污农民的口粮，甚至滥用权力，以不让吃饭作为对农民的惩罚。据1959年5月省委派往荥阳县高村人民公社整社工作组的调查：高村人民公社有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485名，其中有经济问题的193人，占干部总数的39.79%。45人贪污，占干部总数的9.28%，46人多占，占干部总数的9.48%，38人多支多借，占干部总数的7.87%，64人占小便宜，占干部总数的13.19%。有贪污行为的总支正、副书记3人，大队长2人，支部书记4人，生产队长15人，大队和生产队的会计21人，贪污的数量一般都在百元左右，最多的达四五百元。占小便宜的一般表现为：到食堂吃小锅饭、吃夜餐，到小卖部加菜不付钱。[18]1959年6月17日河南省委的一份报告披露，1959年春整社算账时，全省查处“干部贪污的68 975人，超支挪用、占小便宜的176 637人，铺张浪费的24 597人”。[18]三者合计270 209人。

三

河南农村公共食堂出现了种种问题，它的解散是必然的，但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血的代价。

由于“大跃进”的穷折腾，1958年秋征刚过，许多地方就发生了粮荒，公共食堂无法开伙。1958年底至1959年初，粮荒加重，出现了大量浮肿病人和人、畜的非正常死亡。据1959年2月对鹿邑县辛集人民公社的调查，全社202个食堂，已停伙17个，农民只好拣红

薯、萝卜、刮树皮度日。55 个食堂完全没有粮食，只吃红薯、萝卜。吃 4 两以下粮食的食堂有 42 个，4 两至半斤的 64 个，半斤至 12 两的 14 个，12 两以上的 10 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公社患浮肿病的 978 人，其中严重到不能生产的 200 人。其他疾病如麻疹、白喉、流感等发病率也有所增加。牲口死亡多，如李岩大队 540 头牲畜，已死掉 182 头，占总数的 34%。李岩生产队 51 头牲畜，只剩下 18 头，死掉 33 头，占总数的 64%。[19]信阳地区商城县越美公社关庙团在 1959 年春节前后发生粮荒，74 个食堂停伙，其中有 13 个食堂停伙一个多月。饿死 142 人。[20]据开封地区调查，从 1958 年 10 月至 1959 年 3 月，全区浮肿病患者有136 114人，因浮肿病而死亡 11 745 人，因不堪饥饿外逃 70 000 多人，虞城县杜集公社，因浮肿病死亡 1 143 人，占公社总人口的 2.22%。[4](p.118)

在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河南省委仍然坚持公共食堂不能变的政策。1959 年 3 月 1 日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规定继续坚持“吃饭不要钱”的政策。[21]5 月 9 日河南省委发出《省委关于当前整社算账和农业生产的紧急指示》，要求“认真管理好食堂，普遍实行按人定量，节约粮食”。[22]6 月 20 日，河南省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要求“巩固”食堂。6 月 26 日，河南省委批转了许昌地委《关于巩固提高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宣传了公共食堂的十五大优越性，以及巩固提高的具体办法，要求加强各级党委对食堂的领导，派干部到食堂搞“试验田”。[19]根据这个指示，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嵖岈山管理区第一书记陈丙寅于 1959 年 7 月 25 日来到下宋村，不断组织“鸣放”和“辩论”，批评干部和群众中“食堂不自由”的思想，并选派一批所谓积极分子到食堂工作，硬是不让这个问题成堆的食堂散伙。[23]1959 年的庐山会议是一次前期纠“左”，后期反右的奇特会议。纠“左”与反右的转折点是 7 月 23 日毛泽东开始反击彭德怀的信。在 7 月 4 日中南组会上，吴芝圃炫耀说，河南的食堂一个也未散，90% 可巩固下来。[7](p.28)毛泽东则说：“如果全国（的食堂）能保持 1/3，我就满意了。”[7](p.135)

庐山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斗争，河南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反右倾更是不遗余力。

1959 年 8 月 20 日，河南省委批转了《开封县委福利部省秋田管理检查团联合报告》，推广开封县利用政治“大批判”和群众运动的方式，把一些没有办好食堂的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农民及基层干部迫于政治压力，把已经散伙或濒临散伙的食堂恢复了起来。据统计，这个县的黄河人民公社崔楼大队 16 个食堂垮了 13 个。五爱公社老庄大队 13 个食堂，除一个干部食堂外，其他 12 个停伙。另据全县不完全统计，有 170 个食堂停伙；200 多个食堂每天只做一顿或两顿饭，处于半停伙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县委召开了生活福利工作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大力宣传食堂的优越性，树立先进食堂的典型，批判落后食堂的右倾思想，把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看成是巩固人民公社、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重要措施之一。会议要求各公社通过大会、小会深入贯彻县委会议精神，认真巩固公共食堂，只准办好，不准办坏，要求两天内把停伙的食堂一律恢复起来。[19]不仅如此，有些地方还收回了 1959 年春整社算账时退给农民的家畜、家禽和炊具，重新成立更大规模的公共食堂。

8 月 23 日至 9 月 25 日，河南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有组织地批斗了几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有省委候补委员、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和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

慧智。他们均有反对举办公共食堂的“罪行”。王慧智领导下的洛阳地区就有 100 多个食堂散伙。为了整倒耿、王,彻底打击河南的右倾势力,省委将他们的问题上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10 月 12 日,中央作出批示,耿起昌等人的错误是:“反党反人民,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11](pp.253-257)

如此反右倾的结果使河南农村的公共食堂再一次充当了全国的典型。

1960 年 3 月 5 日,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向中央作了《河南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电话汇报。汇报的内容包括河南农村公共食堂的数量和就餐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干部大搞试验田的巩固办法,实现食堂机械化的情况,改善经营管理的四点做法,目前存在的四个问题等等。中央批示各地:“这些办法很好。”“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11](pp.285-297)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 1960 年 3 月,河南省委制定了《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试行章程(初稿)》,《章程》仍然把农村公共食堂定性为“共产主义的萌芽”,“农村社会主义的坚实阵地”。[24]

河南人民为公共食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 1959 年 6 月至 1961 年 1 月 8 日的统计,人民公社的发源地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总人口是 38 934 人,饿死 4 847 人,人口死亡率高达 12.45%。其中袁庄大队的袁庄、孙庄、谢庄等庄几乎全庄死绝。[25]1961 年 3 月底,新乡地委给河南省委的报告说,2 月份全区每天平均死亡 420 人,全区缺粮9 000万斤,80% 的食堂没有菜吃。[26](p.204)1959-1961 年,河南全省死亡人数达 300 多万,[27]仅信阳地区就饿死 100 多万人。[28]

随着灾情的进一步扩大,尽管省委极力捂盖子,隐瞒灾情,堵塞上报渠道,欺骗党中央,但河南的灾荒尤其是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信阳事件”)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中央。1960 年春,卫生部和内务部都向中央作了反映。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派人到河南进行了 3 个月的调查。中央监委将河南的灾情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做了批示,并派王从吾(中监委副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安子文(中组部副部长)为首的几十人的工作组,再次前往河南信阳调查,解救灾荒。[28]1961 年 1 月,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代表省委作了检查。2 月,中共中央调整了河南省委领导班子,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省委常务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省委书记兼秘书长。1961 年 7 月,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 年 4 月,吴芝圃调任中南局文教书记。[27]

1961 年 4、5 月间,中共中央继续派人到河南调查处理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到长葛县,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新乡七里营,朱德于 3 月 26 日和 5 月 4 日两次到河南调查。[29](p.477)4 月 23 日习仲勋给中央报告了长葛县和尚桥公社的调查情况。报告说,公共食堂是目前广大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大部分食堂已经在 3 月初散伙。长葛县 70% 的食堂相继停办,其余的一小部分在观望等待,只要干部一松口,马上也会停办。农民在食堂里确实过不好,对食堂没有兴趣。在家做饭,农民能吃够标准,浮肿病人显著减少。[30](p.255)谭震林在七里营听取了群众意见,重点抓了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解放被错批的干部、落实按劳分配制度、坚决解散公共食堂等几个关键问题。[31](p.328)朱德回到北京

后，于5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说，河南虽然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困难仍然很大：农民体质弱，浮肿病人还不少，牲畜死亡多。[33](p.704)公共食堂不得人心，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对荥阳县贾峪公社大嵺滩生产队的调查显示：该生产队有36户农民，只有2户五保户和2户单身汉愿意吃食堂，32户都要求回家做饭。[4](p.158)

1961年6月21日－7月6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决定将粮食直接发给农民，由各家各户回家做饭。食堂解散后，农民生活大为改善，据对饥荒严重的豫东地区统计，在解散食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浮肿病人下降了40－50%。[4](p.159)在新的省委领导下，河南开始调整政策，恢复生产，发展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农村经济逐渐走出三年低谷。

“大跃进”时期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数千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河南是重灾区，信阳地区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恶性事件。以省委书记吴芝圃为代表的河南省委在执行“左”倾路线时尤其过激。被称为“共产主义”萌芽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使河南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上血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深思和记取的。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李锐．大跃进亲历记[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陈汉．八月的足迹——毛泽东1958年河南农村视察纪实[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李琳，马光耀，等．河南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5]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N]．河南日报，1958－09－05.

[6]李锐．从“公共食堂”兴衰引发的思考[J]．炎黄春秋，1997，(3).

[7]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8]不断巩固提高的公共食堂，共产主义化的常年食堂[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59－1－55.

[9]遂平县实现社会生活集体化的初步总结，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巩固提高公共食堂的经验[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1－2－86.

[10]河南省志·人口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1994.

[1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12]中共遂平县委关于全县实现公共食堂化的总结报告[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1－5－228.

[13]政治风向辨得清，食堂工作放“卫星”[N]．河南日报，1958－10－31.

[14]河南人民公社试行章程(第二次修正稿)[A]．河南省委办公厅：关于人民公社资料汇集(一)[Z]．河南省档案馆藏资料，1958.

[15]梁庄大队办好公共食堂的经验[N]．河南日报，1959－06－28.

[16]关于商丘县新华人民公社福利及春节准备情况调查报告[Z]．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J107－3－551.

[17]公共食堂万年长青，人民生活蒸蒸日上[N]．河南日报，1958－11－11.

[18]高村人民公社关于整社中社、队干部思想作风问题的报告，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在整社算账中认真作好对犯有各种错误的党员干部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1－4－95.

[19]河南省委转发郭晓棠、谢青梓同志关于鹿邑县辛集人民公社食堂停伙问题的调查报告，河南省委批转许昌地委“关于巩固提高公共食堂的情况报告”，河南省委批转开封县委福利部省秋田管理检查团联合报告[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1－4－128.

[20]中共信阳地委关于商城县越美公社关庙团因生活安排不好发生死人事件的通报[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1－4－129.
[21]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1－4－94.
[22]省委关于当前整社算账和农业生产的紧急指示[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1－4－95.
[23]陈书记的食堂试验田[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59－3－87.
[24]河南农村公共食堂试行章程(初稿)[Z].河南省档案馆藏档案:J11－2－131.
[25]遂平县嵖岈山公社1961年死亡人口统计表[Z].河南省遂平县档案馆藏档案:59－3－139.
[26]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27]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J].二十一世纪,1998,(8).
[28]李锐."信阳事件"及其教训——《信阳事件》序言[J].炎黄春秋,2002,(4).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0]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31]《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谭震林传[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32]金冲及.朱德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The Common Dining Hall in Rural Hena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JIA Yan-m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rural common dining hall, the product of the People's Commun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deviated greatly from the production levels in the late 1950s. It was not the product of economic growth but was forced upon the peasant due to political pressure. Henan initiated the People's Commune, and in number and proportion its common dining halls ranked number one in the country. The problems that flooded the Henan dining halls would inevitably lead to the dining halls' dissolution, but this dissolution was tortuous and was paid with the price of blood. An important lesson should be learned from this experience.

Key words: People's Commune; common dining hall; "Great Leap Forward"; Henan Province

(责任编辑　朱剑)

“大跃进”时期的深翻土地运动述评

贾艳敏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1954年河南省长葛县创造的能够使粮食增产的方法——适当深翻土地,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被毛泽东称为一大“发明”。深翻土地由于受到毛泽东的如此高度称赞而得到大力宣传,以至于在全国推广。全国各地纷纷到长葛县参观学习,土壤专家也到长葛县搞调查研究。农业部还于1958年7月在长葛县召开深翻土地的现场会。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翻和改良土壤的指示》。不久,深翻土地形成了席卷全国的运动,翻地的深度愈来愈深,有的甚至深达四五尺。深翻土地运动中,各地都搞政治挂帅,大兵团作战,全国投入了无法统计的劳动力,日夜在田地里搞深翻。这是“大跃进”时期极“左”做法的一个实例。尽管当时有科学家的所谓“科学论证”,但事实表明,这是不讲科学、脱离实际的蛮干,只会劳民伤财。随着“大跃进”造成的饥荒的蔓延,中央无暇顾及,地方无力深翻,曾经轰轰烈烈的深翻土地运动也不了了之。

关键词:大跃进;深翻土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3)05-0106-04

作者简介:贾艳敏(1968—),女,河南商丘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河南商丘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史。

深翻土地在“大跃进”时期成为席卷全国农村的运动,也是“大跃进”的产物之一。然而,在关于“大跃进”的众多研究成果中很少有对这一时期的深翻土地运动的论述,本文将对深翻土地运动的缘起、展开及草草结束做简略述评。

一

深翻土地最初是由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乡孟排村胜利一社社长马同义在1954年创造的。马同义从实践中总结出深翻土地的方法:未翻地前,将底肥的60%普遍施于底层表面,将第一行(宽约50厘米)翻开,熟土堆积一旁,将底肥的40%分行施于生土上面。深翻约30厘米,使土肥拌匀,把第二行熟土移覆于第一行生土之上,如此依次而行,全部翻后浇踢墒水,平整待播。当年早玉米亩产536.5公斤。[1](P648)由此,深翻土地在长葛县推广。

1955年冬和1956年春,全县翻地29426亩。[1](P648)1957年冬,长葛县又提出了“千年老地大翻身,争取亩产一千五百斤”的口号,掀起了深翻地运动。截至6月底,已经深翻72万亩。剩下的42万亩,县委计划秋后全部来一个大翻身,即全县114万亩耕地,要在当年全部翻完。[2]

1957、1958年之际,笼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空气日益浓厚,不顾客观实际,不讲科学的盲目蛮干正在蔓延,粮食高产和如何使粮食高产不仅仅是中国农民思考的问题,也是急于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领导人思考的问题。恰恰这时,河南省长葛县马同义的深翻土地增产法不仅在全县范围内推广,而且在河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56年,马同义被评为河南省特等农业劳动模范。作为“大跃进”运动的排头兵,河南省的一些举动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而且那还是一个鼓励群众“发明创造”的年代。马同义创造的深翻土地增产法很快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青睐。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长葛县

收稿日期:2003-05-11

委第一书记吕炳光就长葛县深翻改土情况做了发言，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感谢河南省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112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寸，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二年不行，三年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也许还有别的办法。他的办法是：先把表层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放在生土上，再用铁锨把第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垃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放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一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放在前面。"[3]

195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吕炳光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八百斤》发言，文章详细介绍了长葛县深翻土地的情况、深翻土地的十大好处、改进翻地工具、几种深翻土地的方法和翻地时应注意的问题等。[4]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一个县委书记的发言给予如此高度的称赞，而且要求其他县向他学习，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足以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二

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深翻土地运动。

1958年7月11日，农业部在河南省长葛县召开"全国深耕农具和改良土壤"现场会。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在全国推广长葛县"深翻土地"的经验。会议要求全国各地立即掀起深翻和改良土壤的运动，争取到1959年春，把全国需要深翻和改良的16亿亩耕地普遍深耕和改良一遍。一般土地深耕要求达到一尺半上下，丰产田要达到二三尺以上，并做到分层施肥。

农业一直是困扰中国发展的问题，也是领导人投入巨大精力的事情。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指示说，深耕是农业增产技术措施的中心。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土"是中心，土就是深耕。深耕有三大好处，若不深耕，有两大害处。指示还说，1958年春夏深耕了1.2亿亩，还不到全国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十年也不能把全部耕地深耕一遍，这个速度是不行的。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把一切可能深耕的土地全部深耕一遍，并且每三年轮流深耕一次，周而复始。深耕的标准是1尺以上，丰产田2尺以上。指示要求各地"必须政治挂帅，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从现在起，在今年秋种和今冬明春，掀起一个深耕和改良土壤运动的高潮"。"使1958年冬季的以深耕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生产高潮比1957年冬季的高潮还要高，保证1959年的农业生产比1958年更大地跃进。"[5]

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让土地来个大翻身》的社论。社论说，深翻土地可以保水保肥，生土变熟土，熟土变油土，大大提高土壤肥力，等于一亩地变成几亩地，可以半倍至五倍地提高产量。社论接着列举了河南省长葛县七个农业社翻地前后的产量对比来说明深翻的增产效果。社论要求各地领导重视，全党动员，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中共中央如此重视深翻土地，河南省长葛县作为深翻土地的创造发明地，在党代会上介绍经验，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后，还通过其他方式宣传自己。1958年第8期《农村工作通讯》发表了中共长葛县委的《长葛县开展深翻土地运动的经验》。同时还发表了长葛县委第一书记吕炳光的《长葛县深翻土地的几种方法》、中共长葛县委办公室郭秀峰的《深翻地的一个重要关键》等文章。[2]

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长葛县深翻土地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后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代表团到长葛参观学习"[1](P253)。西北农学院土壤教研组和耕作教研组专门派科研人员到长葛调查研究。通过一星期的调查，他们写成了《长葛县深翻地的方法和科学根据》的文章，发表于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的《农业科学通讯》1958年第9期。文章总结了长葛县深翻土地的十种方法以及每种翻地方法从土壤学上的"科学"根据、深翻后的产量增产情况。文章最后在谈到深翻土地的五大优点时，还以"科学"证明了长葛县在深翻1米到1.5米深度的基础上，提出亩产红薯20万斤的指标完全能够实现。[6]中国科学院也组织了土壤考察队，赴长葛县考察深翻土地的情况，并以科学工作者的身份，找出深翻土地的"科学"依据来。[7]1958年9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深翻土地》一书，全面介绍了长葛县深翻改土的经验。深翻土地的创始人马同义被国家农业科学院土壤研究所聘为特约研究员。[1](P253)

1958年秋冬，全国农村形成了深翻土地运动的高潮。

河南抽出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大军，成立许多专业队，吃住在田间，日夜大搞深翻土地。夏邑县对深

翻土地特别重视，动员了20万劳动力，全部以军事化行动，组织成团、营、连，划分60多个大战场，以淮海战役的劲头，在全县范围内日夜突击翻地。[8]

河北省各地对深翻土地都很重视，做到了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并且从县到社层层建立深翻土地指挥部。各农业社和人民公社大部分都组织了深翻土地专业队、组，已经实行劳武结合的人民公社民兵生产战斗团，是深翻土地的突击大军。[8]

据9月中旬的统计，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京、陕西、甘肃、安徽、江苏、湖北等十个省市已经深翻土地1.29亿亩。其中河南、山东、河北、北京等四个省市深翻运动的规模和声势尤为浩大，三千二百多万深翻大军正日夜在田间奋战。[9]到9月底，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江苏、安徽、湖北和北京市郊区已经深耕土地3.91亿亩。绝大部分深度都在1尺—1.5尺左右；大面积丰产田和高产"卫星"田深度达到二三尺或四五尺。

地处东北的辽宁省，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中"落后"了，省委为了接受"教训"，决心在秋冬的深翻土地运动中大显身手，10月上旬，省委连续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深翻电话会议和全省大搞深翻地誓师广播大会，进行了具体部署和深入动员。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发动群众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使翻地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0月8日誓师广播大会后，到15日一个星期的时间，全省每天参加深翻战斗的人数最高达到420多万，深翻地达到877万亩，比8日前二十天的翻地面积增加了五倍。[10]

内蒙古自治区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的翻地运动也和内地一样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公社推行六到田（指挥到田、吃到田、住到田、开会辩论到田、学习到田、娱乐到田）和换人换牛不换犁的办法，夜以继日地翻耕土地。[11]据农业部1958年10月25日对17个省（区）市深翻进度的统计，情况如右表：[12]

三

为了配合深翻土地运动，深翻能够增产的"科学"论证不断见诸报端。

前文提到的西北农学院的土壤教研组和耕作教研组的科研人员到长葛县调查一个星期后，对长葛县首创深翻地能够增产给予了"科学"解释，甚至亩产红薯20万斤都是符合"科学"的。

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土壤考察队，通过对河南长葛深翻地的考察，考察队队长熊毅在1958年7月22日的全国深耕农具、改良土壤会议上做了《从土壤科学来研究深翻问题》的报告，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报告说，今后我们不单从自然环境来判断土壤的分布和变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所引起的土壤变化，因此，我们不仅要用自然辩证法，还要采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土壤。实地考察后，感觉土壤科学赶不上生产的发展。土壤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跟不上群众的要求。报告还从土壤学的角度分析深翻地的三点好处，最后的结论是"深翻一般都是有利无患"，"深翻土地能使土壤的理化性质变化，能让土壤按照我们要求的方向发展"[7]。

省市	计划面积（万亩）	完成计划的%
北京	135	157.8
河北	4,000	126.2
山东	6,396	98.4
河南	8,000	97.3
山西	2,076	84.1
陕西	3,000	76.8
甘肃	2,400	83.1
江苏	4,500	43.1
安徽	5,863	52.1
湖北	4,400	37.9
四川	4,000	60.8
辽宁	4,500	26.3
吉林	4,590	75.7
黑龙江	8,151	51.4
内蒙古	2,662	42.2
湖南	3,820	42.2
宁夏	600	66.7
合计	6,9093	67.2

熊毅是我国著名的老一代土壤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土壤胶体化学和土壤矿物学的奠基人，曾获美国密苏里大学土壤矿物学硕士学位、威斯康星大学土壤学博士学位，具有如此学术专业背景的资深土壤学家也认为"人的力量能引起土壤的变化"，"要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土壤"，"深耕是多快好省地改造土壤的办法"，可以"让土壤按照我们所要求的方向发展"。[7]

195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召集北京的一些农业科学工作者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副秘书长刘春安发言说，深耕打破了土壤学上记载的规律，是"大跃进"中农民创造的经验。[13]

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也撰文宣传深翻土地的好处。高士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从土壤学的角度讲述深翻土地可以把死土变成活土，再配合分层施肥，就可以把活土变成油土。深翻能改变土壤的面貌和特性，有利于作物的生长。[14]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土壤专家们对深翻土地给予的"科学"论证，使极"左"的不顾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有了"科学"的依据，错误决策和错误行动有了政治化的"科学"保驾护航，深翻土地运动进行得

"理直气壮"。

然而，有政治家的决策、科学家论证的深翻土地运动，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劳民伤财的愚蠢之举。

1958年秋冬，浩浩荡荡的翻地大军日夜奋战在田地里，承受着超强的体力劳动，还要忍受饥饿的折磨。到1959年的夏秋季节，深翻能够几倍增产的神话破灭了。1958年全国粮食实产量2000亿公斤，比1957年略有增加，1959年下降到1700亿公斤。[15] 1959年秋冬，深翻土地运动再也没有了1958年秋冬的百万大军日夜奋战、遍地红旗招展的"壮观"景象了。1959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坚持深耕深翻》的社论，号召广大农民继续掀起深翻土地运动高潮。然而，1959年秋冬的"大饥荒"已经袭击了广大农村，尽管有号召，但深翻土地还是没能继续下去，各地接踵而至的饥荒报告使中央没能再次狠抓这个问题，深翻土地运动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参考文献：

[1]长葛县志编纂委员会. 长葛县志[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

[2]中共长葛县委员会. 长葛县开展深翻土地运动的经验[J]. 农村工作通讯，1958，(8).

[3]毛泽东主席对长葛县深翻土地经验的批示，长葛县志[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1，封二.

[4]吕炳光. 土地大翻身，争取亩产八百斤[N]. 人民日报，1958-05-13(4).

[5]中共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J]. 农业科学通讯，1958，(10).

[6]张君常，等. 长葛县深翻地的方法和科学根据[J]. 农业科学通讯，1958，(9).

[7]熊毅. 从土壤科学来研究深翻问题[N]. 人民日报，1958-09-12；(6).

[8]深翻一尺土，多产万斤粮——河南河北千百万劳动大军日夜突击翻地[N]. 人民日报，1958-09-12(6).

[9]把深翻土地运动推向高潮[N]. 人民日报，1958-09-29，(3).

[10]辽宁兴起日翻百万亩运动[N]. 人民日报，1958-10-19，(1).

[11]抓紧农时，加速秋耕！——内蒙古吉林翻地运动进入高潮[N]. 人民日报，1958-10-24，(4).

[12]十七省(区)市深耕进度表[N]. 人民日报，1958-10-29，(5).

[13]刘春安. 学习农民伟大的创造精神[N]. 人民日报，1958-10-08，(7).

[14]高士其. 把死土变成活土——从深翻地谈到土壤的改造[N]. 人民日报，1958-10-17，(8).

[15]朱玉湘.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165.

On the Soil Deep Turning up Movement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JIA Yan-mi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Soil deep turning up movement, which was first carried out in Changge, Henan, was regarded as a kind of great invention that can improve farm output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Due to the high praise of Mao—tsetong and the energetic propaganda of the party, it soon became a tremendous campaign throughout the whole nation, during which countless people went to the fields and kept turning up the soil day and night. However, as it ignored science and the objective law, it proved to be a considerable waste of money and manpower in the end.

Key words: great leap; soil deep turning up

[责任编辑　孙景峰]

"大跃进"时期扫除文盲运动述评

李庆刚

[摘 要] 1958～196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时期。在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带动下，全国也很快地掀起了扫除文盲的"跃进"运动。这一运动随形势发展，由兴到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扫除文盲运动中，存在着严重的浮夸现象，但一些具体的做法也不无借鉴意义。

[关键词]"大跃进" 扫除文盲 运动

[中图分类号] G5.9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952（2003）03-0054-07

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经过50余年不懈的努力，如今已基本完成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性任务。回顾新中国的扫盲史，我们发现扫除文盲的高潮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是在20世纪50、60年代，而又以"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最为引人注目。鉴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性，如何客观地看待这一时期的扫除文盲运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题目。本文就这一运动的发端、发展作一概述和分析评价。

一、扫盲"大跃进"的兴起

新中国于1952、1956年曾掀起两次扫除文盲的高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跃进"中的扫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1956年扫盲的继续，在"大跃进"的氛围下，这一时期的扫盲又形成一个比前者更大的高潮，而成为第三次扫盲高潮。

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在五年或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1957年3月，教育部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中共八大决议和去年的扫盲决议做出具体部署。应该说，直到1958年初，扫盲运动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

1958年1月南宁会议以后，"大跃进"之声不绝于耳。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月底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讲话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教育部

[收稿日期] 2002-08-25

[作者简介] 李庆刚，1973年生，法学博士，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100091。

副部长董纯才在会上作了《积极扫除文盲，向文化进军》的发言。会议向全国发出五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这标志着扫盲运动拉开了“大跃进”的帷幕。

随之，扫盲的舆论宣传动员一浪高过一浪。1958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3～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提出要“扫除青壮年文盲”。此前，河南、山东等省提出了“一年变成文化省”，一些省提出“今年内扫除文盲”的口号。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的社论，成为全国扫盲“大跃进”的纲领性的文章。其主要内容：一是总结了全国的扫盲形势。文章说全国文盲入学人数已达6100万人，到4月底，全国已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黑龙江省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这是农村中伟大的文化革命的开端”。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正在推动着扫盲工作的大跃进。二是发动扫盲高潮已具备了有利条件。第一，农民的热情是当前扫除文盲的最有利的条件；第二，上百万参加农业劳动的中小学毕业生和上山下乡的干部，解决了扫盲急需的师资问题；第三，经过几年的工作，群众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章认为，扫盲工作的快和慢、好和差，主要决定于干劲的大小。三是提出了促进扫盲工作大跃进的办法。即：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多种方式，长年学习。为了避免复盲和产生新的文盲，要把扫除文盲与普及小学教育、发展业余的中小学统一起来。共青团组织要发挥党扫除文盲的天然助手的作用。四是文章提供了数据分析来激发扫盲的热潮。文中说：“解放八年来，全国扫除了近三千万文盲，其中每年扫除农村中的文盲大约是二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但是现在十四岁到四十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一亿五千万，如果照以往八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三百万，也得五十年才能扫完。”“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实行‘三年突击，两年扫尾’的办法，也就是要从今年起每年要扫掉三千万到四千万，比往年的速度加快十倍以上才行。”文章在这组数字计算方面是明晰的，但明晰的数字不是让人量力而行，而是让人蛮干。考虑到新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光凭政治号召的热情是难以达到这个要求的，在1958年达到扫盲4000万的宏大数字后，1959年降为2600万，1960年为573.3万，到1961年下跌为45.8万。

5月20日，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撰文指出，扫盲要“万人教，全民学”，扫盲效果如何，“问题在于领导决心”。文章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规定是，在十二年内，基本扫除青壮年的文盲。今年3月中央在转发江苏省民办农业中学的指示中，又曾指出‘争取在五年到七年消灭农村中的文盲’。如果以中央今年3月指示的意见为基准，从1956年起计算，到1962年就是七年，距现在还有五年、到1960年就是五年，距现在还有三年。但这是就全国范围和最长的时间来说的，如果就每一个省市、专、县，特别是每一个区、乡、社、村和厂矿、机关、部队单位来说，就不一定都要等到三年到五年了。”这无疑又加剧了扫盲的更大跃进。一时间，“扫盲运动波涛汹涌”。扫盲口号也应运而生，像“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黑龙江提出“读百本书，写万个字”的口号，河南提出“读万言书，写千封信”的口号，湖南提出“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青壮年文盲。”[3]“大跃进”中的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二、你追我赶的扫盲“大跃进”

在全民扫盲的热潮下，全国各地区如同其他领域一样，个个争放“卫星”。首先是全国第

一个无文盲县与无文盲省的诞生。在1956年的扫盲运动中，黑龙江省宁安县提出“一年入学，二年提高，三年扫除文盲”的口号。这本来是一个有急躁冒进倾向的计划。但随着几个公社的扫盲报捷活动，提前完成扫盲任务的浪潮遍及全县，县委就将1959年扫除文盲的计划提前为1958年国庆节。结果出现了“不因我一人耽误全社报捷，不因我一社耽误全乡报捷，不因我一乡耽误全县报捷”的行动口号。到1958年1月，全县102600名青壮年中，有82840人识1500字，占青年总数81%，成了基本无盲县。[1]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三个月的大干，全省86%以上的青壮年工人和81%以上的青壮年农民都认识1500字以上，普遍做到了会读、会写、会讲、会用，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2]

在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的扫盲“跃进”步伐也大大加快。其结果与“献礼”活动结合起来。1958年6月27日，吉林省宣布全省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省青壮年干部文盲已全部扫除；青壮年职工的非文盲率占87.3%；青壮年农民的非文盲率占83.5%，青壮年市民的非文盲率占83.1%。并将这一喜讯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为向党的生日的献礼。[3]《光明日报》1958年9月30日报道，湖南省从4月到国庆前，半年时间基本成为无盲省。11月，内蒙古自治区报道，经过全民一年奋战，已经基本上扫除文盲、基本普及了中、小学教育。称：“这充分说明一个真理，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充分发扬共产主义思想，敢想敢干，一切在发展前途和速度方面的悲观论调，都是靠不住的”[4]。在这种氛围下，各省纷纷放出扫盲“卫星”。

各省的扫盲“跃进”又通过各地方的扫盲“战果”表现出来。如：在广东，佛山市公记隆丝织厂职工，在4月初提出“配合技术大革命，苦战二十五天，成为无文盲厂，向五一节献礼”的口号。工人在休息时间，在车间、饭堂、宿舍里，三三两两，你教我学，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很多人一晚上就认识二三百字。经过苦战，结果提前两天成为无文盲厂。全厂已有105个文盲和半文盲认识2000字，其中有79人能写稿和写信；另外38个文盲识1000字以上2000字以下。[5]这种高度紧张识字效果令人怀疑。革命老区江西瑞金，解放前90%的青壮年都是文盲。5月份，瑞金也掀起了扫盲“大跃进”。“万人教，全民学”，利用田间学，屋里学，早晨学，夜晚学，会前会后学。学习内容是做什么农活学什么字，不少地方采用见物识字的方法。结果在16天的时间里，全县83%的青壮年都认识了1500个字，基本上扫除了文盲。[6]四川叙永县到2000年10月份止还是国家级贫困县，① 但1958年的8月份，此县已吹嘘基本扫除文盲，青壮年中摆脱文盲的已达90%以上。同时说，为了适应脱盲学员进一步学习文化，各乡和农业社开办了400多所红专学校。[7]

在轰轰烈烈的扫盲“大跃进”中，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前述《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文指出，文盲入学人数已达6100万人，到4月底，全国已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6月初，参加扫盲的还是“六千万人的扫盲大军”，但“全国已156个县消灭了文盲”[8]。其中一组数字指出：“截至6月底为止，据国家统计局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达9000余万人，全国已有444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9]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参加人数成了原来的1.5倍，县数变成了原来的近3倍。截止到7月底，又称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已有41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有1.12亿人坚持扫盲学习。[10]到了8月，扫盲数字又大大上升了。据报道，从1月到8月，我国扫除了近9000

① 见《中华儿女》2000年第11期有关报道。

万文盲，在全国2257个县、市中，已有1516个即67.2%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黑龙江、吉林、浙江、甘肃、辽宁、福建、贵州、广东、河南、江苏、山西、湖南等12省已宣布为基本扫除文盲省。[11] 到了10月中旬，数字达到了顶峰。据称：全国已有1799个县市单位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占全国2257个县市单位总和的79.7%；全国已有17个基本无盲省；1958年1—9月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12]这一数字是后来统计的4000万人的2.5倍。这些数字无疑被极端夸大了。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人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

二、扫盲的中断、恢复与停滞

1958年10月后，由于全民参加大炼钢铁运动和“三秋”劳动，扫盲运动陷于停顿。有的文化学习中断，有部分刚摆脱文盲状态的人发生了回生复盲的现象。如山东济宁专署在嘉祥、金乡县和济宁市抽查一部分公社、街道、手工业社，平均有30.5%的人不及格。甘肃省威武县据十个乡的调查，一般回生复盲率在30%左右。安徽阜阳专区检查复盲的人数约有二三十万，占扫盲毕业总数的10%以上。[13] 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扫盲质量问题。

针对脱盲后的回生复盲情况，当时的报刊舆论号召：“文盲帽子摘掉了，业务教育紧跟上”，“努力巩固扩大扫盲成果”。有的文章指出，扫除文盲工作是在集中突击的方式下进行的，大多数文盲是在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内达到扫盲标准的。学习进度快，复习巩固时间少，生产任务重，加之全民大炼钢铁和农村公社化，生产组织有若干变动，学习组织没有及时跟上去，因而部分脱盲者出现回生复盲的现象是难于完全避免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巩固提高的工作更显得重要。文章指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巩固和提高工作跟不上，或者这批人的学习稍有放松，回生复盲的人数还会扩大。[14]问题的关键是，当时整个形势紧迫，人们哪来巩固与提高学习的时间！

鉴于“大跃进”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共中央于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着手纠正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做法。扫盲运动中的纠“左”也积极进行。经过初步整顿调整，1959年4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为了实现文化普及，群众性的扫盲工作应当积极推行。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农村中继续扫除文盲和巩固发展业余教育的通知》，要求及时恢复农民业余学习，“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办法，利用一切时机，组织尚未摆脱文盲状态的农民参加识字学习，形成群众的学习高潮”。“要对摆脱文盲状态的青壮年，逐步实行普及业余初等教育……然后再逐步普及业余中等教育”。同时要求各级公社党委“对农民群众的生产和学习作统一合理安排……保证农村社员每天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15]。本来经过整顿，扫除文盲的工作有可能得到健康发展，但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国民经济的大跃进”的口号声中，扫盲工作又开始了新的“大跃进”。1959年10月底11月初，教育部召开了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反右倾、鼓干劲”，学习1958年的经验，大搞群众运动，在两三年内完成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的任务。12月底，教育部又召开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电话会议，指出要把群众学习运动巩固起来，坚持下去，提高质量，扫除一批文盲，就要发展一批业余初等学校，使扫盲与普及业余初等教育结合起来。1960年1月，教育部在福州召开全国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完成扫盲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注音识字”法成了救命稻草。

“注音识字”法是由山西省万荣县创造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据称其好处是：扫除一个文盲只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大加快了扫盲速度；学员可以无师自通地阅读注音书报，消灭了脱盲后又回生复盲的现象，扫盲识字同推广普通话有机结合，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万荣县的经验得到全国的重视，很多省市前来学习。为此，1960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识字经验，是我国革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创举，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认真学习、大力推广万荣县的注音识字经验，争取提前扫除文盲。但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采用任何方法也难以完成短时期内在全国扫除文盲的任务，在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生产生活极端紧张的情况下，扫盲运动就难以为继了。此后几年，扫盲工作陷于停顿，扫盲人数直线下降：1961年为45.8万，1962年为16.7万，1963年为22.5万；到1965年，也只上升到142.2万。[16]

四、扫除文盲中存在的问题与经验

毫无疑问，“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存在的问题是很多的。

1. 与其他行业一样，是扫除文盲数字的浮夸和不真实。如：据比较实际的统计，广东省到1958年年底扫除了260万文盲，使全省文盲占人口的比例下降到38.8%左右。可是当时层层虚报的成绩，统计扫盲毕业的竟有547万人，使青壮年的文盲率骤降到12%。[17]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部分同志去徐水参加劳动，将一些所见所闻写进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过去这个县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18] 毛泽东曾批评此事。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不要作假……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19] 现在再来看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这些数字多是浮夸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时全民动员、参与的扫除文盲运动也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能忽视这一时期的扫盲在新中国扫盲史上的地位。

2. 对扫除文盲的长期性估计不足。毛泽东在批评扫盲数字作假的同时又对扫盲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始终提要在“二五”计划内扫除文盲。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在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期间，有的领导人也还坚持这一目标：“扫盲去年算它6000万，还剩下大概8000万。这8000万前年讲3年至5年扫完，去年也讲3年至5年扫完，今年再讲3年至5年就不行了，得讲今后2年至4年内扫掉。即使不能完全扫掉也要基本上扫掉。”[20] 严格地讲，这是一个主观的意向目标，而非经科学论证的有步骤、有重点、轻重缓急区别对待的可供操作的切乎实际的目标，没有考虑扫盲的自身规律。

3、对初等或中等教育的普及重视不够，没有把扫盲与普及初等或中等教育有效地结合起来。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政府非常重视扫除文盲，但在普及初等或中等教育方面，力度与决心要弱一些。尽管建国后也曾多次提及，如在“大跃进”中提出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普及初等教育的目标，但出现了许多省市普及小学教育的浮夸现象，实际上普及率并不高。结果新产生的大量新文盲抵消了成人扫盲的成果。1965年，国际公共教育会议正确地指出：“如要彻底消除文盲，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消除，因此，就必须尽可能使所有儿童都入学。”[21] 因此

初等或中等教育必须搞好，这一方面工作搞好了，扫盲工作才会最终无盲可扫，才会真正达到扫盲的目的。

在冷静分析"大跃进"时期扫盲运动问题的同时，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大跃进"中的扫盲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时的一些做法，现在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扫盲要有充分的组织保障。要充分发挥各种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区组织等在扫盲中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自上而下相继成立起扫盲协会，共青团组织起扫盲工作队等，这些组织在"大跃进"的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更有条件成立一些组织、采取不同形式来扫盲，如组织青年志愿者利用假期定点分期、分批地到偏远贫困地区参加扫盲工作的做法就很好。而不能仅仅依靠扫盲教师来扫盲。

——建立健全成人教育网络，巩固扫盲成绩。在"大跃进"的扫盲运动中，各地为巩固扫盲取得的成果，大办文化技术学校、红专学校、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建立起从低到高的成人教育体系。尽管这些学校的浮夸成分很大，效果也值得怀疑，但这种意向还是对的。如今正是"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时代，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值得学习借鉴。我们只有构建多层次的教育网络，"终身教育"才能成为现实，扫盲后的回生复盲现象才会绝迹。

——扫盲中要重视提高人的技能，把扫盲与脱贫及人的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扫盲不仅是识字问题，还有提高人的技能的问题。列宁曾说过："仅仅扫除文盲是不够的……光认得几个字是成不了大事的。我们需要大大提高文化。"[22] 国际扫盲机构指出："扫盲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使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识得几个字，而是要使他更好地同他的环境协调一致，更好地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提高他个人的尊严，接近他认为有益的知识源泉，掌握他走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实际知识和技术。"[23] 从这一标准来看，"大跃进"时期的扫盲运动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1960年10月，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24] 陈毅也说过先扫识字盲、再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

——党和政府要有强烈的扫除文盲的政治意愿并获得群众的支持。抛开"大跃进"之风的影响，当时的扫盲运动以及1952、1956年的两次扫盲运动，之所以取得了很大成绩，与党和政府强烈的政治意愿、人民群众有学习文化的内在要求并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扫盲的成功与否是同国家的政治意志密切相关的"。[21](P.58) 同时，扫盲的重要性、紧迫性还要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扫盲中，尽管政府的政治意愿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没有基层的支持，即如果在居民中没有强大的动力，那么在这方面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费的。"[21](P.61) 据统计，1954～1965年我国扫除文盲达9571.3万人，[16](P.578) 是新中国扫除文盲人数最多的时段。而1958～1960年扫盲就达7173.3万人，占这十年扫盲总数的近75%。这三年是新中国扫除文盲最多的一个时期。应该说，政府的政治意愿和群众支持与扫盲的结果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扫除文盲工作。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到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的任务已如期完成。毫无疑问，到2010年要实现人口覆盖率95%以上的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政府的政治意愿与群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它已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

[参引文献]

[1]《全国第一个无文盲县的领导经验》，《人民教育》1958年第4期。

[2]《走了文化革命的第一步》，1958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3]《吉林全省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
[4]《内蒙古红旗遍地飘》，195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5]《广东佛山公记隆厂一片读书声》，195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
[6]《红都瑞金基本扫除文盲》，1958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7]《昆山叙永乡乡社社办师范》，195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8]《文化革命开始了》，1958年6月9日《人民日报》。
[9]《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1页。
[10]《我国文化面貌正在飞跃变化》，1958年8月7日《光明日报》。
[11]《祖国教育事业百花齐放万马奔腾》，1958年10月1日《光明日报》。
[12]《全民办学，满园花开》，1958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13]《文盲帽子摘掉了，业余教育紧跟上》，195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14]《努力巩固扩大扫盲成果》，195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15] 刘英杰：《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下，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5页。
[16]《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7页。
[17] 何辛：《广东教育50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24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6页。
[20] 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882页。
[21] 查尔斯·赫梅尔著，王静等译：《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60页。
[22]《列宁教育文集》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269页。
[2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译：《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0～71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

第 8 卷第 1 期 经 济 学 (季 刊) Vol. 8, No. 1
2008 年 10 月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October, 2008

为何 1959—1961 年大饥荒终结于 1962 年

范子英 孟令杰 石 慧 *

摘 要 中国大饥荒在 1962 年结束是一个谜, 原因在于该年粮食产量并没有上升, 医疗水平和分配体制也没有大的变化。我们分析得出: 公共食堂、达尔文现象和政策惯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公共食堂的建立和废除与饥荒的发生和终结在时间上有一致性, 但是省级层面的数据只支持达尔文现象, 认为一个省份较早结束饥荒是饥荒本身的一个自然反应, 那些遭受饥荒越严重的地方越容易结束饥荒, 但是政策的惯性延缓了饥荒的终结。

关键词 饥荒的终结, 公共食堂, 达尔文现象

一、引 言

中国 1959—1961 年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饥荒 (Chang and Wen, 1997), 在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和持续时间上都是少见的。在非正常死亡人数方面, 估计的数值在 1 650 万至 4 300 万之间变动 (Coale, 1981; Aird, 1982; Ashton, 1984; Peng, 1987; Cheng, 1994), 这样的规模是 1943 年“孟加拉大饥荒”的 5 倍至 10 倍 (Sen, 2006)。在持续时间方面, 最早是在 1958 年冬天在某些省份发生了, 比如四川、甘肃、安徽和云南[1], 大规模的爆发是在 1959 年春天 (Peng, 1987), 到 1962 年大部分省份已经脱离了饥荒, 但是吉林和福建到 1963 年才结束。

对这次饥荒发生的原因和饥荒的分布, 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粮食产量下滑是一个重要因素, 而导致这种下滑的主要是体制上的变化, 比如“退社权”的丧失 (Lin, 1990)、资源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 (Li and Yang, 2005)。

* 范子英,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孟令杰, 南京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石慧,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 范子英, 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200433; 电话 (021) 55074288; E-mail: ivannj@163.com。作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美国三一学院文贯中、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彭希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陆铭、陈钊、王永钦、张晏、章元、姜建强、高远、美国 Cornell 大学应用经济系陈希和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谷成提供的宝贵修改意见, 本文曾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珞珈青年学者经济与管理论坛和第七届中国经济学年会报告过, 感谢与会者提出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1] 而同期其他省份相对于前一年死亡率都是下降的 (Peng, 1987), 对于饥荒在这一年爆发, Chang and Wen (1997) 认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公共食堂的过度消费导致某些地区吃了“过头粮”, 而 Kung and Lin (2003) 认为是由于这些省份往外调粮和重体力劳动太多导致的。

在粮食下降同时，征购幅度上升导致农村余粮减少也是一个因素 (Bernstein, 1984)，但这仅仅改变的是粮食分配，或者说征购率的变化是在不同群体间进行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其结果是各群体所能获得的粮食量，比如说粮食分配中存在"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即偏向于城市居民和缺粮区居民 (Lin and Yang, 2000; 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 2007)。另外有一些特殊的体制可能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如公共食堂，不过这一假说还具有一定的争议 (Chang and Wen, 1997; Kung and Lin, 2003)。

中国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还有很多未解释的疑点，其中一个是饥荒在 1962 年的结束 (Chang and Wen, 1997; Johnson, 1998; Riskin, 1998)，因为 1962 年的粮食产量比 1959 年还要低，即使是考虑人均粮食产量亦是如此，而 1959 年饥荒开始大范围爆发。从图 1 可以看出，粮食总产量在 1962 年为 16 亿吨，要低于 1959 年的 17 亿吨，因而粮食总产量无法解释饥荒为何在 1962 年终结；从微观层面来看，人口数量可能是一个影响因素，因为影响一个人挨饿的是人均粮食，但 1962 年的人均粮食产出同样要低于 1959 年；如果考虑在 1961 年之前粮食一直是出口的，1961 年才变为净进口，并且当年的进口量比之前所有年份总进口量还要多 (见附表 1)，纳入了进出口之后的人均粮食供给依然支持之前的结论。如果考虑城乡和省份之间的差别，这种结论更加显著，农村人均消费量在 1962 年和 1963 年比 1959 年低 12% (Chang and Wen, 1997)；同样在一些人口大省，比如河南和湖北，1962 年人均可获得的粮食量分别为 151 千克和 159 千克 (Peng, 198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两个省份相对于其他省份较早地结束了饥荒。这样，粮食产量似乎不是这次大饥荒结束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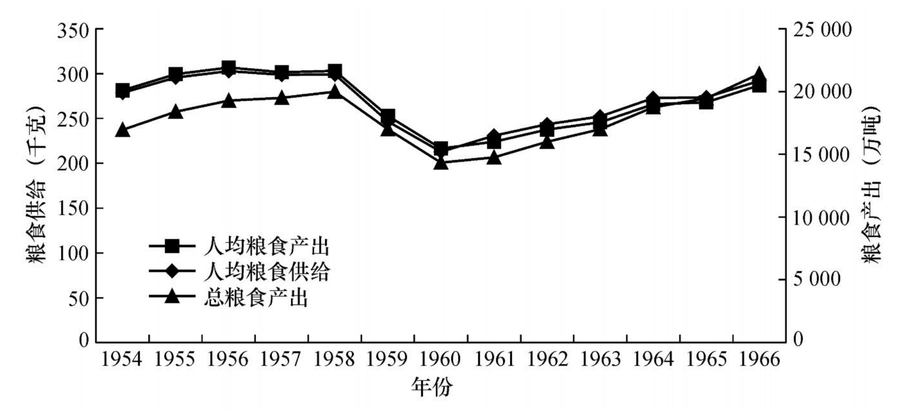


图 1 历年粮食产出

数据来源：《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

当粮食产量本身没有对这次饥荒的终结产生影响时，许多从粮食产量来解释饥荒发生的假说在解释饥荒的终结时就没有说服力了。比如，Lin (1990) 提出的"退社权"，认为这导致了农业生产在 1959 年的滑坡；Li and

Yang (2005) 提出政府从农村抽调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农业生产，进而影响了粮食生产。在粮食产量没有大幅度上升，同时分配体制也没有变革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使得这次饥荒如此“突然”结束？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将对各种可能的因素进行梳理，进而得出一个启发性的结论，据我们所知，还没有文献对这方面进行过研究。

本文接下来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从逻辑上排除常见的能够解释饥荒终结的因素；第三部分介绍可能影响这次饥荒终结的因素，并从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进行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二、饥荒的终结

历史上的大部分饥荒的发生和终结都是伴随着人口死亡率的变动，虽然营养不良也是常被使用的一个指标，但由于其无法与其他公共危机分开，因而较多使用死亡率来度量饥荒 (彭尼·凯恩，1993)。不过饥荒与死亡率之间有一个时滞，特别是在饥荒结束时，较高的死亡率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比如在 1943 年的孟加拉大饥荒，虽然在 1944 年食品的供给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但由于饥荒引起了流行病，至少到 1947 年，也许迟至 1951 年，死亡率才恢复到正常水平 (Sen，1981；Greenough，1982)。

当我们考察中国 1959—1961 年大饥荒时，这种现象却呈现相反的迹象。如附表 1 所示，当饥荒在全国范围内结束时，粮食产量并没有恢复到饥荒前的正常年份，甚至还低于饥荒开始的年份 (1959 年)，饥荒居然在粮食产量恢复之前结束，这与历史上的其他饥荒显著不同。这可能是由于人口流动模式的不同，在 Sen 考察的饥荒中，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中国在“一五”期间为了有效分配粮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这一制度在饥荒中有效地防止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2]，对于流行病的爆发有克制作用，例如，在孟加拉大饥荒中，常见的流行病有霍乱、疟疾，而在中国 1959—1961 年饥荒中，常见的只有浮肿病，而浮肿病主要是营养不良的表现，并不是流行疾病 (罗平汉，2001)。

但是当考虑分省的数据时，上述解释就不是太有说服力。由于各省的自然条件和医疗水平不同，没有理由认为各地在正常年份的死亡率会一致，因而我们采用 Chang and Wen (1997) 的做法，将各省 1955—1957 年的死亡率平均值作为该地的正常水平，以饥荒年份各年的死亡率减去该平均值，得到超额死亡率，该指标代表了当地的饥荒在不同年份的变动，本文定义当超额

[2] 不过小规模的人口流动还是存在的，比如从广东一带迁移到香港，这部分可见 Douglas Almond, Lena Edlund, Hongbin Li and Junsen Zhang,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1959—1961 China Famine: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NBER Working paper 13384, http://www.nber.org/papers/w13384.

死亡率小于 1 ‰时为饥荒的结束[3]，虽然全国性饥荒在 1962 年结束了，但统计数据显示在一半省份，饥荒在 1961 年就结束了，比如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等 16 个省，因而有理由相信这些省份在 1961 年的粮食产量应该也较其他省份高，但事实与此相反。如图 2 所示，1961 年各省人均粮食产量与死亡率呈现微弱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 01，因而很难说明饥荒的结束与粮食产量有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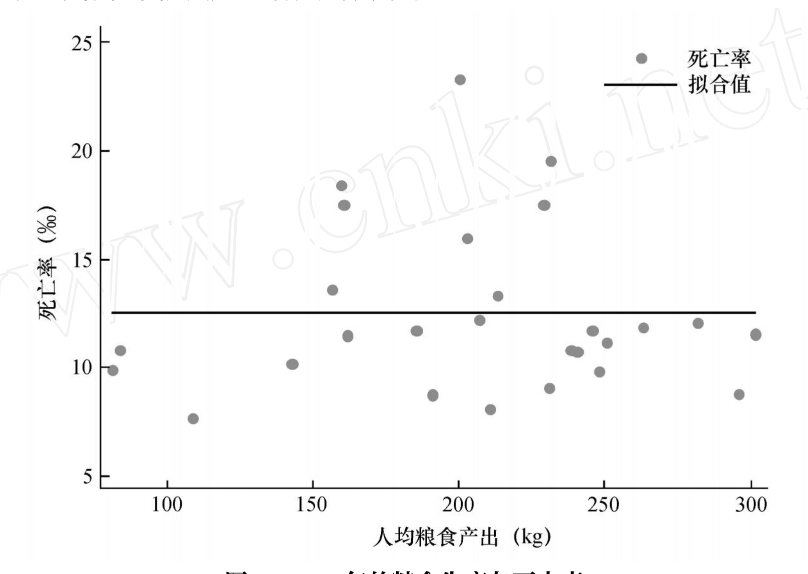


图 2 1961 年的粮食生产与死亡率

数据来源：同图 1。

在由饥荒导致疾病进而导致过度死亡的情况下，医疗水平的改善能够降低死亡率，但是数据显示在 1961 —1963 年间医疗水平并没有提高，甚至还部分下降了。如附表 1 所示，全国医疗技术人员（包括医生和护士）在 1961 年相对于饥荒年份（1960 年）有所下降，到了 1962 年继续下降，1963 年有所回升，但依然低于 1960 年的水平。另外，医疗水平很难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改善，即使由于人为原因出现改善，这种改善在短时间也未能发挥作用；再者，如上文所说，中国饥荒所伴随的流行病主要是浮肿，而不是疟疾，即使医疗水平大幅度改善，也未必能够降低死亡率。

当医疗水平和粮食产量都不足以终结这次饥荒时，有可能产生影响的一个因素是改变了分配体制，使得粮食的分配更加平均。在饥荒发生前，当时的政府为了贯彻重工业化战略，根据“霍夫曼定律”[4]不得不提高积累率，但

[3] 为了检验关于正常死亡率的定义，本文也曾遵循 Chen and Zhou (2007) 年的做法，将 1956 —1958 年作为正常年份，结果相差不大，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稳健的。

[4] Hoffmann (1958) 对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发展程度与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正相关，也就是说重工业化比重高的国家其工业化程度也较高，这一定律称为“霍夫曼定律”。这一理论成为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重工业化战略的理论基础。

当时的城市经济并不允许这样做，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不能大幅度降低工资，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在工资降低的同时生活水平保持不变，国家对居民生活资料中的农产品进行了统购，特别是对粮食的统购更加严格[5]，由于统购是为了保障城市居民的供给，因而在统销的时候最先照顾城市居民，即在粮食分配中存在一个"城市偏向"(Lin and Yang，2000)；同时政府对那些不种植粮食以及粮食不能自给的农村地区也实行粮食的"定销"，即对农村"缺粮区"进行返销，这部分居民在粮食分配上仅次于城市居民（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这种粮食分配上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在 1961—1963 年基本没有改变，城市居民依然获得足够的粮食，1962 年城市居民可获得的粮食为 184 千克，低于 1959 年的 201 千克，而 1962 年农村居民可获得的粮食仅为 161 千克，虽然比 1960 年和 1961 年稍高，但远远低于 1959 年的 183 千克，1962 年的这些指标也低于 1959 年的水平（Chang and Wen，1997）。[6]因而粮食分配体制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动，即饥荒的结束与分配体制没有直接关系。

三、可能导致饥荒终结的因素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排除了终止饥荒的常见因素，但同时也忽略了一些特殊的因素，比如由于饥荒过高的死亡率导致饥荒前后人口结构的大变动，这样饥荒前后的个体就不同了，整体应对饥荒的能力在前后也就出现差异；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体制影响了消费效率，比如公共食堂，同样的粮食所能维持的人口数也就不一样。

(一)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大规模建立于 1958 年秋，是人民公社的一个附属品，公社人员被强制要求到公共食堂就餐，以此来解放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以从事农业生产[7]，这样便于国家组织男性劳动力从事大规模的运动，比如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到该年 10 月份有 70 %—90 %的农村人口被组织到公共食堂就餐（薄一波，1993 年，第 749 页）。在建立食堂的过程中，除了没收农户的粮食作为公共粮食外，还将农户的锅等铁制炊具集中熔化，这使得农户在公共食堂之前就将自家的粮食吃光，对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但公

[5] 比如 1953 年实行了"计划收购"，1955 年实行了"三定"政策，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第 268、274 页。

[6] Berstein(1984) 认为征购率在 1959 年的上升是导致饥荒爆发的原因，但从附表 1 可以看出，征购率上升并没有大幅度减少农村居民可消费的粮食，并且我们认为征购率的变动只是一个过程，它并不直接影响死亡率，要通过可消费粮食量来间接影响死亡率。

[7] 有 80 %的妇女在这一时期参加了农业生产。见 Kane(1987)。

共食堂的负面作用远不止此。由于公共食堂实行了食物分配的均等化，劳动的投入与最终的食物消费没有直接的联系，不管个人投入的多少，最终的消费量基本相同，因此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都下降了，产生了搭便车行为(Chang and Wen，1997；Kung and Lin，2003)，产生了劳动的激励问题，实际投入到农业中的劳动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

由于公共食堂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使得办与不办成了是否拥护社会主义的标准（罗平汉，2001)，因而即使认识到公共食堂的负面作用，从法律上解散公共食堂也经历了一个过程。1960 年秋的《农业十二条》就是在认识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弊端后，开始强调生产队的所有制，但依然没有改变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并且这至多也是一个党内的条例（薄一波，1993 年，第 916 页)；直到 1961 年 6 月公布的《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才明确指出办与不办公共食堂依据自愿原则，当公共食堂的解散得到法律上的允许时，绝大部分的农户退出了公共食堂。[8]

当政府明文规定可以解散公共食堂时，大部分的省份都停办或者缩小公共食堂，在我们收集的数据中，绝大部分省份在 1961 年就解散了公共食堂，很多省份在《农业六十条》正式公布之前就宣布解散公共食堂，只有少数省份，比如河南、山东和吉林是在 1962 年初才宣布解散（见表 1)。[9]当我们将饥荒结束的时间和公共食堂结束的时间进行对比时（见表 2)，在所收集的 17 个样本中，有一半的省份是在 1961 年解散公共食堂的同时也结束了饥荒，但这部分省份并不是最早解散公共食堂的，而是到了 1961 年中期才开始宣布解散；相反，那些在 1961 年初[10]就宣布解散的省份大部分都没有在当年就结束饥荒，比如湖南和河北；还有一些省份，虽然到 1962 年才开始解散公共食堂[11]，但是其饥荒却在前一年就结束了，比如河南省。

[8] 比如河北邯郸调查组显示有 90 %的农户赞成停办食堂，海城调查组显示没有一人愿意留在公共食堂。见薄一波(1993，第 928 页)。

[9] 我们从《当代中国丛书》找到部分省份关于公共食堂的描述，这是目前为止唯一找到的关于公共食堂结束的历史记载，这套丛书从 1983 年开始着手，由邓力群、马江和任武衡担任主编，由各部办委领导，理论界、学术界领衔人组成编委会(薛幕桥、杜润生、于光远等)，历时 15 年，于 1998 年 10 月全部完稿，该套丛书分五大类，我们这里使用的是第四类 ——地区卷。

[10] 这里的解散是在《农村六十条》正式公布之前，可能的原因是这些省份是 1961 年中央重点进行调查的省份，因而得以提前解散食堂。

[11] 有一些省份在 1962 年才解散公共食堂，而不是在《农村六十条》公布之时，主要原因是当地的领导人还保持着原有的思维惯性，比如山东省第一书记的曾希圣，以及河南省的吴芝圃。评审人指出这点，特此感谢。

表 1　各地公共食堂解散的时间

省份	时间	省份	时间
河南	1962 年*	内蒙古	1961 年 6 月
湖南	1961 年 3 月	吉林	1962 年 3 月*
江西	1961 年下半年	黑龙江	1961 年 6 月
江苏	1961 年*	湖北	1961 年 5 月
河北	1961 年春	四川	1961 年 7 月
广东	1961 年*	云南	1961 年底
福建	1961 年夏	陕西	1961 年底
山东	1962 年初	宁夏	1961 年 7 月
山西	1961 年 2 月		

注：*标注的省份是以将核算单位缩小到生产队的时间作为公共食堂的结束时间。[12] 数据来源见附录。

表 2　公共食堂与饥荒结束时间的关系

公共食堂 / 饥荒结束		是否是 1961 年结束	
		是	否
是否是 1961 年结束	是	8	1
	否	6	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表 1 整理。

虽然从国家层面上来说，公共食堂的结束与饥荒的结束是基本一致的，公共食堂的解散可能是导致饥荒大范围结束的一个因素。公共食堂的解散最大的好处是提高了消费的效率，防止了过度消费，使得等量的粮食可以支撑更多的人口。另外公共食堂的解散恢复了家庭作为消费单位，这对于后期的农业生产有正面的激励，不过从统计上看主要对于 1964 年之后的粮食产量有影响。[13] 但是省级层面的数据暗示了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导致了各省之间的差异。

(二) 达尔文现象

在经过大饥荒的冲击后，有理由认为之后的人口结构会发生变化，即经济体中的个体与之前的个体有差异。在一般的饥荒分析中，家庭内部的食物分配往往存在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家庭中的优先权常常是亲男性的，但女性对于饥饿的承受能力往往要强于男性（让 ·德雷兹和阿玛蒂亚 ·森，2006 年，第 58 页），因此女性死亡增长率要低于男性，中国大饥荒也呈现相同的形式（Hill，1988）；在年龄方面，婴儿的优先权往往是最优的，而老人是最

[12] 由于这些省份没有关于公共食堂结束的记载，我们只能用核算单位的缩小时间来替代，这样做的理由是因为在《农村六十条》里同时对公共食堂和基本核算单位做了规定，我们认为当把核算单位缩小后就表示贯彻了《农村六十条》，因而也就解散了公共食堂；即使剔除掉这些没有记录的省份，结论依然成立，我们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公共食堂的结束时间相对而言比较一致，但是饥荒的结束时间却不是，因而不能以公共食堂的结束时间来解释饥荒的结束。

[13] 这一点是文贯中教授指出的，特此感谢。

差的，不过这两个群体的抵御能力都是最差的。因此可以认为，饥荒类似于一次自然选择的过程，将应付饥荒能力最弱的群体淘汰掉，剩下的就是那些最适宜生存的群体，这些就是达尔文现象。[14]

从时间趋势来看，饥荒前后的两次人口普查（即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和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我们了解达尔文现象提供了基本的数据。1953 年的人口年龄分布中 36—45 岁群体占 11. 7 %，仅次于 26—35 岁群体和 7—12 岁群体，而该群体到 1964 年时的年龄段是 46—55 岁，这个年龄段在当时已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假如没有饥荒的侵袭，可以预料 1964 年的老年人口比重可能会上升。从图 3 可以看出，与 1953 年相比，1964 年的老年人口比重下降了，而同期年轻群体的比重上升。在前三次人口普查中，1964 年的老年人口比重最低，这种下降很可能是由于饥荒导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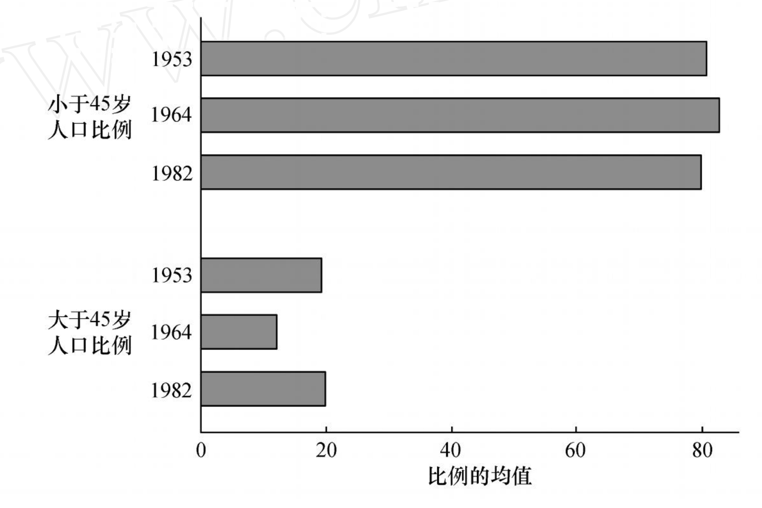


图 3　三次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年鉴 1988》。

如果达尔文现象成立的话，那么死亡率的下降有可能就是人类的一个适应性的调整过程，也就是说饥荒的终结本身就是饥荒的一个自然结果，即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饥荒也会慢慢消失。在达尔文现象的假设下，时间跨度上可能很难区分，但是截面上的区分还是可能的，当饥荒年份某省的死亡率较高时，在饥荒结束后，该省的老年人口比例和儿童比例会很低，因此可以预计各省青壮年人口比例与饥荒年份的平均死亡率有正相关。

在饥荒结束后不久的 1964 年进行的第二次人口普查为我们了解达尔文现象是否存在提供的证据，由于距离饥荒年份较近，可以认为没有外生因素会

[14] 达尔文现象包含的内容远不止这些，比如在经历过饥荒后，人们可能更擅长于找到替代的食物，如野菜等，或者更能够安排好食物的消费，身体也更能够适应长时间的饥饿。见 Kung and Lin (2003)。

影响这时的人口结构，从图 4 可以看出，在 1964 年的年轻人口比重和饥荒严重程度之间有明显的正向关系，这说明在那些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对于老年和儿童的淘汰程度比其他地区要高，这些体弱者对于饥荒的抵御能力较弱，因而在饥荒中更容易死亡，这样剩余人口中青壮年的比重就会上升，比如饥荒极其严重的四川、安徽和贵州就落入了两条均值线的右上方，饥荒就类似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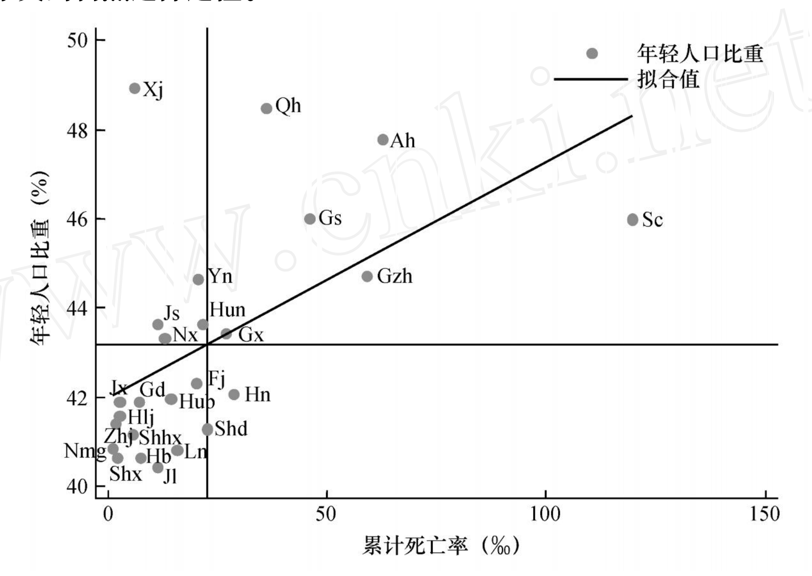


图 4　达尔文现象

数据来源：《中国人口年鉴 1988》、《新中国 50 年统计资料汇编》。

从而，建立如下模型来估计两者之间的关系：

$$Young_i = \alpha_0 + \alpha_1 CEDR_i + \alpha_2 DHPR_i + \mu_i, \tag{1}$$

其中 Yong **是各省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年龄在** 14—43 **岁人口的比例**[15]；CEDR (Cumulative Excessive Death Rates) **代表在饥荒年份累计的非正常死亡率，计算的方法参照** Chang and Wen (1997)，**以** 1955—1957 **年作为正常年份，然后用** 1958—1962 **年的死亡率减去这个正常死亡率，再求和（见附表** 3)[16]；DHPR (Dining Hall Participation Rates) **是** 1959 **年的公共食堂参与率，该指标反映了公共食堂的执行力度以及政府政策的偏激程度；** μ **是扰动项。我们预计** $\alpha_1 > 0$ **并且显著。表** 3 **列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 4 **列出了模型（**1**）的结果。**

---

[15] Aston 等(1984) 计算得出死亡人口大部分在 10 岁以下，Coale(1981) 认为年长者死亡最多的是 40 岁以上人群，这样 10—39 岁人群是较易度过饥荒的群体，到 1964 年，这部分人群的年龄段为 14—43 岁。

[16] 这里有一点与 Chang and Wen(1997) 不同的是我们只是用正数求和，对于负数已经不属于非正常死亡了，所以剔除了。

表 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量
DHPR	64. 672	26. 047	16. 7	97. 8	25
CEDR	22. 645	26. 403	1. 067	119. 65	25
Party	1. 339	0. 642	0. 71	3. 14	24
Distance	1 648. 28	926. 681	283	3 774	25
Young	43. 180	2. 540	40. 42	48. 932	25

注: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

表 4 模型 (1) 的计算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P
CEDR	0. 048 **	0. 018	0. 014
DHPR	0. 013	0. 018	0. 494
R^2	0. 320	样本量	25

注: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5 %。

从计算的结果来看, 达尔文现象是存在的, 饥荒越严重的地方对体弱者的淘汰也越严重, 累计的非正常死亡率每增加 1 %, 将使得当地年轻人的比重提高 0. 48 %, CEDR 的最高值和最低值之间相差 11. 8 % (见表 3), 这将使得年轻人的比重相差 5. 7 %。而公共食堂参与水平对于各地幸存者的年龄结构没有显著影响。

由于我们排除了其他因素对于饥荒终结的影响, 达尔文现象的存在证明了 1959 —1961 年饥荒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类自我适应的结果。经过饥荒进行选择后的群体在体质上相对于其他群体有优势, 因此这些群体在面对下一次危机时也会更加容易。[17]

(三) 省份间的差异

虽然全国性饥荒的结束是在 1962 年, 但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到 1961 年就结束了, 这种省与省之间的差异到底是由于公共食堂解散的早晚导致的、还是由于达尔文现象导致的? 还是有其他我们未涉及的因素? 前面的分析已经排除了公共食堂解散时间对饥荒终结的影响。可能有影响的是各地对公共食堂的组织程度, 从附表 2 可以看出, 各地对公共食堂的参与程度是有差异的, 这在饥荒发生期间产生了影响 (Chang and Wen, 1997), 因而有理由相信那些公共食堂参与水平低的省份, 当地的政策不是很激进, 因而居民有较大的自由, 应对饥荒的策略也较多, 所以死亡率会较低, 饥荒结束相对于其他省份要早。

另外, 如果达尔文现象成立的话, 则说明那些老人和儿童占总人口比重越小的省份越易走出饥荒的阴影, 因为剩余人口有更好的体魄, 在应对饥饿以及疾病的时候更有抵抗力, 并且对生产的贡献更大, 更易摆脱饥荒的影响。

[17] 曹树基(2005)曾论证“历史记忆”在大饥荒中的作用,认为历史上的饥荒或者战争会使得该地区居民更容易应对未来的危机。

横截面上的差异使得我们可以将公共食堂和达尔文现象放到同一个框架内比较，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我们收集的数据，建立如下模型：

$$\mathrm{Probit}(\mathrm{End}=1)_i = \beta_0 + \beta_1 \mathrm{Young}_i + \beta_2 \mathrm{DHPR}_i + \beta_3 \mathrm{CEDR}_i + \mu_i, \quad (2)$$

其中当某省是在 1961 年前（含当年）结束饥荒时，End 取 1，之后结束则取 0；Young、CEDR 和 DHPR 的定义与前面相同，系数 β_1 用来衡量达尔文现象的解释力，当达尔文现象存在时，某省青壮年越多则说明越容易度过饥荒，因而更容易在 1961 年结束饥荒，所以我们预测 $\beta_1 > 0$；DHPR 是一个省份 1959 年参与公共食堂的人口比重（Dining hall participation rates）的对数，用来衡量公共食堂在省级水平上影响的差异，公共食堂参与率越低饥荒结束得越早，因而我们预测 $\beta_2 < 0$；CEDR 代表一个地区饥荒的严重程度，而这种严重程度会受一个地区政策的激进程度的影响，政策越激进，越不容易寻求途径来结束饥荒，因而预测 $\beta_3 < 0$，同时该变量会影响 Young，进而影响饥荒结束的早晚，因而 $\beta_3 > 0$，所以 β_3 还无法确定，如果不控制该变量的话，会由于遗漏变量导致 Young 的内生性。

在饥荒严重的阶段，有的省份开始向中央求援，比如 1960 年的 11 月，中央向山东调拨 10 亿斤粮食用于救灾，而同期遭受饥荒更严重的四川却在往外调运粮食，可见各地政府在面临饥荒时的对策是存在差异的。那些政策比较缓和的地方政府在意识到灾难的严重性时，会向上一级政府求助，而那些激进的政府，为了表示自己“忠心”（Kung and Lin，2003），即使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刻都往外调拨粮食，以此来掩盖灾情。地方政府的这种诉求的差异会导致各地在粮食分配上的差异，进而会影响一个地方饥荒结束的早晚。由于缺乏相关的粮食库存的数据，我们选用一些变量来代理，第一个是各地在 1956 年党员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Yang（1996）的研究显示那些党员人数少的地方更倾向于激进政策，以此来表明自己在政治上并不落后；第二个是各省省会城市距离北京的距离，我们认为距离越远的省份，中央的影响力越弱，相应的政策就越缓和，在饥荒发生后更倾向于向中央政府求助。于是我们将模型（2）扩展为模型 3：

$$\mathrm{Probit}(\mathrm{End}=1)_i = \beta_0 + \beta_1 \mathrm{Young}_i + \beta_2 \mathrm{DHPR}_i + \beta_3 \mathrm{CEDR}_i + \beta_4 \mathrm{Party} + \beta_5 \mathrm{Distance} + \mu_i. \quad (3)$$

表 5 列出了模型（2）和模型（3）的计算结果，二者差异不大，只有 Young 和 CEDR 显著，其他变量都不显著，Young 的影响方向符合我们的预期，年轻人口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使得饥荒提前结束的概率提高 0.2（第四列的偏效应），样本中的年轻人口比重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 9 个百分点，这会使得概率变动大于 1，即使是按照标准差来计算，也会使得饥荒在 1961 年提前结束的概率提高一半；CEDR 的影响为负，说明一个地区的累计死亡率代表了政策的

激进程度，政策越激进，越不容易结束饥荒，累计死亡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将会使得饥荒以 0.025 的概率推迟结束，CEDR 变动一个标准差将使得饥荒在 1961 年结束的概率变动 0.7，如果从最小值变动到最大值将使得概率变动超过 1。公共食堂并不显著影响一个省份饥荒结束的早晚。在我们加入了诉求状况的代理变量后（表 5 第三列至第五列），达尔文现象的系数和显著性都没有受到影响，并且这种诉求状况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这里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当时政府可用来救济的粮食很少，对大范围的饥荒几乎没有作用；二是政府的救济行为效率不高，主要是缺乏饥荒严重的详细信息，没能把粮食送到那些最需要的人手中；三是这里的代理变量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代理。我们同样报告了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线性概率模型 LPM（表 5 第五列），发现除了由于估计方法导致的系数大小有差异外，显著性和影响方向与 Probit 的估计基本一致。

表 5 模型（2）与模型（3）的计算结果

变量	模型（2）	模型（3）		LPM
		Probit	dF/dX	
DHPR	0.003	0.004	0.002	0.001
	(0.013)	(0.013)	(0.005)	(0.004)
Young	0.531 **	0.539 *	0.211 *	0.109 *
	(0.265)	(0.295)	(0.116)	(0.058)
CEDR	-0.063 **	-0.065 *	-0.025 *	-0.012 **
	(0.031)	(0.033)	(0.013)	(0.005)
Distance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arty	—	-0.462	-0.181	-0.206
		(0.597)	(0.235)	(0.203)
Pseudo-R^2	0.252	0.270		0.276
样本量[18]	25	24		24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5%，括号内为标准差。

四、结　　论

我们从全国水平和省级水平说明了粮食产量的轻微增加并不足以导致饥荒在 1962 年结束，特别是有的地方在 1961 年就结束了饥荒，而同期粮食产量并没有大幅度上升，至少要远小于饥荒爆发的初始年份，即使考虑到进出口和城乡之间的差别，1961—1962 年的食物消费还是要远低于 1959 年的水平。虽然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次饥荒的爆发有粮食生产滑坡的影响，但是其结束却是粮食以外的因素导致的。另外医疗水平和分配体制也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医疗水平在 1960—1962 年间是下降的，分配体制由于大的政策环境没有

[18] 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剔除了海南、重庆、西藏、天津，另外北京和上海由于地位特殊也被排除在外。

变化，因而也没有改变。

从国家层面来看，饥荒的结束可能是公共食堂废除和达尔文现象共同导致的，前者在于公共食堂的起始与饥荒的起始有惊人的一致，公共食堂开始于 1958 年，结束于 1961 年；达尔文现象在于饥荒前后的人口结构不一致，饥荒结束后老人和儿童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剩余人口的抵御能力较高，因而较易走出饥荒。省级层面的数据并不支持公共食堂的因素，各省之间公共食堂参与水平的差异对饥荒的终结没有显著的影响；达尔文现象在省级水平上依然成立，考虑到饥荒本身在各省之间影响的差异导致了人口结构在饥荒后出现较大的差异，这样即使在控制其他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各省之间由于人口结构的差异其抵御饥荒的能力也是有差异的，因而那些老年和儿童人口较少的省份更容易脱离饥荒。政策的惯性在饥荒终结时仍然有影响，那些饥荒越严重的地区，激进政策在短时间内越难以扭转，因而饥荒结束得越晚。

本文由于数据的限制只是用代理考虑国家救荒的影响，计算的结果虽然没有显示国家救济行为的作用，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在 1961 —1962 年的救荒行为会对饥荒的终结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如果政府能够将库存粮及时分配到最缺粮的人群，将使得这些地区较快从饥荒中走出来。另外饥荒的发生、分布和终结是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比如进出口的影响、省份之间的粮食调拨等因素，这些都是今后需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另外有很多制度在 1961 —1962 年改变，比如自留地和农村集贸市场的恢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饥荒，但由于数据缺失以及没有截面上的差异，因而我们没有考虑。所以我们的结论还只是启发性的，我们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附表 1　国家层面的数据

年份	人均粮食产出（千克）	总进口量（百万吨）	总出口量（百万吨）	净进口量（百万吨）	人均粮食供给（千克）	医疗技术员（万人）	消费量（千克）		
							全国	城镇	农村
1954	281. 3	0. 0	1. 7	- 1. 7	278. 5	85. 4	196	236	190
1955	299. 3	0. 2	2. 2	- 2. 1	295. 8	87. 4	198	214	196
1956	306. 8	0. 2	2. 7	- 2. 5	302. 8	98. 8	204	200	205
1957	301. 7	0. 2	2. 1	- 1. 9	298. 7	103. 9	203	196	204
1958	303. 1	0. 2	2. 9	- 2. 7	299. 0	132. 9	198	186	201
1959	252. 9	0. 0	4. 2	- 4. 2	246. 7	139. 0	187	201	183
1960	216. 7	0. 1	2. 7	- 2. 7	212. 7	150. 5	164	193	156
1961	224. 0	5. 8	1. 4	4. 5	230. 8	149. 2	159	179	154
1962	237. 8	4. 9	1. 0	3. 9	243. 6	141. 4	165	184	161
1963	245. 8	6. 0	1. 5	4. 5	252. 3	145. 3	165	190	160
1964	266. 0	6. 6	1. 8	4. 8	272. 8	147. 9	182	200	178
1965	268. 2	6. 4	2. 4	4. 0	273. 7	153. 2	183	211	177
1966	287. 1	6. 4	2. 9	3. 6	291. 9	148. 1	190	206	186

数据来源：第二、七列来自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三、四、五列来自于 Ashton, B., K. Hill, A. Pizza, and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 —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 (4), 613 —645. 第六列根据前几列数据计算得出，第八、九、十列来自 Chang, G., and J.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 —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 (1), 表 1。

附表 2 各地公共食堂参与比率

东部			中部			西部		
地区	比重		地区	比重		地区	比重	
	1958	1959		1958	1959		1958	1959
北京	—	87.4	山西	85.6	70.6	广西	—	81.0
天津	—	—	内蒙古	—	16.7	四川	95.0	96.7
河北	94	74.4	吉林	—	29.4	贵州	—	92.6
辽宁	—	23.0	黑龙江	—	26.5	云南	72.9	96.5
上海	—	94.5	安徽	72.8	90.5	西藏	—	—
江苏	97	56.0	江西	—	61.0	陕西	94.2	60.8
浙江	—	81.6	河南	98.0	97.8	甘肃	—	47.7
福建	—	67.2	湖北	—	68.2	青海	90.0	29.9
山东	82	35.5	湖南	—	97.6	宁夏	—	52.9
广东	—	77.6				新疆	—	85.1

注:“—”表示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 1958 年河北省数据来自《大锅饭: 公共食堂始末》, 1958 年山西数据来自《当代中国的山西》, 1958 年安徽数据来自《当代中国的安徽》, 1958 年河南数据来自《当代中国的河南》, 1958 年云南数据来自《当代中国的云南》, 1958 年陕西数据来自《当代中国的陕西》, 1958 年青海数据来自《中国共产党青海地方组织志》, 1958 年山东数据来自山东省资料库, 1959 年资料来自《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附表 3 各省历年的死亡率变动 (‰)

省份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1955—1957 年平均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CEDR
北京	9.5	7.7	8.2	8.5	0.7	2.3	0.3	4.5
天津	9.9	8.8	9.4	9.3	1.0	0.6	-2.0	2.1
河北	11.6	11.3	11.3	11.4	4.4	2.2	-2.3	7.5
山西	12.9	11.6	12.7	12.4	1.8	-0.2	-1.1	2.2
内蒙古	11.4	7.9	10.5	9.9	-0.5	-1.1	-0.9	1.1
辽宁	9.4	6.6	9.4	8.5	3.0	9.0	0.0	15.8
吉林	9.9	7.5	9.1	8.8	1.3	3.2	1.1	10.5
黑龙江	11.3	10.1	10.5	10.6	-0.1	0.5	-2.0	2.7
上海	8.2	6.6	6.1	7.0	-0.1	0.7	0.2	1.8
江苏	11.8	13.0	10.3	11.7	6.7	1.7	-1.3	11.3
浙江	12.6	9.5	9.3	10.5	1.4	-0.6	-1.8	1.8
安徽	11.8	14.3	9.1	11.7	56.9	-3.6	-3.5	62.5
福建	10.4	10.2	9.8	10.1	10.6	5.9	1.5	20.3
江西	16.2	12.5	11.5	13.4	2.7	-1.9	-2.4	2.7
山东	13.7	12.1	12.1	12.6	11.0	5.8	-0.2	22.5
河南	11.8	14.0	11.8	12.5	27.0	-2.3	-4.5	28.8
湖北	11.6	10.8	9.6	10.7	10.5	-1.6	-1.9	14.4
湖南	16.4	11.5	10.4	12.8	16.7	4.7	-2.5	21.6
广东	10.6	11.1	8.4	10.0	5.2	0.8	-0.6	7.1
广西	14.6	10.4	12.1	13.1	16.3	6.4	-2.9	27.1
四川	9.2	12.5	12.4	10.6	43.4	18.9	4.1	117.4
贵州	16.2	13.0	12.4	13.9	38.5	9.4	-2.2	55.7

（续表）

省份	1955 年	1956 年	1957 年	1955 —1957 年平均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CEDR
云南	13. 7	15. 2	16. 3	15. 1	11. 2	- 3. 2	- 4. 2	20. 6
陕西	10. 5	9. 9	10. 3	10. 2	2. 0	- 1. 5	- 0. 9	5. 3
甘肃	11. 9	10. 8	11. 3	11. 3	30. 0	0. 1	- 3. 1	45. 9
青海	14. 6	9. 4	10. 4	11. 5	29. 3	0. 2	- 6. 1	36. 1
宁夏	10. 2	10. 6	11. 1	10. 6	3. 3	0. 1	- 2. 1	12. 9
新疆	14. 4	14. 2	14. 0	14. 2	1. 5	- 2. 5	- 4. 5	6. 1

注：第 2、3、4 列分别为 1955 —1957 年各省的死亡率水平值，第 5 列为 1955 —1957 年的平均值，第 6、7、8 列分别为 1960、1961、1962 年死亡率的水平值减去第 5 列。水平值来源于 Lin and Yang (2000)，超额死亡率的计算方法来自 Chang and Wen (1997)，而最后一列为累计的超额死亡率，为 1958 —1962 年各年的超额死亡率的累加。



附图　饥荒结束时间图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附录　公共食堂结束时间的数据来源

张树德、侯志英，《当代中国的河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38 页。

刘正，《当代中国的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39 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江西》，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第 448 页。

刘定汉，《当代中国的江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10 页。

解峰，《当代中国的河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第 101 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广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年，第 98 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福建》，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 年，第 118 页。

郑伟民,《当代中国的山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第 200 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山西》,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第 126 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内蒙古》,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 第 110 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吉林》,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第 468 页。
陈雷、侯捷,《当代中国的黑龙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第 1358 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湖北》,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第 121 页。
杨超,《当代中国的四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 109 页。
高治国,《当代中国的云南》,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第 126 页。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陕西》,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 第 143 页。
李恽和、丁国民,《当代中国的宁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 127 页。

参 考 文 献

[1] Aird, J., "Population Studies and Population Policy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2, 8(2), 267—297.

[2] Almond, D., L. Edlund, H. Li, and J. Zhang,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1959—1961 China Famine: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NBER Working Paper 13384, 2007, http://www.nber.org/papers/w13384.

[3] Ashton, B., K. Hill, A. Pizza, and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4), 613—645.

[4] Berstein, T.,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3), 339—377.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年。

[6] 曹树基,"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 1 期,第 14—28 页。

[7] Chang, G., and J.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1), 1—34.

[8] Chen, Y., and L. Zhou, "The Long-term Health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1959—1961 Famine in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7, 26(4), 659—681.

[9] Coale, A., "Population Trends, Population Polic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1, 7(1), 85—97.

[10] 范子英、孟令杰,"有关中国 1959—1961 年饥荒的研究综述",《中国农村观察》,2005 年第 1 期,第 66—71 页。

[11] 范子英、孟令杰,"对阿玛蒂亚 · 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2006 年第 8 期,第 104—113 页。

[12] 范子英、孟令杰,“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经济学(季刊)》,2007 年第 6 卷第 2 期,第 487—512 页。

[13]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

[14]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

[15]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88》。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年。

[16] Hoffmann, W.,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58.

[17] Johnson, D.,“China's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03—109.

[18] Kane, P., *The Second Billion: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Melbourne: Penguin Books, 1987.

[19] Kung, J., and J. Lin,“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1), 51—73.

[20] Li, W., and D. Yang,“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2005, 113(4), 840—877.

[21] Lin, J.,“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6), 1228—1252.

[22] Lin, J., and D. Yang,“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0(460), 136—158.

[23]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24] Peng, X.,“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7, 13(4), 639—670.

[25] 彭尼·凯恩,《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郑文鑫、毕健康、戴龙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

[26] 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苏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27] Riskin, C.,“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11—124.

[28] Sen, A., *Poverty and Famine*. Oxford, U.K.: Clarendon Press, 1981.

[29] Yang, D.,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Why Di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 —1961 End in 1962

ZIYING FAN
(Fudan University)
LINGJIE ME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I SHI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literature of famine, a question yet to be answered is why the Great Leap-forward famine ended in 1962 when the output of grain was still lower than that of 1959, the year when the famine broke out. There are possibly three competing hypotheses: 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al dining system, the Darwinian conjecture, and the inertia of government's policy. Based on provincial level data, we find that only the second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which means that it was natural selection —the weak died and the survivors were strong enough to endure the famine —that brought the famine to an end. We also find that government inertia delayed the ending of the famine.

JEL Classification I38, N55, Q18

江苏社会科学
Jiangsu Social Sciences
2005年第2期

有关中国1959－1961年饥荒的研究综述

范子英　孟令杰

内容提要　近年来有关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解释是众说纷纭。本文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归类、解释并给出评论，我们力图得出能够较好地解释历史现象的理论，并指出一些还没有解释的问题和疑点。

关键词　饥荒　FAD　食物获取权　公共食堂

范子英，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210095
孟令杰，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210095

一、引　言

传统的解释饥荒成因的理论有食物供应量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FAD)和由Sen开辟的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的丧失。前者着重于从供给方面找出原因，认为战争、自然灾害等可以在某一地方影响农业产出，导致食物供应量急剧下降并最终导致饥荒;后者则强调饥荒是一个地区大量人口不能获得足够食物的状况，尽管人均粮食产出的不足可能导致饥荒，但Sen发现在某些地区在人均粮食不变的情况下，饥荒也可能发生，这可能缘于部分人口的禀赋发生了变化，也可能是由于粮食的相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Sen所提出的理论为饥荒成因的研究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指出由非不可抗因素导致饥荒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理论现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80年代初有关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统计数据逐渐公布，从现有的统计资料看，1959－1961年我国直接人口损失一千多万，农业产出仅1959年就下降了15%，可以猜想:这三年我国经历了一场大范围的灾难。在有关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特别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方面，国内外学者做了深刻的研究。Ansley(1981年)估计的结果是1650万，John(1982年)和Peng(1987年)估计为2300万，Ashton(1984年)估计为2950万，Banister(1987年)估计为3000万，Cheng(1994年)估计为4300万，另外由于这三年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的没有出生或推迟出生的人口约为3300万(Ashton等, 1984)。我们仅列出这些数字以说明灾难的严重性，至于到底哪个更符合实际情况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对这场灾难的起因研究，许多学者有过研究，但至今也莫衷一是。最早的研究要追溯到1984年的Bernstein，他指出由于政府的征购率过高导致农民剩余粮食减少并最终导致饥

荒;1990 年林毅夫以退社权的丧失解释农业生产率下降并一直徘徊不前,从这个角度来看,林文可算是用 FAD 方法来解释饥荒;1996 年杨大利首先指出饥荒是由于非理性消费造成的,在杨文中有两个观点:一,公共食堂是公共财产,最终导致公地悲剧,造成过量消费,形成饥荒;二,对于各地死亡率的差别,杨用计量方法得出地方忠诚度 – 用党员密度度量(Party membership density – PMD) – 是关键因子;1997 年文贯中和张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是饥荒的导火线,即最初的饥荒并非由于 FAD 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费供应和不设上限供应导致的;可以看出上述两文的观点既不属于传统的 FAD 方法也不属于 Sen 所提供的食物获取权的丧失,而是相对于中国当时特殊国情的一种新解释;最新的研究有 2003 年周飞舟利用分省的数据资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时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导致饥荒及饥荒差异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销粮发放数量的加大来说明饥荒发生时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应,在用省际调粮高昂的执行成本和迫于政治压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来说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林毅夫和杨涛 2000 年撰文指出城市偏向才是决定一省人口死亡率的主要因素,他们用计量方法将城市偏向(农村人口比例)和食物供应量(人均粮食产出)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最终得出前者要远比后者显著。

本文将以上观点归为三种假说,即食物供应量的下降(FAD)、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和制度因素,并对其中的某些观点进行讨论,最后我们将指出现有的还未得到解释的问题。

二、分 析

假说一:食物供应量的下降(FAD)

FAD 是指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某些人为或非人为因素导致粮食大范围或局部的急剧减产,人均粮食供应量下降,于是形成饥荒。当然,这里的粮食减产可能是由于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自然因素,比如说政策因素,在这里我们对应的列出两种解释。

1.“三年自然灾害”

自政府开始承认 1959 – 1961 年的饥荒并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随后又以“三年自然灾害”来诠释饥荒并一直沿用至今。“三年自然灾害”的提出可作为政府对饥荒的一种解释,指出自然灾害这种不可抗因素导致粮食的大量减产,最终由于粮食供给不足导致饥荒。

很多学者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提法表示怀疑。有人对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进行分析得出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灾害(王维洛,2001),甚至有学者称这三年的天气较常年还好(金辉,1998)。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面积的持续的灾害似乎也站不住脚(林毅夫,1990),80 年代官方文献也开始承认“大跃进”和“反右倾”加上苏联的毁约也是造成三年危机的主要因素,刘少奇曾指出这次危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薄一波,1993)

2. 退社权的丧失

我国农业生产合作最早开始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和劳动力的缺乏,农民自发组成互助组,一般由 4 – 5 户组成,随后发展到初级社、高级社,这时农民还拥有退社的权力。比如,1957 年春就由于农户对合作社不满掀起的“退社风潮”。这一合作化进程在初期是成功的,以 1952 年的价格衡量1958 年的农业产出增长了 27.8%(林毅夫,1990)。基于这些成就,1958 年 7 月开始了公社化运动,要求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到 11 月初,全国共有 74 万多个农业合作社组成 26500 多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 99.1%(赵德馨,1989)。这种公社与之前的合作社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农民不再拥有退社权。

林毅夫指出,每个成员在入社时都承诺自己在合作社中会像自己单干是一样努力,农业由于本身特性导致监督成本巨大,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监督显得不可能,于是就只能以最终产出作为衡量社员努力程度的标准。那些可能违背自己承诺的社员可能会考虑偷懒,偷懒可以使他的收益增大而使其他社员分担成本。当农户拥有退社权时,由于某些社员偷懒使得努力的社员的收入减少时,那些努力的社员就会以退社相要挟,这样那些偷懒的社员就会考虑由于其他农户的退出导致他本人规模效益的丧失,于是他便不再偷懒,以此来保证其收益不减少;到了公社时期,农民的退社权被剥夺。这样,唯一可作为生产监督的替代方式也

丧失了，于是在整个公社中，社员的激励很低，以前想偷懒的社员继续偷懒，以前努力的社员也不在努力，生产率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

林毅夫在随后用唐宗明、文贯中等人计算出的生产率指数来验证他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林指出，虽然公社在1961年便解散，但农民的退社权的丧失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并以此解释我国农业生产率一直徘徊不前。

可以说，林毅夫在解释生产率问题上至今没有太大争议，生产率下降导致粮食产出下降，食物供给也随之下降，但以此来解释为何1959年会爆发大面积危机却显得不足，同样也不能解释危机为何在1962年停止。按林的理论推断的话，1959－1961年的危机与生产率的下降没有直接关系，农户退社权的丧失至多只能算着一个辅助因素。

假说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

Sen的食物获取权理论考虑一个人的禀赋向量，它可能包括土地拥有量、劳动力、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产权，他可以用其最初禀赋生产或购买食物，当这两种方式都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时，饥荒便产生了，这可能是由于禀赋向量的减少（直接食物获取权失败），也可能因为食物价格发生了不利变化（交易食物获取权失败），还应包括人为的扭曲食物供应体系。

1. 过高的粮食征购率

Bernstein于1984年指出，中国实行的重工业化战略必然导致向农民的索取来支持工业发展，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浮夸风"在加上当年的粮食大丰收使得领导人盲目乐观，粮食征购率也随虚报的产量而上升，过高的名义征购率加上实际产量的下滑导致1959及1960年的实际征购率达到39.7%和35.6%，农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粮食急剧减少，以至不能维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导致大范围的饥荒。

Berstein在这里用粮食的高征购率来解释饥荒，其本意是说这种征购率导致本该对某部分剩余粮食具有支配权的农民失去了这种食物获取权。然而大范围的饥荒在1959年秋就已经非常严重，为何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的征购率还那么高？如果中央政府不知情，地方政府在知情的情况下为何没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将1962年的人均粮食供应量与1959年的相比，两者相差仅一公斤，那么又如何解释饥荒在1962年已经停止而在1959年却最严重？

2. 城市偏向的粮食供应制度

林毅夫和杨涛2000年指出"中国有一个有效的偏向城市的食物供给体系，因此城市居民得到定量粮食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政府以城市居民生活需要来强制征收农村的粮食。这样，不管当年的产出情况如何，这样一种体系使得城市居民在食物获取权上具有优先权，而农民只对剩余粮食具有支配权，一个国民的居民身份就决定了其食物获取权。于是，城市偏向程度就成为食物获取权的代表。他们以一省粮食产出作为FAD的代表，而将一省中农村人口比重作为城市偏向即食物获取权的代表，以1954－1966年间中国28个省的数据来检验他们的理论，最终得出，各省死亡率差异中69.5%可由城市偏向解释，30.5%是由食物供应量解释。这样他们得出结论，中国饥荒更主要是由于食物获取权的丧失而不是食物供应量的下降导致的。

林和杨的观点在解释分省死亡率差异方面很有说服力，但以分省人均粮食产出作为FAD的代表显得站不住脚，而应以分省的人均粮食供给作为影响因子，因为这里面存在着一个返销粮，并且随后的学者（周飞舟，2003）的研究显示在饥荒时期各省的数额差异很大。

假说三：制度因素

考虑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有许多学者提出Sen的食物获取权丧失理论并不适合，因为其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中国市场几乎等于零，同时基于Sen的理论作出的解释也确实很难圆满地解释一些现象，比如说饥荒为何在早期就出现了；同样，FAD理论在解释饥荒时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比如说，在粮食供应并没有增加的1962年饥荒为何又能停止。于是很多人就把目光转向了当时推行的某些特殊政策和实行相关的制度。

1. 公共食堂

农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前就已产生，但只不过是合伙煮饭相对固定化，与人民公社时的公共食堂有根本区别（罗平汉，2001）。一般学者都将公共食堂作为人民公社的代表，其实在1958年

夏季大量涌现的公共食堂，固然是与当年人民公社的迅速建立联系在一起，但却要早于人民公社。到1958年年底，全国公共食堂达到345万个，在公共食堂吃饭的人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公共食堂的运作机制或许与饥荒本身有着某种联系。

杨大利在其研究大跃进的专著中，提出公共食堂中的食物同公社中的土地、农具一样被视为公有财产，由于公共食堂实行免费供给制和不设上限供给，每个农民都"放开肚皮吃饭"，多吃的食物收益归自己个人所有，而成本却由其他成员共担，这样就导致了"公地悲剧"。特别是到了1958年秋，许多公社不再将粮食分配到户，本来不满其他人的消费行为的农户可以自己回家做饭，但现在这种节约粮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于是每个农民到公共食堂都拼命吃饭，最终导致粮食耗尽，爆发饥荒。

杨以公共食堂解释饥荒，对于各省死亡率的不同，其以公共食堂作为当时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贯彻程度的代表，将党员密度(PMD)作为影响因子，用计量方法得出那些党员密度大的地区更倾向于贯彻中央政策以表示对中央的忠诚，这样，杨最后将这场饥荒归咎为政治因素。

杨虽然在前面论述公共食堂这一非理性消费机制导致饥荒，随后却指出其他因素如过量劳动、忽视医疗等同等重要，他只是将公共食堂作为饥荒成因的一个环节而已。对于他提出的由PMD引起各地死亡率的不同这一论点却有待考究，首先是已有的证据显示，各地对于政策执行情况往往是由一省的领导拍板而不是由基层的群众决定；二是林毅夫2003年用计量方法将杨的PMD与他本人提出的解放时间的早晚(Time of liberation—TOL)作为影响因子，得出后者要比前者显著。至此，杨的研究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其研究的结果却不一定成立。

文贯中和张欣1997年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是引起饥荒爆发的唯一因素，他们首先指出由现有的资料显示，饥荒最早发生于1959年春，甚至有些地方1958年冬就已经出现，并将可能引起饥荒的因素分为五类：1. 粮食减产，2. FAD，3. 食物分配不合理，4. 需求的急剧增大，5. 消费的无效率，随后逐一分析，逐一剔除，最后只剩下第五条才能解释他们的前提条件，而其他因素导致的饥荒要到1959年秋冬才可能出现。公共食堂里储存的粮食每年都要损失很多，并且公共食堂导致了浪费和过度消费。虽然1958年粮食大丰收，但由于这种毫无节制的消费机制却导致了部分地区在当年就严重缺粮并出现饥荒，他们列举了大量数据以支持他们的观点，特别是四川省的统计数据显然不能由前四种因素解释，1958年四川粮食产出增加5万吨，可当年的死亡率却由1.21%上升到2.52%。

如果文和张所提出的饥荒最早发生于1958年秋冬而不是1959年秋冬的现象属实的话，这里的解释就合情合理。林毅夫曾指出他们的这个前提不属实，但从现有的历史资料来看，饥荒确实最早在1959年春就开始了，有些地方1958年冬就出现粮食紧张(周飞舟，2003)。另外也有学者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假设没有公共食堂，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饥荒（龚启圣）。其实龚曲解了他们的意思，1962年我国农村人均粮食供给只有161公斤，而当时饥荒已结束，相比之下，饥荒最严重的1959年却有183公斤，他们也提到如果消费有效率的话（取消公共食堂）完全可以避免1959－1961年的饥荒。

2. 地方政府救荒能力差

以前的很多力量都是立足在全国范围的层面上，而实际上中国当时各省的情况差异很大。周飞舟指出，虽然在灾荒时期中央政府没有做出大的反应，但各省级政府都在积极救荒，只是缘于自身能力不足和当时的政治氛围才最终爆发大危机。周以1959－1960年各省的粮食返销率高于常年来说明省级政府知情并积极救荒。数据显示，大部分死亡率高的省份其返销粮的发放粮也在加大，同时，由于"大购大销"造成的时间差和政府库存的有限使得政府能力受限，并且当时的购销体制本身不能对粮食的供求情况做出反应，使得某些地区粮食的调入调出频繁，这样政府救济的执行成本也过高。

周的观点是从制度的角度入手，指出当时中国的粮食体制本身对饥荒的承受能力之弱，但是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的话则会发现，这种粮食购销机制只不过是重工业化战略的一个内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取消这种购销政策，重工业化

战略也难以实行。这样的话,将周的理论再延伸一点,1959－1961年的大饥荒就是重工业化战略的必然结果了,所以说将饥荒完全归咎于粮食的购销体制也不全面,并且周沿用龚启圣和林毅夫的观点:征购率过高是导致饥荒的最显著原因。而这种观点本身就不一定正确,导致饥荒最主要是人均供给量的多少,而征购率只是一个间接因素。

三、小　结

以上是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饥荒的产生、加剧等方面他们从全国和分省层面给出了解释,并且越来越趋向于用实证分析来考察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但是至今也没能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可能是缘于以下原因:首先是这次饥荒本身非常严重,其影响因素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所以才会出现以上的众说纷纭;其次是当时的数据资料由于偶然和非偶然因素导致的丢失和不正确。对这次饥荒还有很多问题没得到解决,比如:一般都认为1958年是一个丰收年,但同年也动员了许多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使得当年有很多粮食没有收上来,这个数据到底是多少;另外还有为何政府在饥荒很严重的时候还高征购和大量出口粮食,以中央政府不知情为解释有点说不过去,从现有的历史记录来看当时中央是知情的,且同时城市人口的粮食供给也在直线下降,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再有就是当年公共食堂的运作机制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搞清楚,许多学者也是从零散的资料来推测;最后,许多人都指出粮食减产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但至今没有人做过相反的研究。从历史资料来看,当年的大饥荒对生产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这里是一个恶性循环;从现存的历史文献来看,当时推行的相关政策对粮食生产具有着很大的影响,这里包括大炼钢铁、大力兴修水利、以及很多政治工程,如果将这些因素都概括为公社的话,那公社对于粮食的生产就会显著相关,如果笔者推断是正确的话,1959年饥荒的发生和1962年饥荒的结束就可以用人民公社来解释了。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2]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60)》,〔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柳随年、吴群敢:《"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1965)》,〔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肖瑞、李利明:《理性激情—国际经济学殿堂的中国建筑师》,〔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6]林毅夫:《制度、技术和中国农业发展》,〔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7]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饥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8]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北京〕《当代中国研究》2001。

[9]Ashton, B., K. Hill, A. Pizza &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Vol. 10, No. 4.

[10]Berstein, T,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Vol. 13, No. 3.

[11]Chang, G&J, Wen, "Communic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i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Vol. 46, No. 1.

[12]Kung, J&J, lin, "Of Man and Food: What Caused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2?", 2002, Forthcoming.

[13]Lin, J. Y,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1990, Vol. 98, No. 6.

[14]Lin, J. U & Denis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2000, Forthcoming.

[15]D. Gale Johnson, "Chinese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Vol. 9, No. 2.

[16]Kung, J & J. Lin, "Politics and Entilement: Cause of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2003, Forthcoming.

[17]Carl Riskin,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Vol. 9, No. 2.

[18]Xizhe Peng,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7, Vol. 13, No. 4.

〔责任编辑:天　则〕

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 *

范子英　孟令杰

内容提要:本文对阿马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与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FAD)理论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解释饥荒的发生时两者都具有解释能力,但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FAD 不具解释力度,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结论。在林毅夫和杨涛提出的城市偏向基础上,指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决定饥荒分布的真正原因,饥荒的分布是阶层性的,各自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才是遭受饥荒影响程度的直接因素。

关键词:饥荒　食物获取权　FAD　缺粮区

一、引　言

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和世界人口的增加,世界粮食产量一直在上升,即使是人均粮食产量也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饥荒本应该更容易避免发生(Martin ,1997) ,但是近代反而出现了几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比如 1943 年孟加拉大饥荒造成超过 300 万人的非正常死亡,1972 —1974 年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以及 1959 —1961 年中国饥荒[①]。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粮食产量上升的同时,粮食生产波动性却在加剧,在每一个生产周期的谷底,粮食产量较前一个周期的谷底更低,S. R. Sen 在分析印度粮食产量时发现在上个世纪的第一个 24 年中,印度的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 0. 81 %,但在每一个周期的谷底产量却平均下降 0. 14 %。

传统的饥荒理论指出粮食产量的下降是饥荒发生的主要因素,甚至是唯一因素,粮食产量的下降使得可获得的食物减少,当人均食物量低于某一个界限时饥荒便产生了。森(Sen) 在 1981 年提出解释饥荒的食物获取权(Entitlement) 理论,并用实例验证了即使在粮食产量没有出现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饥荒,并指出 FAD 理论无法解释为何饥荒发生时,遭受饥荒影响的只是一部分人,而其他人却避免了饥荒的威胁,甚至还能从饥荒中获益。

Sen 的理论自提出后有许多的学者对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位,Osmani (1985) 和林毅夫与杨涛(2000) (以下简称林文) 都提出 Sen 的理论是对 FAD 理论的补充,而 Stephen (2001) 和 Martin (1997) 等则认为前者是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包含了后者。本文将对相关的文献进行简要的回顾,

* 范子英,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邮政编码:210095;电子信箱:ivannj @sina. com. cn;孟令杰,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210095;电子信箱:menglj @njau. edu. cn。作者特别感谢北京大学 CCER 林毅夫教授、南京农业大学钟甫宁教授、复旦大学陆铭副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另外感谢南开大学黎德福博士、南京农业大学李静博士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本文部分内容曾在第二届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上报告过,感谢与会者提出的意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本项目得到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项目资助。当然文责自负。

① 中国饥荒的死亡人数估计范围为 1650 —4300 万,另外由于受饥荒影响而没有或者推迟出生的人口约为 3000 万。(Ansley 1981 ,John 1982 ,Peng 1987 ,Ashton 1984 ,Benister 1987 ,Cheng 1994 ,金辉 1993 ,曹树基 2005)

遵循的研究思路是认为Sen的理论包含了传统的FAD。这也就是说,如果FAD具有解释能力,Sen的理论肯定有,反之则不然。

本文将分两块来实证研究Sen的食物获取权理论和FAD之间的关系:饥荒的发生和饥荒的分布。我们认为对于大多数饥荒,其在特定的时间发生是粮食产出下降和相应的分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样在大多数的饥荒中,FAD是具有解释力度的,由于Sen理论还包含除FAD外的其他因素,所以Sen的理论的解释范围要大于FAD。饥荒发生时,为何只有一部分人承受了饥荒的影响,而其他人却免受饥荒的影响,这些是FAD无法解释的,因为FAD是从总量供给入手,无法具体到粮食产出减少会影响的群体,而这些恰恰是Sen理论的重点,这也就是说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只有Sen的理论才具解释力度;本文将用中国数据来检验上述两个结论。针对中国1959—1961年的饥荒,林文提出当时的粮食分配体制存在一个城市偏向系统,即城市居民享受了最优的食物获取权,这样不同省份之间死亡率的差异在控制了人均粮食产量后将由城市偏向系统来解释,即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将降低该地区的死亡率;并且他们根据对Sen的理论和FAD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得出两者在解释中国饥荒时都是有效的,只是前者比后者的解释力度更大。但林文的解释并不是完美的,在控制了城市偏向和人均粮食产出后的差异林文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人均粮食产出基本相同的陕西和福建,前者的城市人口比重为18.7%,后者为22.4%,按照林文的结论,陕西的死亡率要比福建高很多,但是实际上的死亡率前者为1.23%,后者为2.07%,这种差异正是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将从当时的政策入手,将林文的城市偏向系统进行一般化,我们认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关键因素。

本文第二部分阐述食物获取权和FAD理论的内容,并分析两种理论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回顾中国饥荒前的统购统销制度的确立,并指出这种制度对于饥荒的发生和分布有着重要影响;第四部分是模型和数据,给出了本文的样本数据和模型以及模型的扩展;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对计算的结果进行解释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二、食物获取权与FAD

本文关于饥荒的定义采用的是Johnson(1973)给出的,饥荒是指严重和持续的食物短缺造成普遍而持久的饥饿,人们的体重下降,身体憔悴,饥饿或者因身体虚弱而引发的疾病导致死亡率增加。从这个定义中可以得出本文所关注的饥荒的几个特点:一是死亡率的上升是衡量饥荒的指标,饥荒发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死亡率的急剧上升;二是饥荒是普遍的,大范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才算饥荒,小范围的局部人口死亡率的突然上升不是本文所考虑的饥荒的范畴。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指出所有饥荒的发生都是由于食物供给的突然下降,这是关于FAD的最早论述。后来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论者都认为饥荒是因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粮食的增长,人口呈指数增长,而粮食是线性增长,所以会存在一个转折点,超过该点就会发生饥荒,人口数量降到粮食产出可支撑的能力范围内,于是开始下一个循环。

在Sen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之前,FAD一直是解释饥荒的唯一理论。关于饥荒,Sen(1981a)给出了两种观点,一是简单地归于食物的不足,认为短时间内局部粮食供给的剧烈下降会导致大范围的饥饿甚至饥荒(Brown and Eckholm,1974);另外一种观点是关注食物供给之外的因素,深入研究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Sen指出,以食物供给为中心的理论很少能够解释饥荒,既不能解释为何在粮食产出没有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饥荒的发生,也无法解释在饥荒已经发生时,为何一部分人饿死,而另一部分人却几乎没受影响。在现实中发生的饥荒有的并没有粮食产出的减少,比如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有的虽然有粮食产出的减少,但其减少幅度不足以导致饥荒,比如埃塞俄比亚和1983年发生在苏丹的饥荒,其粮食产出分别仅下降了11%和13%(Drèze,1990),这样的幅度很难算着FAD

所说的"Crop Failure"。饥荒的发生是部分人没能获得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后者可能是前者的一种情况,但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所以FAD只能适用于粮食产出下降的情况,无法适用于粮食产出没有下降时发生的饥荒。Sen认为,在一个社会所有获取和控制食物的合法手段中,权利是最重要的。饥荒的发生,实际上是部分人的食物获取权的失败。一个人支配粮食,或者其他一种他想获得和拥有的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是为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特性所决定的。

Sen理论最大的贡献是将关注重点从食物供给转到特定群体对食物的获取能力(Stephen,2001),Sen并没有否认FAD作为一种理论对饥荒的解释能力,他反对的是FAD把粮食产出下降作为饥荒发生的唯一因素(Martin,1997),因为很多实证研究指出很多饥荒并没有食物供给总量的下降[①]。Sen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饥荒:直接权利失败和交换权利失败,前者是通过直接生产得到的,后者则需要通过市场交换。从生产得到的直接权利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自然环境(如是否干旱或者洪灾),交换权利则更多地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商品的价格比(Sen,1981a)。粮食产出的下降直接影响到Sen理论的第一种权利失败,可见FAD只是Sen的食物获取权的一个向量,Sen的理论是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Martin 1997,Stephen 2001)。

FAD方法在理解饥荒的分布上显得无力。FAD关注的是总供给—考察人均的食物量,而没有考虑到分配的问题(Sen,1981a),也就是说可能存在食物较多地分配给特定的群体,而某些群体则被剥夺了这种权利,而现实也恰好是这样的。所以FAD无法回答最终到底是谁会被饿死,即受饥荒影响的具体是哪些人。Sen的食物获取权关注的是个人对食物的获取能力,它能够决定某人最终可获得的食物量,所以能够解释谁被饿死,能够解释饥荒的分布。

从Sen对饥荒理论的阐述及后人的论述中看,食物获取权理论包含了传统FAD理论。个人遭受饥荒的影响是因为他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而他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的原因可能在食物总量减少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这种食物量减少使得这些原因显现出来并使之恶化。如果是在市场制度下这可能是因为其抗拒风险的能力较弱,如果在计划经济下可能就是其所分配的食物获取权是次的,但两者都是阶层性的,即某个阶层由于次食物获取权在食物总量下降时其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这样该阶层几乎承担了饥荒的全部影响。

三、中国1959—1961年饥荒

据已有的研究来看,发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饥荒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造成了近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Peng,1987; Ashton等,1984)。这次饥荒发生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农业产出的滑坡(林毅夫,1990),但这种滑坡也并非是因为自然因素,如天灾等,在这三年几乎没有出现大面积的自然灾害(金辉,1998),并且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大范围长时间的自然灾害也说不过去(范子英,孟令杰,2005)。

新中国在1949年建立之后,为了快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实行了重工业化战略,但是当时的城市经济薄弱,整个国家还处在农业社会水平,资本相对来说非常缺乏,为了快速积聚重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提高资本积累率(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这些政策对随后饥荒的发生及分布有决定性作用。为了有效地实行重工业化战略,国家从农村抽调了大量的资源(Wei Li,Dennis Tao Yang,2005)。通过价格剪刀差,压缩农产品的价格,以此来降低工业化过程中的投入成本。为了使要素流向政府所规定的领域,国家逐渐对农产品进行有计划的征收,1953年实

---

① 比如1500—1800年发生在欧洲的饥荒(Foge,1982),19世纪印度饥荒(Ajit Ghose,1982),孟加拉大饥荒(Paul Greenough,1992),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苏丹饥荒(Christopher Locke and Fredoun Ahmadi-Esfahsni,1993)。

行了对粮、油、棉的计划收购和征购,即农户在完成国家派购的任务后才可以进行农产品的自由交易(赵德馨,1988),然而实际上政府已经最大限度地征购了农产品,农民基本上没有剩余产品可以拿来交换了,农产品自由市场基本上不存在(Walker,1984)。统购政策的最终确立是1955年3月制定的对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该政策相对于之前的政策更加严格,规定凡完成派购任务的农户还有余粮的为余粮户,国家对该余粮户的余粮进行统购(焦贵玺,1991),这样就完全取消了农产品自由市场。

在确立了统购政策对农产品的征收之后,便是如何分配的问题。为了简化分析,我们下面仅以粮食为例。经过早期的农业生产恢复和比较成功的合作化制度,粮食生产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人均粮食产出从1954年的278.5公斤上升到1958年的299公斤,但是增幅却随着统购制度的逐渐建立而下降,1955年相当于前一年的增幅为6%,但是1958年该数字只有0.1%,1957年人均粮食产出的增加甚至是负的。在粮食产量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是不是每一个阶层都分享了这种粮食产量增加的好处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在随后粮食产出下降的情况下(不管这种下降是自然因素还是人为因素),饥荒也不会发生,因为在正常年份的1962年,人均粮食产出比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还要低;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没能享受好处的阶层其对粮食的获取权较其他阶层要弱,该阶层将要承担粮食生产的大部分风险,其遭受饥荒的威胁也最大。政府对粮食统购的初衷是为了压缩城市居民的工资,所以城市居民成了粮食分配的最先考虑对象,获得了最优的食物获取权,这部分林文做过详细的论述。1955年实行的"三定"政策中规定对农村中的缺粮户进行统销,而这些缺粮户包括不从事粮食生产和粮食产量不能自给的农户,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这里的缺粮户一般化,将缺粮户较多的地区划为缺粮区[①]。

在粮食生产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对经济作物需求的增大,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从1952年到1960年逐年上升,即使是播种面积比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总播种面积)也从1952年的12.2%逐年上升到1960年的18.7%。这样很多地区就得依靠国家返销的粮食作为主要的食物供给,比如1953年要国家供应粮食的种植经济作物和其他缺粮的农民就将近1亿[②]。因为这里的缺粮区是伴随着重工业化进程产生的,我们称之为新缺粮区。与此对照的是传统缺粮区,因为部分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差,或者人口众多,这些地区的粮食产出基本不能自给,不管是否存在重工业化战略,都要国家划拨粮食来维持该地区的食物供给。缺粮区的划分至关重要,在正常年份,国家对缺粮区的返销粮会按照以往衡定的标准返销,这样不管是缺粮区还是非缺粮区,在正常年份都拥有足够的食物供给,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至少能维持生存的食物,所以缺粮区和非缺粮区的死亡率不会有较大的差异。但是在饥荒年份,在粮食产出下降的前提下,缺粮区仍将获得同正常年份相同的返销粮,所以他们的食物供给有制度保障,相对城市居民获得次等的食物获取权;非缺粮区则不同,由于信息不畅通,国家仍按照以前年度制定的计划进行统购,留在农户手头的余粮较正常年份就减少了,当余粮减少到无法维持生存时,该地区的农民就会面临饥荒的威胁,其死亡率较其他地方都要高,非缺粮区的农民获得的是最底层的食物获取权。缺粮区和非缺粮区的人口死亡率在正常年份没有差异,在饥荒年份其食物获取权的差异会表现出来,两者之间的死亡率差异较大,比如在正常年份的1957年,全国省级水平死亡率的方差为3.94,而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为223.94。

① 当然这里的缺粮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本文并没有明确指出缺粮区和非缺粮区划分的数量标准,只是从资源禀赋和种植结构分析,如果一个地区其缺粮户的比例越多,我们认为接近缺粮区的程度越高。同时因为缺粮区内部存在差异,用返销粮的数量更能反映问题,而返销粮数量和我们定义的缺粮区的程度是一个意思,所以在下文我们是用部分变量来代理返销粮的数量或者说缺粮区的程度,而不仅仅是缺粮区。

② 戴谟安,1985,《粮食生产经济》,p65,农民出版社。

四、模型及数据

在进行实证分析前,饥荒、死亡率和饥荒导致的死亡率[①]之间关系需要明晰。一、饥荒和死亡率,饥荒会导致死亡率的上升(Sen,1981a),但死亡率不是饥荒的发生条件而只是一个生物结果(Rangasami,1985),导致死亡率突然上升的因素一般有:战争、大规模流行病和饥荒,首先可以排除的是那几年国内没有战乱,其次大规模的流行病没有历史记录,这主要是因为即使有流行病,但由于严格的户籍制度,人口的迁移受到限制使得疾病无法很快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导致1959—1961年死亡率上升的就只有饥荒可以解释了。二、死亡率与饥荒导致的死亡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死亡率会逐渐下降,饥荒导致的死亡率应该是剔除正常死亡率之后的部分,所以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需要控制影响正常年份死亡率变化的因素。

为了与林文对比,我们选取相同的数据。选取1954年到196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Panel data),到1966年截止是因为1966年是另一个混乱年代的开始,以1954年开始是因为早期的死亡率由于战争的原因并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建立如下的初始模型:

$$\mathrm{Prob}(F_{it}=1\mid X)=\Phi(\alpha_0+\alpha_1 C_i+\alpha_2 Y_t+\alpha_3 \mathrm{IP}_{it}+\alpha_4 \ln\mathrm{POP}_{it}+\alpha_5 \ln\mathrm{CPP}_{it}+\alpha_6 \mathrm{UP}_{it}) \tag{1}$$

$$\ln\mathrm{DR}_{it}=\beta_0+\beta_1 C_i+\beta_2 Y_t+\beta_3 \mathrm{IP}_{it}+\beta_4 \ln\mathrm{POP}_{it}+\beta_5 \ln\mathrm{CPP}_{it}+\beta_6 \mathrm{UP}_{it}+\beta_7 \mathrm{HEA}_{it}+\varepsilon_{it} \tag{2}$$

模型(1)是用来检验Sen理论和FAD理论对饥荒发生的解释能力,当年份为1959—1961时,F取1,其他年份取0,这样构造的二元Probit模型就可以检验影响饥荒发生的各种因素。模型(2)中的DR表示死亡率,该模型用来解释影响死亡率差异的各种因素,其中我们控制了影响正常年份死亡率的卫生条件HEA(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剩下的因素就是解释饥荒导致的死亡率,也就是饥荒的分布,由于我们用相应的变量来衡量Sen理论和FAD,所以该模型可以用来检验两种理论对饥荒分布的解释力度。

IP是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总播种面积),用来衡量新缺粮区对因变量死亡率的影响;POP是人均播种面积(考虑到复种情况),是一个地区的人均自然禀赋条件,衡量传统缺粮区的影响;CPP是人均粮食产量,衡量FAD的解释力度,但是考虑到结转库存我们这里取人均粮食产出的两年移动平均值;UP是城市偏向(农业人口/总人口)。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这里UP的定义与林文的差异是我们采取的是农业人口,而非农村人口,因为这里度量的是享受城市粮食供给保障的人口,用农业人口比农村人口更准确,比如农村中的教师虽然是农村人口却在城市偏向范围之内,所以用农业人口更符合林和杨定义的城市偏向;二是这里的因变量和部分自变量取了对数,β_4和β_5度量的是各自的弹性,β_3和β_6是各自的半弹性,后面两个变量与林文有区别,林文同样取了对数,本文之所以没有取对数是因为IP和UP是一个比率,其估计值相当于惯常的弹性;三是IP和POP是我们作为衡量缺粮区和非缺粮区在林文的基础之上加入的;四是IP、POP和UP是衡量政府对征购粮食的分配,因为缺乏这方面的准确数据,所以用这些变量来代理,这里要求政府对各省粮食的分配与这些代理变量高度相关;五是IP、POP和UP是衡量Sen理论中的交换权利,而CPP是衡量FAD(林毅夫和杨涛,2000),也就是Sen理论中的直接权利。C_i是截面固定效应,度量该模型没包括在内不随时间变化但有跨省差异的因素;Y_t是时间固定效应,度量的是总体的时间趋势。由于这里采用的是双向固定效应,所以要求后面的四个变量同时具有跨省跨年度的变化,如

① 这一点是一位评审人提出来的,我们感谢评审人的意见。

果不具备的话其系数将不显著。

模型(2)的 IP、POP、UP 度量的是食物获取权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正常年份已经存在,但却不会显现出来,其对死亡率没有影响。为了度量各变量在饥荒发生时对死亡率的影响,本文引入饥荒年份的虚拟变量 D,当年份为 1959、1960、1961 年时该变量取 1,其他正常年份为基准年份,该变量取 0,将该虚拟变量与各变量交叉相乘,重新估计的 OLS 系数就是各自相对于正常年份对死亡率影响的差异。为了更加准确估计,我们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没有考虑到的变量的代理变量。

$$\begin{aligned}\ln DR_{it} = {} & \beta_0 + \beta_1 C_i + \beta_2 Y_t + \beta_3 IP_{it} + \beta_4 \ln POP_{it} + \beta_5 \ln CPP_{it} + \beta_6 UP_{it} \\ & + \beta_7 HEA + \beta_8 \ln DR_{it-1} + \beta_9 D * IP_{it} + \beta_{10} D * \ln POP_{it} + \beta_{11} D * \ln CPP_{it} \\ & + \beta_{12} D * UP_{it} + \beta_{13} D * \ln DR_{it-1} + \varepsilon_{it} \qquad (3)\end{aligned}$$

β_3、β_4、β_5、β_6 度量的是各变量在正常年份对死亡率的影响,我们估计这四个系数都不显著。食物获取权的差异决定各自抵抗饥荒威胁的能力,直接决定个人是否会因食物短缺而死亡,因为食物获取权是阶层性的,所以一个地区底层食物获取权的阶层人数越多,其饥荒年份相应的死亡率也越高,我们预期 $\beta_9 < 0$、$\beta_{10} > 0$、$\beta_{12} > 0$,即如果一个地区其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越大并且人均耕地面积越少的话,作为缺粮区的可能性越大,获得次等食物获取权的人数比重越多,获得国家返销的粮食会越多,在饥荒年份死亡率也就越低;如果农业人口比重越小的话,获得最优食物获取权的人数比重越大,死亡率也越低。从前文对 Sen 理论和 FAD 理论的关系的阐述中,我们得出后者无法解释饥荒的分布,所以我们预期 β_{11} 不显著。死亡率的滞后项是无法观测到的变量的代理,这些无法观测到的变量一般会对死亡率有正的影响,所以 $\beta_8 > 0$;考虑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假说,在饥荒高峰过后,死亡率较正常年份要低,这样 $\beta_{13} < 0$。卫生条件 HEA 只是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加入模型,所以其是否显著都无关紧要。

在利用数据检验上述预期前需要对模型进行一些扩展:1)按照林文的做法,引入死亡率的滞后项会缓和自相关,所以第一种扩展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剔除该滞后项,我们预期剔除后自相关系数较未剔除前要大。2)虽然在模型(3)中引入了饥荒年份的虚拟变量可以考虑各变量在饥荒年份的影响较正常年份的差异,但是无法度量各自在饥荒年份影响程度的变化,我们可以剔除虚拟变量 D,而另外设置三个虚拟变量 r_1、r_2 和 r_3,当年份为 1959 年时 r_1 取 1,其他年份取 0,其他两个对应 1960 年和 1961 年,再将这三个虚拟变量与各变量交叉相乘,得到新变量的估计系数即可以度量各自的影响在饥荒年份时间趋势。

五、检验及解释

我们运用 Panel data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上文的假设进行验证,结果在表 1 中,其中第一列是模型(1)的计算结果,第二列是模型(3)的结果,第三列是模型(3)的第一种扩展的结果,第四列是模型(3)的第二种扩展的结果。

第一列的结果中,由于这里是 Probit 模型,其处理过程采用极大似然法,所以报告中对数似然值替代了通常的拟合优度。LnCPP 的系数显著,说明粮食减产对 1959—1961 年的饥荒有显著的影响,人均粮食的对数每增加 1,即增加 2.72 斤,饥荒发生的可能性将降低 56 %[①],如果以正常年份的 1957 年全国人均产量与饥荒开始年份 1959 年的该值之差来看,假如没有粮食产出减少,饥荒将不可能发生(48.7 *0.56/2.72) 。UP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城市人口比重并不是饥荒发生的原因,这可

① 由于二值模型的系数不能直接解释,将其除以 2.5 就相当于 LPM(线性概率模型) 的系数,计算后的值可以直接作为影响权重,这里的 0.56 = 1.403/2.5。见 J.M. 伍德里奇,2003,《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中译本,p51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表 1

变量	(1)	(2)	(3)	(4)
UP(城市偏向)	0.297(0.744)	0.204(0.501)	0.328(0.809)	0.317(0.858)
IP(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率)	3.528 * (3.317)	0.551(0.719)	0.838(1.106)	0.763(1.100)
LnCPP(人均粮食产量)	- 1.403 * (- 4.177)	- 0.157(- 0.885)	- 0.063(- 0.353)	- 0.096(- 0.594)
LnPOP(人均播种面积)	0.922 * (3.351)	0.163(0.953)	0.213(1.245)	0.195(1.246)
HEA(每万人医生数)	—	- 0.003(- 0.395)	- 0.003(- 0.349)	0.001(0.118)
$LnDR_{t-1}$(滞后一期死亡率)	—	—	0.350 * (3.736)	0.379 * (4.605)
UP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	0.536 * (3.309)	0.554 * (3.316)	—
IP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	- 0.616(- 1.590)	- 0.791 ** (- 1.986)	—
LnCPP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	- 0.025(- 0.179)	- 0.002(- 0.018)	—
LnPOP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	- 0.072(- 0.692)	- 0.028(- 0.268)	—
$LnDR_{t-1}$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	—	- 0.350 * (- 2.944)	—
UP ×r_1(1959 年虚拟变量)	—	—	—	0.255(1.278)
UP ×r_2(1960 年虚拟变量)	—	—	—	1.229 * (4.347)
UP ×r_3(1961 年虚拟变量)	—	—	—	0.200(0.697)
IP ×r_1(1959 年虚拟变量)	—	—	—	- 0.352(- 0.648)
IP ×r_2(1960 年虚拟变量)	—	—	—	- 0.477(- 0.819)
IP ×r_3(1961 年虚拟变量)	—	—	—	- 0.744(- 1.291)
LnCPP ×r_1(1959 年虚拟变量)	—	—	—	- 0.083(- 0.446)
LnCPP ×r_2(1960 年虚拟变量)	—	—	—	- 0.236(- 1.177)
LnCPP ×r_3(1961 年虚拟变量)	—	—	—	0.279(1.444)
LnPOP ×r_1(1959 年虚拟变量)	—	—	—	0.126(0.721)
LnPOP ×r_2(1960 年虚拟变量)	—	—	—	- 0.205(- 1.166)
LnPOP ×r_3(1961 年虚拟变量)	—	—	—	- 0.351 ** (- 2.534)
$LnDR_{t-1}$ ×r_1(1959 年虚拟变量)	—	—	—	- 0.150(- 0.766)
$LnDR_{t-1}$ ×r_2(1960 年虚拟变量)	—	—	—	0.584 ** (2.174)
$LnDR_{t-1}$ ×r_3(1961 年虚拟变量)	—	—	—	- 0.442 * (- 3.509)
调整 R^2	—	0.639	0.655	0.719
对数似然值	- 159.045	72.178	78.499	112.656
扰动自相关系数 ρ	—	0.088	- 0.041	- 0.052

注:括号中为 t 值,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 %, ** 表示 5 %, *** 表示 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 —1989)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能是当时虽然国家从农场吸收了很多劳动力,但还不至于破坏当地的农业,另外,这部分的人口变动相对于全国总人口而言是非常小的,平均下来对其他人没有大的影响。LnPOP 和 IP 都是显著的,说明缺粮区的划分对于饥荒发生有重要影响,IP 的增加说明国家对经济作物区的返销粮需要增加,这样其他地区的粮食就减少了,在饥荒年份粮食减产的情况下,粮食的分配随着 IP 的增加而更加不公,食物获取权会更加不平等,所以 IP 的系数应该是正的;LnPOP 的系数与我们的预期有出入,人均播种面积越低,说明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差,需要国家返销的粮食会增多,同样应会导致饥荒发生可能性的增加,所以该系数应该是负的,对于计算结果与我们预期的差异,可能的解释是,本文考虑的时间跨度比饥荒年份要长,虽然该指标在饥荒年份有下降,但在饥荒年份前后由于人口的增加也是下降的,所以会导致系数估计值为负。UP 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城市化率本身并不是饥荒发生的因素,虽然在饥荒前国家动员了很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但是在饥荒开始年份就对这部分人口进行遣返,所以在饥荒年份和饥荒之后的年份间并不存在差异。由于我们事先分析 CPP 代表了 FAD 的解释力度,而加上剩下的其他指标代表 Sen 理论的解释能力,CPP 系数的显著性说明 FAD 在解释中国饥荒的发生时是适用的,Sen 理论同样适用。

将第二列与第三列对比来看,自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后者比前者要小的多,说明在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之后自相关得到很大的改善,该滞后项的引入是必要的,并且引入后调整的 R^2 较引入前更大,说明该滞后项是模型没有考虑到的变量的一个较好的代理变量。因为第二列估计的是本文的标准模型(3),为了避免重复,对模型估计系数的解释以第三列为准。

β_3、β_4、β_5、β_6 度量的是各自对正常年份死亡率的影响,这几个变量都不显著,与我们的预期相符。虽然当时的经济水平还很落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正常年份绝大部分人都达到了温饱水平,这样食物不存在大范围的短缺,也就是说不存在部分人会被饿死,所以正常年份死亡率的变动与这些影响食物摄入的因素无关。特别是我们控制了影响正常年份死亡率变化的卫生条件(HEA),所以剩下的这些变量不会有解释力度。β_7 不显著无关紧要,因为 HEA 只是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β_9、β_{12}的估计与我们的预期基本一致,两者都能在 5 %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对因变量的影响,两者相对正常年份都有较大的变化;DIP 的系数表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会使得死亡率相对于正常年份下降 8 ‰[①];β_{12}意味着如果一个地区农业人口比率增加 1 %,则会导致相应的死亡率较正常年份上升 6 ‰。β_{10}的估计与预期有出入,这主要是因为人均播种面积相对比较固定,特别是饥荒年份与正常年份相比没有大的变化,这样在估计时由于变异太小所以不显著。β_{11}估计的是人均粮食产出(CPP)对饥荒年份死亡率的影响,作为对 FAD 理论的衡量尺度,我们曾预期如果考虑到 FAD 对死亡率的差异即饥荒的分布不具解释力,这里 β_{11} 的不显著与我们预期一致。β_8 非常显著,上一期死亡率每提高 1 %将导致当期死亡率同比上升 0.35 %,说明模型中没能观测到的因素确实对死亡率有很大的影响;β_{12} 的估计系数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其符号是负,证明了达尔文现象的存在。

从表 1 的第四列可以看出各变量在饥荒年份对死亡率影响的变动趋势。城市偏向只在第二年才显现出来,但系数很大,农业人口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会使得死亡率增加一倍。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只是在第三年才在接近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并且在这三年其影响程度是递增的,这说明当时政府对饥荒并没有采取较大的挽救措施,随着粮食越来越短缺,新缺粮区的划分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人均粮食产出也只是在第三年才接近10 %的水平显著,前两年符号为负,到第

① 由于这里的 DIP 没取对数而因变量是对数形式,所以这里的 β_9 是半弹性,所以这里 DIP 每增加 1,使得死亡率下降 0.791 *100 %,另外这里的 DIP 是小数形式,所以最终结果是 DIP 每增加 1 %,会使得死亡率下降 0.791 *100/100 %。

三年变为正,说明随着饥荒的发生产粮区遭受越来越严重的影响。人均播种面积在第三年显示了影响,并且符号符合本文的预期。死亡率的滞后期在后两年非常显著,对 1960 年的影响为正,说明在饥荒最严重的年份有许多我们没能观测到的因素影响死亡率,1961 年为负,证实了在严重饥荒过后,死亡率较正常年份要低,可能是体制较弱的群体在灾难中消亡了,剩下的都是体质较好的,所以死亡率会比较低。

我们现在仍然无法比较各个变量的重要性,虽然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和城市偏向的系数同时显著并且前者大于后者,但我们无法以此得出前者就比后者重要,因为各自的可变化范围不同。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后的变量就变成了一个无量纲了,这时再对标准化后的变量进行计算得到标准化系数,为 $b_j = (\sigma_{x_j}/\sigma_y)\beta_j$,该数字是一个无量纲,并且可以直接进行对比。其结果见表 2 第二列,城市偏向的标准化系数是 0.523,其绝对值要大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的作用。这也正说明粮食获取权的优先次序首先是城市居民获得最优食物获取权,其次是缺粮区的居民,最后才是非缺粮区,并且城市居民本质上是属于缺粮区,这样缺粮区的划分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表 2　　变量的重要性

变量	原系数	标准化系数
UP(城市偏向)	0.328(0.809)	0.216
IP(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率)	0.838(1.106)	0.204
LnCPP(人均粮食产量)	- 0.063(- 0.353)	- 0.064
LnPOP(人均播种面积)	0.213(1.245)	0.269
HEA(每万人医生数)	- 0.003(- 0.349)	- 0.046
$LnDR_{t-1}$(滞后一期死亡率)	0.350* (3.736)	0.344*
UP ×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0.554* (3.316)	0.523*
IP ×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 0.791** (- 1.986)	- 0.205**
LnCPP ×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 0.002(- 0.018)	- 0.004
LnPOP ×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 0.028(- 0.268)	- 0.031
$LnDR_{t-1}$ × D(饥荒年份虚拟变量)	- 0.350* (- 2.944)	- 1.183*
调整 R^2	0.655	
对数似然值	78.499	
扰动自相关系数 ρ	- 0.041	

注:括号中为 t 值,*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 %,** 表示 5 %,*** 表示 10 %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 —1989)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0;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参考文献

曹树基,2005:《1959 —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第 1 期。

戴谟安,1985:《粮食生产经济》,农民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1999:《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1990:《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 —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

范子英、孟令杰,2005:《有关中国 1959 —1961 年饥荒的研究综述》,《中国农村观察》第 1 期。

J. M. 伍德里奇,2003:《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焦贵玺等,1991:《粮食流通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

柳随年、吴群,1984:《“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 —196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赵德馨,1988:《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 —1966)》,河南人民出版社。

周飞舟,200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饥荒的反应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2 期。

Ashton, B., K. Hill, A. Piazza & R. Zeitz, 1984, "Famine in China, 1958 —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0, No. 4

Berstein, T, 1984,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3,

No. 3

Brown, J. L. R. and Eckholm, E. P, 1974, By Bread Alone, Oxford: Pergamon Press

Chang, G&J, Wen, 1997, "Communic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6, No. 1

Chen, Chu-yuan., 1982,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Drèze, Jean, 1990, "Famine Prevention in India", in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 eds. Vol. 2, pp: 13—122.

Johnson, D. Gale, 1998, "China's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Feb, pp: 103—109.

Kung, James, and Lin, Justin Yifu., 2003,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October, pp: 51—73.

Kung, James, and Putterman, Louis, 1997, "China's Collectivization Puzzle: A New Resolu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3, pp: 741—763.

Yang, Dali L. 1996,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i Li, Dennis Tao Yang, 2005,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Vol. 113, No. 4

Lin, Justin Yifu. 1990, "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Lin, Justin Yifu and Yang, Dennis Tao. 2000,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Economic Journal*, Vol. 110, January, pp: 136—158.

Lin, Justin Yifu, and Yang, Dennis Tao. 1998, "On the Caus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the Great Leap Famine."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pp: 125—40.

Martin Ravallion, 1997, "Famine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V, September, pp: 1205—1242.

Osmani, Siddig. 1995,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to Famine: An Assessment," in K. Basu et al, eds., Choice, Welfare, and Development: Essays in Honour of Amartya S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eng, X. Z, 1987,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 Provin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3, pp: 639—670.

Rangasami, Amarita, 1985, "'Failure of Exchange Entitlements' Theory of Famine: a Respon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12, October, pp: 1947—1952.

S. R, Sen, 1971, Growth and Instability in India Agriculture, Calcutta: Firma K. L. Mukhopadhyay.

Sen, Amartya K. 1981a, Poverty and Famine. Oxford, U. K.: Clarendon Press.

Sen, Amartya K. 1981b, "Ingredients of Famine Analysis: Availability and Entitle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95.

Stephen Devereux, 2001, "Sen's Entitlement Approach: Critiques and Counter-critiques",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9, No. 3.

Walker, Kenneth R. 1984,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Explanations and Test to Sen's Entitlements: Evidence from China

Fan Ziying　Meng Lingjie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on Sen's food entitlement theory and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o explain famine with food supply declined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FAD) positioning that both are the real cause of famine, but FAD could not explain the distribution of famine. On the base of urban bias by Lin Yifu and Yangtao(2000),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real causes of famine distribution are the food deficit areas, and the distribution has class nature. The priorities of their entitlements to food is subjected to the direct impact of famine.

Key Words: Famine; Food Entitlement; FAD; Food-deficit Areas

JEL Classification: I300, I320, I390,

(责任编辑:唐寿宁) (校对:晓　鸥)

第 9 卷第 3 期　　经 济 学 (季 刊)　　Vol. 9 , No. 3
2010 年 4 月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April , 2010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 —1961 年饥荒
——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刘　愿 *

摘　要　1958 —1961 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 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 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 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 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 1953 —1966 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 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赶超战略, “大跃进”饥荒, 集体偏向, 政治权利

一、前　　言

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及与之伴随的饥荒频发, 以致有西方观察家将中国称为“饥荒的国度”(Walter , 1926) 。新中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与和平背景下,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 造成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1] 令人疑惑的是, 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 人们在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更容易遭受饥荒的威胁。在农业集体化背景下, 苏联 1931 —

*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通信地址: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510006 ;电话:(020) 39310072 ; E-mail :hope428 @163. com。本文是作者在 2009 年 3 月至 6 月访问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期间完成的,感谢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提供的良好研究条件。本文在内蒙古大学“2009 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专题会议”、法国奥弗涅大学“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Economy: Thirty years of reforms: What about Capitalism in China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第 54 期双周论坛上都做了报告,作者感谢参会人员的有益评论。作者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罗长远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杨永华教授、李继东教授、胡靖教授、吴忠培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胡永泰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Naughton Barry 教授及澳大利亚 James Cook 大学的 Zhangyue Zhou 教授对本文写作和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作者自负。

[1] 关于中国“大跃进”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学术界存在分歧,根据 1953 年、1964 年、1982 年三次人口普查和 1982 年 1 ‰生育率调查数据所作的估计较为科学可信。其中,蒋正华、李南(1986 ,1987 ,1989) 的计算结果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 1 700 万人”。Coale (1984) 估计 1958 —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 2 700 万人。Ashton *et al.* (1984) 估计 1958 年年中至 1962 年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 000 万人。李成瑞(1997) 修正了 Coale 的计算,结果为 2 200 万人。概言之,中国“大跃进”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规模在 1 700 万 —3 000 万之间,因此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1933 年发生严重饥荒, 导致 450 万—800 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Davies and Wheatcroft, 2004); 1947 年苏联再次爆发饥荒, 导致 100 万—150 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Ellman, 2000)。朝鲜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始于 1995 年, 1997 年达到高峰, 导致全国 2 300 万人口 3%—5%的死亡率; 2008 年朝鲜又面临严重食物短缺, 在十年内再次遭遇严重饥荒 (Stephan, 2008; Stephan, Marcus, 2008)。为何传统社会主义集权国家如此频繁地遭遇饥荒,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Sen (1981) 基于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等国饥荒的研究提出权利失败理论, 将饥荒成因的解释从传统的 FAD 理论扩展至权利领域。周飞舟 (2003) 认为大部分学者沿用 Sen 的"粮食获得权利"的概念只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 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食物分配尤其是食物分配制度的分析甚少涉足。Ravallion (1997)、O'Grada (2007) 提出, 虽然研究饥荒的新文献已经发展了丰富的概念框架和完善了有关实证研究, 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饥荒的理解仍然是相当初步的。Yang (2008) 认为原因在于, 社会主义制度安排有别于标准市场经济的权利方法: 在市场经济中私人财富和相对价格能够解释大部分的饥馑, 而中央计划下的政府确定价格和控制粮食生产和分配。Lin and Yang (2000)、Kung and Lin (2003)、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 2007) 则主张 Sen 的食物获取权理论在解释中国大饥荒时是有效的。

本文认为, Sen 主要关注资源禀赋缺失或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饥荒的影响, 属于经济权利范畴, 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产品分配则取决于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因此, 理解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 必须将 Sen 的权利理论从经济范畴扩展至政治权利领域。[2] 本文将以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粮食分配制度为例, 尝试从政治权利角度解释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现象, 全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节回顾中国大饥荒成因的相关研究, 总结若干理论假说及经验检验, 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 第三节分析"大跃进"运动时期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 第四节利用 28 个省市区相关数据对公社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做实证分析; 第五节总结全文, 指出社会主义集权体制饥荒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二、文献述评

对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大饥荒的成因, 学界至今依然存在很多分歧, 除了传统的食物供应下降解释外, 还包括公共食堂理论、城市偏向说、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灾能力说和饥荒"历史记忆"说等,

[2] Sen 1981 年在 *Poverty and famine* 中发展的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因素, 中国"大跃进"饥荒促使 Sen 重新考虑政治制度在饥荒中的作用。Sen (1983) 比较了民族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 认为缺乏自由新闻媒体和政治压力集团是中国"大跃进"饥荒的成因, 并指出权利研究必须超越纯粹的经济因素, 同时考虑政治制度安排。但 Sen 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

各种假说分述如下。

（一）公共食堂制度

Chang and Wen（1997，1998）根据人口统计资料判断中国“大跃进”饥荒实际上在 1958 年年末已经发生，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 1959 年。他们认为，粮食生产、粮食可获得性、粮食分配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需求冲击等因素均不能解释饥荒始于 1958 年年末，大饥荒真正的原因是公共食堂制度：公共食堂制度取消家庭厨房及将农民存粮集体化，搭便车行为导致粮食过度消费，从而引发了 1958 年开始的饥荒。其后，公共食堂破坏了农民生产激励、滋生了村干部的腐败和权力滥用行为，使饥荒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城市偏向说

Bernstein（1984）、Walker（1984）最早指出粮食高征购引起的城乡粮食消费差异是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Lin and Yang（1998，2000）提出粮食生产下降只是饥荒产生的原因之一，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政策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并以农村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偏向的指标，运用 28 个省 1954—1966 年的数据检验了其理论。Kung and Lin（2003）以粮食征购率指标更为直接地衡量了城市偏向政策，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城市人口跳跃式地快速增长，为维持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大从农村征购粮食。新逸和葛玲（2008）将中国“大跃进”饥荒视为“制度性”的农村饥荒。

（三）缺粮区偏向说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认为城市偏向说可以用来解释饥荒时期城乡死亡率的差异，但却无法解释同一个省内农村地区死亡率之间的差别。他们认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农村地区死亡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统购统销制度下，我国城市居民首先得到体制上的食物供给保障，其次是对农村中缺粮区群体，最后是粮食主产区的居民。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最容易遭受饥荒威胁。他们分别利用 1954—1966 年 28 个省级数据和 1954—1966 年江苏省县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四）政治激进主义

Yang（1996）、Yang and Su（1998）分析了“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即中央集权体制下，下级以服从和执行上级下达的指示来显示对中央权威的忠诚，以换取政治仕途上的升迁。人民公社和公共饭堂制度已经被中央权威确定为一项“好制度”，那么贯彻执行这些制度便成为从省到村庄各层级干部表示忠诚的方式。Kung and Lin（2003）研究了政治激进主义在

饥荒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相对于新解放区，老解放区政府受地方人民更多的支持，为了使中央政策在新解放区得到贯彻执行，中央向新解放区派遣了大量的南下干部。为了显示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南方地区的领导人比北方地区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执行激进政策，并以各地区解放时间作为衡量地区政治激进程度的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3]

(五) 政府救济能力

周飞舟 (2003) 从省级政府救荒努力角度考察了“大跃进”饥荒地区死亡率差异，并解释为何饥荒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他利用 11 个死亡率最高的省份的粮食分配数据，发现大部分省份都对灾荒做出了实际的反应：一方面，各省在省内加大返销粮的发放数量，但由于浮夸风、反“右倾”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反应和救助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高峰死亡率超过 20 ‰的 11 个省份，有 6 个省份[4] 在其灾荒的最高峰期还在大量调出粮食，表明虽然大部分省都知道灾荒实情并发放返销粮救荒，但却没有向中央或其他省份要求调入粮食，延误了及时救荒。

(六) 饥荒“历史记忆”说

曹树基 (2005) 对比了 1959—1961 年与 1851—1875 年的分地区死亡人口，发现两个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率呈强负相关。曹树基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其论证的逻辑是：在经历大饥荒的地区，从民间百姓到地方基层干部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大饥荒的地区，因此这些地区在“大跃进”中较少地浮夸其粮食产量，从而较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粮食征购的高压，减轻了这些地区在饥荒时期的粮食短缺。

现有研究关注以粮食为主的资源从农村到城市、从粮食主产区到缺粮区的转移，或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分配导致的粮食消费效率下降，或能源高消耗工程对劳动力营养健康状况的负面作用。如图 1 所示，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数量，除了受高征购等因素影响外，还取决于集体在扣除费用及提留之后分给社员的数量。一个尚未得到研究的问题是，在粮食高征购及公共食堂消费低效率之外，农民的粮食获取权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集体高积累而缺乏保障，这可能是大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在中国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重点考察人民公社集体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对大饥荒的影响，并利用 1953—1966 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新的检验。

---

[3] 这些政治激进主义包括多个维度，如粮食过量征购、动员过多的劳动力从事各种高消耗的项目工程。Kung 和 Lin 主要关注后者。

[4] 这六个省份分别是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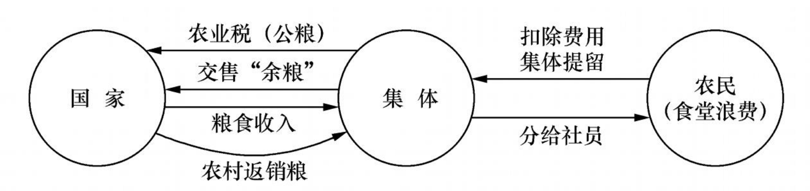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三、集体积累与大饥荒

（一）成立人民公社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5] 1953 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一五”计划即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56 年我国宣布提前完成“一五”计划。在顺利完成“一五”计划的背景下，毛泽东在 1957 年年底访问莫斯科时提出 15 年赶超英国的目标，1958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我国赶超发展战略正式形成，全国各领域开展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

在资本稀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我国主要通过从农业部门抽取剩余支持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发展。为此，农村生产组织方式发生相应变化：1953 年全面完成“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就进入各种形式的合作化运动，从农民自发成立互助组到政府推动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 年强制性成立人民公社，农民退社自由权被取消了。

人民公社生产组织形式的确立，改变了农民个体的独立地位，农民的生产和消费高度依赖集体：在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被强制集体化，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被取缔，统一由公社集体经营。因此，农民个体必须从集体获取所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二）人民公社高积累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基本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总收入按照以下项目进行分配：扣除当年度消耗的生产费用和公共财产折旧、向国家纳税、集体提留、支付社员口粮、支付社员的基本工资和奖励工资。其中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部分，公积金用于储备和扩大再生产，公益金用于人民公社教育、卫生、文化及其他福利事业。[6] 因此，农民个体的消

---

[5] 农业总产值比重为 70 %，工业总产值比重为 30 %，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 7.9 %(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1982，第 Ⅵ-4 页)。

[6] 见《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黄道霞等，1992，第 485—493 页)。

费与其他各项支出存在替代关系。

1958 年 8 月 22 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积累和消费问题的指示》, 提出在增产增收情况下, 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原则应该是:“在苦战 3 年期间, 尽多地积累一些, 以利于迅速发展生产; 同时, 在生产发展的急促上, 使社员的生活有适当的改善。改善社员生活, 主要靠扩大集体福利事业, 而不是单纯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黄道霞等, 1992, 第 507 页。) 农业合作社很快并转为人民公社, 上述指示也就成为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遵循的准则 (杜润生, 2002, 第 535—536 页)。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 是否赞成建立人民公社成为“两条道路的斗争”, 表现在分配上, 是“多积累、少消费”与“多消费、少积累”的斗争; 表现在集体生活上, 是“多集中、少自由”与“多自由、少集中”的斗争。[7] 在粮食产量高估和政治挂帅工作作风的作用下, 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了第一条道路, 执行提高集体积累减少农民消费的分配政策。

如表 1 所示, 在“大跃进”运动时期, 人民公社收益分配一个显著变化是重集体积累轻农民消费。1956 年集体提留绝对额和比重分别为 12.4 亿元、4.68 %, 以 1956 年为基期, 1958—1960 年集体提留分别增加 282 %、287.9 %、30.65 %, 集体提留占人民公社纯收入比重分别增加 236.91 %、265.83 %、32.65 %。在农村生产力未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 增加集体积累将减少农民个体消费。1956 年人民公社分给社员收入绝对额和比重为 218 亿元、82.58 %, 以 1956 年为基期, 1958—1960 年社员收入分别下降 2.05 %、11.1 %、4.75 %; 社员收入占人民公社纯收入比重分别下降 13.68 %、16.15 %、3.29 %。

表 1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年 份	纯收入	国家税收		集体提留		分给社员	
		绝对额(亿元)	比 重(%)	绝对额(亿元)	比 重(%)	绝对额(亿元)	比 重(%)
1956	265.20	33.80	12.75	12.40	4.68	219.00	82.58
1957	270.24	36.17	13.38	22.59	8.36	211.48	78.26
1958	300.90	39.00	12.96	47.40	15.75	214.50	71.29
1959	281.20	38.40	13.66	48.10	17.11	194.70	69.24
1960	261.20	36.40	13.94	16.20	6.20	208.60	79.86
1961	302.20	26.40	8.74	28.00	9.27	247.80	82.00
1962	303.70	27.50	9.05	27.60	9.09	248.60	81.86
1963	315.80	28.80	9.12	30.90	9.78	256.10	81.10
1964	348.20	33.20	9.53	45.70	13.12	269.30	77.34
1965	381.89	29.80	7.80	47.49	12.44	304.60	79.76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 510—511 页)。

[7] 中央农村工作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1958 年 9 月 30 日(黄道霞等,1992,第 503—504 页)。

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的集体提留, 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性的公积金为主, 用于增加社员集体福利的公益金为辅。[8] 在“大跃进”运动中集体积累严重挤占农民个人消费。1956 年每人提取公积金 2 元,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均公积金负担加重, 1958—1960 年分别升至 7. 7 元、7. 7 元、2. 2 元。1956 年每人提取公益金为 0. 41 元, 1958—1959 年分别增至 1. 19 元、1. 34 元、0. 74 元。相应地, 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大幅度下降。1956 年每人分得收入为 43 元, 1958—1960 年分别为 41. 4 元、37. 6 元、41. 3 元, 分别比 1956 年下降 3. 7 %、12. 6 %、3. 9 %。(国家统计局, 1980, 第 4、278—279 页)

农村收入以农业生产, 尤其是粮食生产为主要来源。农村收入分配一般是在秋收后进行, 收入分配对死亡率的影响在下一年才会显现。(Kung and Lin, 2003, p. 62) 因此, 集体提留的增加、农民消费的下降与对死亡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如图 2 所示, 1957 年集体提留比重开始提高, 1958 年人口死亡率在农业丰收的情况下略有提高。1959 年集体提留比重达到最高值, 1960 年人口死亡率达到高峰值。1960 年集体提留比重大幅度下降, 但高于 1956 年的水平; 1961 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但高于 1956 年的水平。可见, 农村集体提留比重与滞后一期的死亡率变化趋势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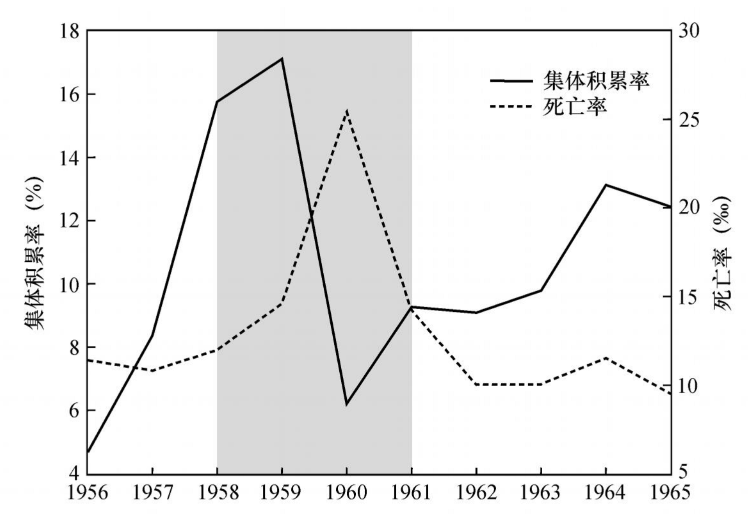


图 2　农村集体提留比重与死亡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1983, 第 510—511 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90, 第 2 页)。

[8] 1958—1960 年“大跃进”运动时期, 集体提留中公积金与公益金占比平均值分别为 79. 63 %、16. 75 %。数据来源同表 1。

(三) 农村“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的集体积累主要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兴办集体企业和兴办以教育为主的集体福利事业之中，极大消耗了农村集体收入，在粮食产出下降、粮食高征购的情况下进一步减少了农民粮食消费量。

1. 农田水利建设

1956 年“农业四十条”提出 12 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以 1955 年为标准增加两倍以上的指标，并将兴修水利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9]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农村地区在缺乏国家财政支持的条件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计划，农村集体组织及农民群众成为这场水利运动的主角。[10] 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在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中不断增加：1957 年 10 月为两三千万，11 月为六千万，12 月八千万，1958 年 1 月达到一亿 (薄一波，1997，第 681 页)。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 4.5 亿亩，半年内灌溉面积增加了 86.5 %。1958 年五、六月份襄阳会议和郑州会议拟定 1959 年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 4.9 亿亩，治涝面积 7 281 万亩，做土石方 961 亿公方。全国各地在拟订具体计划时都大大提高了水利建设指标，进一步加重了农村集体和农民群众的负担。[11] 根据 1959 年官方公布的数据，1958 年“灌溉面积”高达 67 386 千公顷，比 1957 年增加 96 % (农业部计划局，1959，第 293 页)；2000 年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1958 年实际有效灌溉面积仅为 32 791 千公顷，仅比 1957 年增加 20 %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5，第 69 页)。可见，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耗费大量资源，但未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

2. 兴办农村集体工业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兴办社队企业也消耗了大量的集体积累。在赶超战略思路影响下，为提高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兴办工业成为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的重要措施。[12] 一方面，为了增加钢铁产量实现赶超目标，农村地区实施土法炼钢，兴建大量的小高炉、土炉，并动员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钢铁生产。“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真实反映了“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农村的炼铁热潮。另一方面，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纷纷转为社队企业，农村工业生产实现“大跃进”:

[9] 《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 年 1 月 26 日。

[10] 1957 年 12 月,中共河南省委在总结济源县漭河和禹县鸠山两县治水治山经验的基础上,在郑州召开沙颍河工作会议,会议制定出“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1958 年 2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肯定和推广河南治理漭河的经验。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提出农村兴修农田水利工程“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从此“三主”方针推向全国,在水利建设上掀起了“大跃进”。

[11] 《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11 日。

[12]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57 年集体工业企业 11. 99 万个, 1958 —1960 年分别增至 14. 4 万个、21. 96 万个、15. 8 万个; 1958 年集体工业企业产值为 117. 3 亿元, 1959 —1961 年分别增至 169. 8 亿元、153. 9 亿元、122 亿元。[13]

3. 农村教育“大跃进”

1958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强调国家办学与民间力量办学并举, 并规定了过高的教育指标: 全国应在 3 —5 年的时间内, 基本上扫除文盲, 普及小学教育, 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14] 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任务主要落在农村地区, 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强调农村自力更生兴办地方教育, 农村集体不得不以增加提取公益金的形式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实现教育“大跃进”。1957 年全国中等学校、小学和幼儿园在校生人数分别为 708. 1 万人、6 428. 3 万人、108. 8 万人, 1958 年迅速增加至 1 199. 8 万人、8 640. 3 万人、2 950. 1 万人, 分别增长了 69. 4 %、34. 4 %、26. 1 倍。1959 年三层次学校在校生人数继续迅速增加, 1960 年达到高峰值, 分别为 1 487. 3 万人、9 379. 1 万人、2 933. 1 万人。[15]

(四) 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作用

如上所述,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提高了集体提留的绝对额和比重, 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作用存在生产效应、健康效应和分配效应三种机制。

首先, 在“大跃进”运动中抽调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 减少了农业投入及产出, 以致 1960 年 8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保粮、保钢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水利建设、社办工业以及其他方面占用劳动力过多, 以致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不足”。根据 Li and Yang (2005) 的研究,“大跃进”运动时期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解释了中国 1958 —1961 年农业产出下降的 33 %, 即“大跃进”时期中国农业产出下降的三分之一是由资源转移造成的。

其次, 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高消耗的水利和炼钢工程, 在“大跃进”初期过度消耗农民口粮, 在粮食日益紧缺时农民在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同时口粮消费却严重不足, 大量农民甚至是在高度饥饿状态从事高强度劳动的, 从而加剧了饥荒。[16] 这就是 Kung and Lin (2003) 强调的在政治激进主义下农村“大跃进”运动的健康效应。

最后, 集体提高提留将直接减少农民可消费的粮食, 这种分配效应是

[13]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5 ,第 63 页) 。
[1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20 日。
[1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第 37 页) 。尽管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全国层面教育“大跃进”的情况,但由于我国教育城乡差距显著,各层次学校在校生的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村教育“大跃进”引起的。
[16] 安徽凤阳县建设电灌站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还克扣民工口粮 12 万余斤。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民工 2 474 人,占民工总数 14 293 人的 17. 3 %(杨继绳,2008 ,第 249 页) 。

"大跃进"加剧饥荒的又一重要机制。如上所述,"大跃进"运动中农村集体分配以粮食分配为主,工资分配只占很小比例。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粮食在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和分给社员三者之间进行分配,其中集体提留包括种子、饲料、储备粮和其他提留四类。[17]在"大跃进"时期,集体提留的粮食数量大大增加。据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估计,在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我国农村多留了种子约 200 亿斤,[18]相当于当年农村征购后留粮量的 6.2%,相当于当年农村粮食消费量的 9.3%。[19]在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省,"大跃进"时期大幅度提高集体提留,其后集体提留显著下降帮助农民摆脱饥荒。从 1961—1963 年,四川绵阳地区农村粮食分配中集体提留的比重从 20.5%降至 17.5%、13.4%。其中,种子比重从 12.5%分别降至 10.8%、9.2%,饲料粮比重从 4.6%降至 3.4%、2.2%,储备粮比重从 2.3%降至 1.6%、1.5%,其他用粮比重 1961 年为 1.1%,1962 年略增至 1.7%,1963 年降至 0.6%。社员分粮比重则从 47.1%增至 60.4%、62.2%;1961 年社员人均分粮仅为 225 斤,1962—1963 年升至 335 斤、377 斤。[20]可见,饥荒时期集体提留增加挤占了农民粮食消费量。

综上所述,"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高集体积累政策可能是大饥荒的又一主要成因。下节将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以衡量各因素对饥荒的实际作用。

四、数据与模型

(一) 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利用 1954—1966 年 28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Lin and Yang,2000;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或 1958—1961 年 24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Kung and Lin,2003)进行固定效应分析。本文则沿用类似方法建立模型,并利用 1953—1966 年 28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21]所不同的是,本文先计算各变量的组内变换值(即对时间均值求差分),然后以组内变换值作为模型变量,[22]再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并进行 Hausman 检

[17] 种子用于来年农业生产,饲料用于发展集体家畜家禽的养殖,储备粮用于农村备荒备灾、互通有无,其他用粮为集体用于发展社办工业的资金来源。

[18] 薛暮桥(1984,第 90 页)。

[19] 1958 年农村国家征购后留粮量为 3 165.5 亿斤原粮,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为 2 152 亿斤贸易粮(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 343、538 页)。

[20] 绵阳地区农业局(1976,第 114—138 页)。

[21] 本文之所以选择 1953 年作为研究的起点,是因为 1953 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从 1949—1952 年的恢复时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22] 本文以各因素组内变换值作为模型变量(假设 x 为自变量、y 为因变量),其经济含义是,如果以 x、y 在整个研究期间的均值作为参照,x 的变化对 y 的变化作用如何。

验。基本模型设定见公式（1），令 z 代表各变量，则 $\Delta z_{it} = z_{it} - \bar{z}_i$。其中，$i$ 为地区，t 为年份。DR_{it}、UP_{it}、g_{it} 分别为 i 地区 t 年死亡率、非农业人口比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CR_{it-1}、pr_{it-1}、RS_{it-1}、DR_{it-1} 分别为 i 地区滞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率、农业人口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和死亡率。我国粮食分配一般安排在秋粮收获之后，集体积累、粮食征购和农业人口返销粮对死亡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模型取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率和农业人口返销粮比率的滞后一期值。粮食征购率控制城市偏向政策，农业人口返销粮比例控制缺粮区偏向政策，滞后一期的死亡率包含了那些遗漏的变量对本期因变量的影响。[23]

本文取上述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值作为模型自变量，公式（1）用 ΔX 表示前述各变量。为考察各因变量在“大跃进”前夕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模型引入各因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关于大饥荒持续时间，本文分别选择三个区段：$d_1 = 1$，当 $t = 1958—1962$，否则 $d_1 = 0$；$d_2 = 1$，当 $t = 1958—1961$，否则 $d_2 = 0$；$d_3 = 1$，当 $t = 1959—1961$，否则 $d_3 = 0$。公式（1）中各交互项下方给出了理论预期的参数估计值符号：农村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率对地区死亡率产生正向影响；农业人口返销粮比例、人均粮食占有量、非农人口比例对地区死亡率产生负向影响，滞后一期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Delta \ln DR_{i,t} = f[\Delta X, d_i \underset{+}{\Delta \ln CR_{it-1}}, d_i \underset{+}{\Delta \ln pr_{it-1}}, d_i \underset{-}{\Delta \ln RS_{it-1}}, d_i \underset{-}{\Delta \ln UP_{it}}, d_i \underset{-}{\Delta \ln g_{it}}, d_i \underset{?}{\Delta DR_{it-1}}]. \quad (1)$$

本文只有全国层面农村集体积累的数据，但无法获得各地区农村集体提留比重的数据，如何衡量集体积累成为本研究的难点。如上所述，农村集体积累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和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公益金，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提留被消耗在农田水利建设、兴办集体企业和农村教育事业上。因此，本文分别以各地区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 IA_{it}、以 1957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集体工业企业产值 CIP_{it}、[24]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S_{it} 度量 $t-1$ 期农村集体积累率。在“大跃进”时期，农村集体积累率越高，农田水利建设、集体工业企业及乡村教育投资规模越大，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集体工业企业产值和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也越高。[25]图 3 至图 5 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从全国水平来看，在“大跃进”运动时期，滞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积累

---

[23]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7）在其实证模型中引入因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因为“当使用面板数据来分析时可能会因为省略变量造成残差项序列相关，当省略的变量与文中的某变量相关时，则该变量的估计将是有偏的，为了解决这种自相关问题，需要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本文实证模型沿用相似的方法。

[24] 集体工业企业主要是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及人民公社化后的社队企业。

[25] 为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的号召，在“大跃进”中越是政治激进的地区，中学生在校生规模扩张得越快，农村集体越倾向于增加提取公益金办教育。

率与当期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率、集体工业企业产值、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成正比。因此，IA、CIP 和 *S* 可以作为农村集体积累率的代理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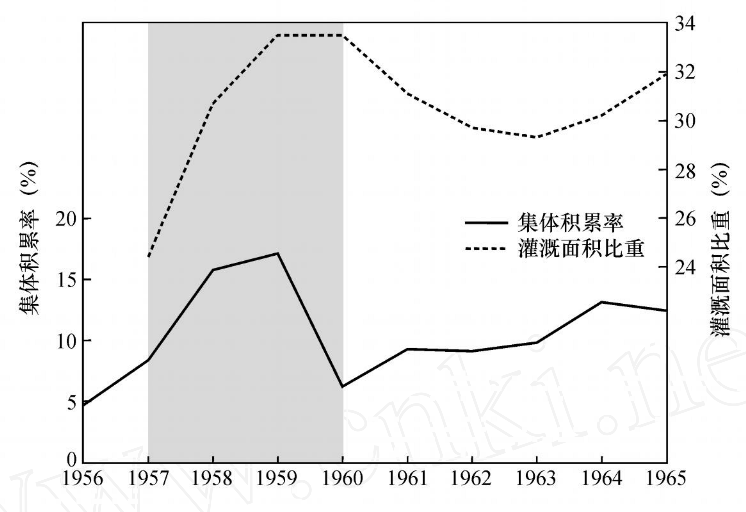


图 3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灌溉面积比重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 510—511 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5，第 6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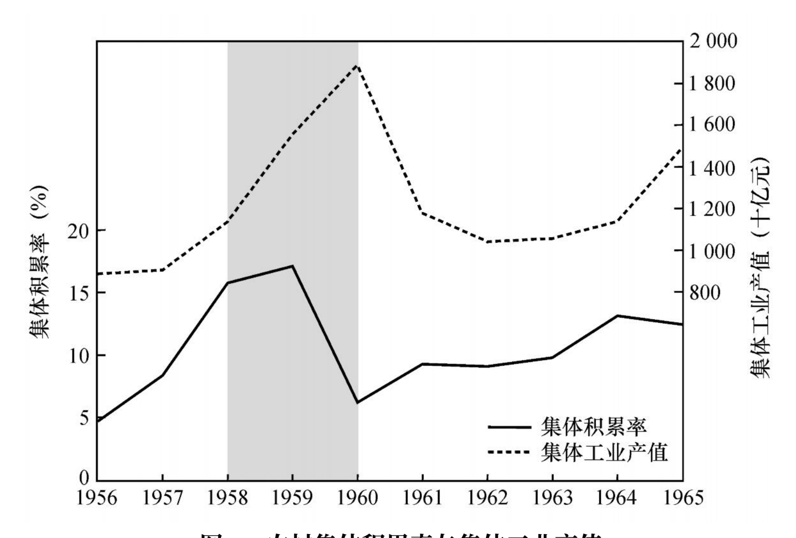


图 4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集体工业产值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 510—511 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由于缺乏分省的粮食库存及调拨数据，现有研究一般以人均粮食产量两年移动平均值衡量 FAD 因素。一个地区的粮食供应总量，除本地区当期粮食产量之外，还包括上期粮食库存及省际净调拨量。因此，现有研究未能准确衡量 FAD 因素，对京、津、沪、辽四个粮食调入省市可能存在低估，对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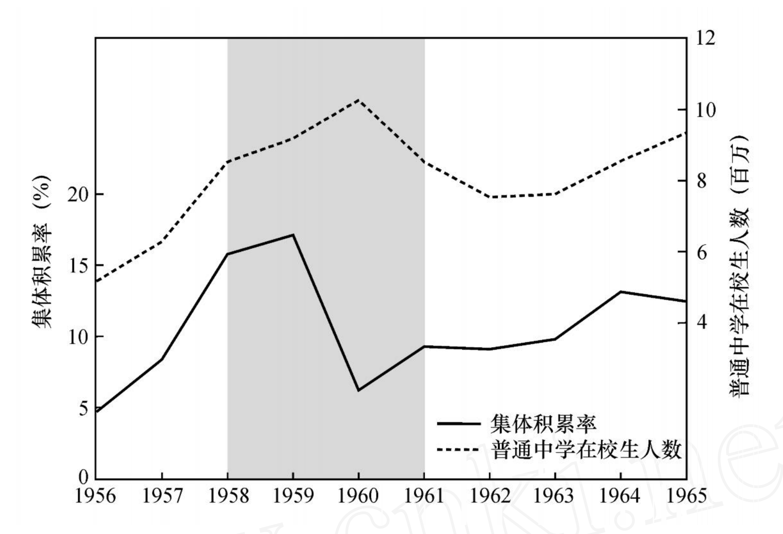


图 5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 510—511 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 37 页）。

粮食调出任务的省区存在高估。本文在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时将考虑地区粮食库存及调拨数。

Kung and Lin（2003）在度量粮食征购率时，粮食产量采用的是原粮，粮食征购及返销采用的是贸易粮。各年原粮折合贸易粮的比率大致在 82 %—84 %范围内变动（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 645 页），Kung 和 Lin 可能低估了粮食征购率，本文粮食征购率计算区分了原粮和贸易粮，将原粮按各年全国折合率换算成贸易粮。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以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人均播种/耕地面积作为缺粮区返销粮的代理变量。正如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指出，农村返销粮数量更能反映缺粮区偏向，本文以地区农村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重来衡量缺粮区偏向政策。

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比较，本文模型除使用各因素新变量之外，还以现有研究的变量做分析。关于各变量的具体计算和数据来源见附录 1，各变量统计性描述见表 2。

表 2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　量	观察值	均　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Delta\ln D_{it}$	385	1. 42e-08	0. 2873147	- 0. 8268317	1. 743276
$\Delta\ln D_{it-1}$	357	- 5. 74e-07	0. 2846466	- 0. 8442672	1. 703136
$\Delta\ln g_{it}$	392	- 2. 31E-08	0. 153997	- 0. 41296	0. 518447
$\Delta\ln UP_{it}$	392	- 6. 69e-09	0. 1867755	- 0. 5908706	1. 643666
$\Delta\ln pr_{it-1}$	364	1. 41E-08	0. 197219	- 0. 93898	0. 676261
$\Delta\ln RS_{it-1}$	391	2. 01E-08	0. 475547	- 2. 65615	1. 362741
$\Delta\ln CIP_{it}$	391	7. 32E-09	0. 992695	- 3. 58565	1. 405791
$\Delta\ln IA_{it}$	392	3. 50E-09	0. 352394	- 1. 74215	1. 201868
$\Delta\ln S_{it}$	391	- 1. 97E-08	0. 481072	- 1. 6784	0. 97530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5)、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
注:本文模型取各变量组内变换值,因此出现负值,正负相抵导致均值很小。

(二) 估计结果

本文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 Hausman 检验结果支持随机效应模型,表 3 列示了各方程随机效应分析结果。本文证明,除粮食供应不足、粮食超征购之外,农村集体高积累是导致“大跃进”饥荒的又一主要原因。

表 3　模型随机效应估计结果

自变量	(1)	(2)	(3)	(4)	(5)	(6)
$\Delta\ln g_{it}$	- 0. 008 (0. 10)	- 0. 070 (0. 12)	- 0. 029 (- 0. 11)	0. 098 (0. 11)	0. 104 (0. 11)	0. 043 (0. 13)
$\Delta\ln UP_{it}$	- 0. 021 (0. 13)	- 0. 155 (0. 12)	0. 030 (0. 13)			- 0. 155 (0. 16)
$\Delta\ln pr_{it-1}$	0. 029 (0. 10)	0. 012 (0. 10)	- 0. 012 (0. 10)	0. 030 (0. 13)	0. 032 (0. 13)	
$\Delta\ln RS_{it-1}$	- 0. 021 (0. 03)	- 0. 025 (0. 04)	- 0. 018 (0. 03)	- 0. 017 (0. 03)	- 0. 016 (0. 03)	- 0. 023 (0. 03)
$\Delta\ln CIP_{it}$	- 0. 054 * (0. 02)			- 0. 050 * (0. 02)	- 0. 049 * (0. 02)	
$\Delta\ln IA_{it}$		- 0. 119 * (0. 05)				- 0. 114 *** (0. 07)
$\Delta\ln S_{it}$			- 0. 109 * (0. 04)			
$\Delta\ln D_{it-1}$	0. 346 * (0. 07)	0. 351 * (0. 07)	0. 339 * (0. 07)	0. 346 * (0. 07)	0. 346 * (0. 08)	0. 351 * (0. 08)
d_2	0. 108 * (0. 04)	0. 123 * (0. 04)	0. 120 * (0. 04)	0. 109 * (0. 04)	0. 109 * (0. 04)	0. 172 * (0. 04)
$\Delta\ln g_{it} \times d_2$	- 0. 464 ** (0. 20)	- 0. 402 *** (0. 21)	- 0. 517 * (0. 20)	- 0. 203 (0. 26)	- 0. 221 (0. 26)	- 0. 556 ** (0. 28)

(续表)

自变量	(1)	(2)	(3)	(4)	(5)	(6)
$\Delta \ln UP_{it} \times d_2$	0. 100	0. 331 **	0. 035			0. 563 *
	(0. 17)	(0. 17)	(0. 18)			(0. 21)
$\Delta \ln pr_{it-1} \times d_2$	0. 777 *	0. 846 *	0. 780 *	1. 007 *	1. 003 *	
	(0. 16)	(0. 16)	(0. 17)	(0. 19)	(0. 19)	
$\Delta \ln RS_{it-1} \times d_2$	- 0. 058	- 0. 047	- 0. 081	- 0. 084	- 0. 087	0. 151
	(0. 08)	(0. 08)	(0. 08)	(0. 09)	(0. 09)	(0. 09)
$\Delta \ln CIP_{it} \times d_2$	0. 158 *			0. 175 *	0. 174 *	
	(0. 05)			(0. 05)	(0. 05)	
$\Delta \ln IA_{it} \times d_2$		0. 282 **				0. 392 *
		(0. 12)				(0. 15)
$\Delta \ln S_{it} \times d_2$			0. 291 *			
			(0. 12)			
$\Delta \ln D_{it-1} \times d_2$	- 0. 521 *	- 0. 539 *	- 0. 514 *	- 0. 496 *	- 0. 497 *	- 0. 440 *
	(0. 10)	(0. 10)	(0. 10)	(0. 11)	(0. 11)	(0. 12)
常数项	- 0. 085 *	- 0. 092 *	- 0. 086 *	- 0. 089 *	- 0. 089 *	- 0. 100 *
	(0. 02)	(0. 02)	(0. 02)	(0. 02)	(0. 02)	(0. 02)
R^2	0. 495	0. 488	0. 489	0. 502	0. 502	0. 395
Hausman P 值	0. 99	0. 99	0. 98	0. 98	0. 98	0. 99
观察值	357	357	356	318	318	318

注:方程(1) —(3) 的 g_{it} = [粮食产量(贸易粮) + 库存 - 调出 + 调入]/ 年均人口;方程(4) 、(6) 的 g_{it} = [粮食产量(贸易粮)/ 年均人口],并取两年移动平均值;方程(5) 的 g_{it} = [粮食产量(原粮)/ 年均人口],并取两年移动平均值。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 、* * 、* * * 分别代表 1 %、5 %、10 %的显著性水平。

第一, 本文未发现支持缺粮区偏向理论的证据。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2007) 提出缺粮区农民享有仅次于城市居民的粮食获取权, 因此缺粮区人口比例越大死亡率越低。本文以农业人口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更加准确地度量了缺粮区人口比例, 但分析结果并未支持缺粮区偏向理论。在正常时期, 返销粮比例与地区死亡率负相关,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在大饥荒时期, 农业返销粮比例与地区死亡率正相关, 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表明农业返销粮制度并未有效减轻饥荒, 缺粮区偏向理论夸大了经济作物区和传统缺粮区农民的粮食优先获取权。[26]

第二, 本文发现支持 FAD 理论的证据。本文发现, 如果考虑粮食库存及省际调拨, 饥荒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地区死亡率之间显著负相关, 即粮食供应减少的确加剧了人口死亡; 在正常时期, 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地区死亡率

---

[26] 大饥荒时期农业返销粮不足的证据是,1959 —1961 年每一农业人口年均返销粮仅为 56. 9 斤,低于 1954 年长江流域水灾年份的 63. 9 斤(根据表 1 数据来源计算) 。考虑“大跃进”时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和受灾人口大幅增加,缺粮区农民人均返销粮数量将更少。从农业返销粮总量上看,1960 —1961 粮食年度,农村返销粮仅为 362. 08 亿斤,远低于 1957 —1958 粮食年度的 419. 66 亿斤(杨继绳,2008:第 752 页) 。因此,由于各级地方政府隐瞒灾情及可调配的粮食数量有限,农业返销粮无法缓解缺粮区农民的饥荒问题。

之间虽然呈负向关系，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27] 另外，方程（4）、（5）表明，如果仅考虑粮食生产，粮食供给因素对死亡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三，在正常时期，上期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当期死亡率也越高，这可能反映了诸如医疗卫生条件、人口寿命特征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在大饥荒时期，滞后一期死亡率与当期死亡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表明某地区在遭受严重饥荒之后，其他激进政策可能有所退却，从而导致死亡率下降。[28]

第四，城市偏向政策是饥荒的重要成因。Kung and Lin（2003）以农业人口比例和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发现两者均与地区死亡率显著正相关。本文发现粮食征购率显著提高了地区死亡率，但并未发现非农人口比例显著降低地区死亡率的证据。这一结果是容易理解的：粮食高征购目的有三：保证不断增长的非农人口的粮食供应、支持粮油工业发展及出口换汇，粮食高征购与非农人口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粮食征购率指标已经充分捕捉了城市偏向政策的信息，所以非农人口比例变量参数估计值在统计上不显著。方程（6）单独以非农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与虚拟变量交互项显著为正，但参数估计值减少，说明城市化只是粮食高征购的目的之一。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农村集体高积累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发现，在正常时期，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及普通中学学生数与地区死亡率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但在“大跃进”时期，三变量与地区死亡率则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在正常年景，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普通中学学生数反映了农村工农业及社会发展水平，这三个指标越高表明该地区农村社会越发达，地区死亡率则越低。在“大跃进”时期，集体工业、农田水利事业及农村教育事业的迅速增长，并非农村经济发展所致，而是人民公社强制提高集体积累降低农民个人消费的结果。因此，“大跃进”时期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及普通中学学生数的增加反而显著提高了地区死亡率，模型结果支持了第三节的理论分析。

根据方程（1）—（3）本文分解了各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如表 4 所示，以集体工业产值衡量集体积累，集体高积累、粮食高征购和粮食供应下降三

---

[27] 如方程(3)、方程(4)所示，排除京、津、沪三直辖市之后，人均粮食占有量变量参数估计值显著性下降，分别为 12%、20%。本文认为，这一显著水平仍可以接受。

[28] 范子英等(2008)将饥荒在 1962 年结束归因于达尔文现象。本文滞后一期死亡率变量与累计死亡率变量有所区别。实际上，饥荒的结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如降低粮食征购率和农村集体提留比例导致农村留粮大幅度增加，解散公共食堂及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例如，1953—1961 年，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低于非农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在饥荒最严重的 1960 年，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为 177.4 公斤/年，非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却高达 241.5 公斤/年。1962 年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203.65 公斤，非农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201.99 公斤，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超过非农人口，并一直保持这一趋势。关于饥荒结束的原因，见文贯中、刘愿《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一文第三节的论述。

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率实际增加 7.7 %、16.1 %、5.3 %。以灌溉面积比例衡量集体积累程度时，三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率实际增加 3.3 %、17.5 %、4.6 %。以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衡量集体积累程度，三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亡率实际增加 8.1 %、16.1 %、6.0 %。从三方程结果来看，本文结果解释了地区死亡率差异的 87.9 %、74.2 %、91.5 %，具有较充分的解释力。

表 4　饥荒影响因素分解

变　量	正常时期 A	饥荒时期 B	两时期之差 $C = B - A$	方程(1) E_1 (D_1)	方程(2) E_2 (D_2)	方程(3) E_3 (D_3)
死亡率	-0.084	0.205	0.290	(87.9)	(74.2)	(91.5)
集体高积累						
集体工业产值	-0.212	0.527	0.739	0.104 (7.7)		
灌溉面积比重	-0.057	0.143	0.201		0.163 (3.3)	
普通中学学生	-0.127	0.316	0.442			0.182 (8.1)
粮食高征购	-0.064	0.143	0.207	0.777 (16.1)	0.846 (17.5)	0.780 (16.1)
粮食供应下降	0.033	-0.082	-0.115	-0.464 (5.3)	-0.402 (4.6)	-0.517 (6.0)
滞后一期死亡率	-0.065	0.143	0.208	-0.175 (-3.6)	-0.188 (-3.9)	-0.175 (-3.6)

注：A 为正常时期各变量年均值，B 为饥荒时期各变量年均值，$C = B - A$，D_1 - D_3 为括号前方数字各变量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弹性 E，括号内数字为各因素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因子，单位为 %，具体计算公式是 $D_i = (C \times E_i) \times 100\% (i = 1, 2, 3)$。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1) 本文尝试以排除京、津、沪三直辖市后的 26 个省区 14 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2) 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本文还研究了 1954—1966 年期间包括京津沪和不包括京津沪的面板数据，在变量指标方面直接以两年人均产量移动平均值衡量 FAD 因素，并分别以非农人口比例和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29] (3) 本文选择三个区段衡量大饥荒持续时间：1958—1962 年、1958—1961 年、1959—1961 年。

本文模型分析表明：分别以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和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衡量农村集体积累率的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对两组样本（包括三直

[29] 作者 2009 年 8 月在内蒙古大学参加"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席会议"时，范子英提出本文可以尝试以两年人均产量移动平均值衡量 FAD 因素及分别以非农人口比例或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以此检验本文模型的稳健性。

辖市和排除了三直辖市两组）的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差异；即使将 1953 年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模型结果仍未发生变化；以三个区段衡量大饥荒持续时间，模型结果相似，只是模型拟合系数略有不同。[30] 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作比较，方程（4）—（6）分别选取了不同指标测量 FAD 因素及城市偏向政策。方程（4）、（5）分别以人均粮食产量两年移动平均值度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并在模型中仅以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发现人均粮食占有量与虚拟变量交互项不显著，表明仅从粮食生产角度考虑，食物供应冲击并未对地区死亡率造成显著影响。方程（6）仅以非农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非农人口比例与虚拟变量交互项显著为正，但系数绝对值比粮食征购率与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小，表明以粮食征购率指标更能反映城市偏向政策。

概言之，本文模型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上述替换并未改变模型的核心结论：粮食高征购、集体高积累、粮食供应下降是“大跃进”饥荒的主要成因。

五、结 论

本文研究表明，除了粮食供应下降和粮食高征购之外，“大跃进”运动时期农村集体高积累是饥荒的又一重要成因，这一研究结果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饥荒成因的理解。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国为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从农村征购超额粮食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民公社又通过提高集体提留比例以推动农村地区“大跃进”，在粮食供给冲击下农民个体粮食获取权遭受国家和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侵害，导致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苏联在赶超战略及强制集体化的背景下，粮食产量高估、粮食高征购及将大量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引发了 1931—1933 年苏联饥荒。1947 年基于相似的原因，饥荒再次肆虐苏联。对中国“大跃进”危机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对中国经济体制与绩效关系的洞见，而且提供了一个理解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体饥荒成因的分析框架（Yang，2008）。

中国“大跃进”饥荒，并非农民经济权利失败所致，而是在集权体制下农民政治权利缺失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食物获取权取决于资源相对价格及个体资源禀赋状况，分权体制下经济权利的失败并非系统性的。因此，分权体制下的饥荒的覆盖面及持续期相对有限。集权体制可以发挥动员资源优势，但错误政策将被普遍而有效的强制执行，个体的声音被淹没在高涨的政治运动浪潮中。在一系列集体化运动中，中国农民丧失了个体独立地位，

---

[30] 为节省篇幅，本文未报告大饥荒其他时间段的回归结果。

不得不依附于国家和集体,农民政治权利系统性地缺失。最终,赶超战略的错误政策使占人口总量 80 %的农民遭受饥荒,导致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附录: 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如下: (1)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 (2)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年; (3)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 (1949 —1983)》,1983 年; (4) 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 (1949 —1979)》,1980 年; (5) 农业部计划局,《农业经济资料手册》,农业出版社,1959 年。各变量具体计算程序如下。

1. 人均粮食占有量

在现有研究中,Kung and Lin (2003) 直接以当年人均粮食产量衡量 FAD,Lin and Yang (2000)、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 以两年移动平均数作为考虑库存后的 FAD。因此,现有研究未准确度量地区食物获取量的变化。本文尝试将地区粮食库存量纳入 FAD 之中,即人均粮食 = (当年产量 + 上年库存)/ 当年平均人口数量。为保障城市居民粮食供应,我国确立了粮食库存制度,粮食库存数量与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数量成正比。本文以统购统销制度为界分两个阶段估计各地区粮食库存数。薄一波报告了 1951 —1952、1952 —1953 粮食年度全国和三个直辖市粮食库存数,[31] 因此可以将全国库存数减三直辖市库存数得其余 26 省区粮食库存总量,再根据其余各省区非农业人口占其非农业人口总量的比重将剩余粮食库存线性分配到各省区。以 I_{iT}、I_{it} 表示 i 省 T 粮食年度、t 年年末粮食库存数; UP_{it} 表示 i 省 t 年平均非农业人口数,以 $t-1$ 年年末和 t 年年末平均数表示,$i=1$、2、3 表示北京、天津、上海,$i=4$ —29 表示其余 26 省区,$t=1951$、1952。计算公式见公式 1 —2。根据公式 1 本文得到其余 26 省区 1951 —1952、1952 —1953 粮食年度粮食库存量,取两个粮食年度库存量均值作为各地区 1952 年年末粮食库存数。1953 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因此 1953 年之后粮食库存数的计算方法有变化。以 PR_{it} 表示 i 省 t 年粮食征购量,C_{it}、R_{it} 分别表示 i 省 t 年粮食调出量、调入量,S_{it} 表示 i 省 t 年粮食销售量,$t=1953$ —1966。粮食产量和库存量是在该年度内平均消费的,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时应该考虑年均而非年末人口量,统购统销后年度粮食库存计算见公式 (3)。[32] 因此,i 地区 t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由公式 (4) 得到,其中 P_{it}、Q_{it} 分别为 i 省 t 年末人口数量和 t 年粮食产量折合贸易粮的数量。[33]

$$I_{iT} = \left(UP_{it} \Big/ \sum_{4}^{29} UP_{it} \right) \times \left(\sum_{1}^{29} I_{iT} - \sum_{1}^{3} I_{iT} \right), \qquad \text{公式 1}$$

$$I_{it} = (I_{iT-1} + I_{iT})/2, \qquad \text{公式 2}$$

[31] 薄一波(1997 ,第 255 —256 页)。粮食年度从上年 7 月 1 日至翌年 6 月 30 日止。

[32]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湖南、广东、四川 7 省市在个别年份尤其是饥荒年份出现负库存情况,说明这些地区在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借调外贸粮的方式维持地区粮食供应,但这些借调的粮食必须在下一年偿还,因此并不影响本文对 FAD 的测量。

[33] 现有研究中的粮食产量均为原粮数,高估了人均粮食占有量。因为原粮是指收获以后未经加工的粮食,如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谷子等,因此需要统一换算为粮食流通中计算粮食收购、销售、调拨、库存数量时所使用的粮食品类统称的贸易粮。各年度换算比率见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 ,第 645 页)。

$$I_{it} = Q_{it} - C_{it} + R_{it} - S_{it} + I_{it-1}, \qquad \text{公式 3}$$

$$g_{it} = (Q_{it} - C_{it} + R_{it} + I_{it-1}) / [(P_{it-1} + P_{it})/2]. \qquad \text{公式 4}$$

2. 粮食征购率

Kung and Lin (2003) 的实证分析利用了 1958—1962 年粮食净征购率作为城市偏向政策的指标之一，其度量存在一个细节问题。Kung 和 Lin 的粮食收购量和农业返销粮为贸易粮数，粮食产量是原粮数，贸易粮折合原粮一般为 120%。因此，他们计算的粮食净征购率低估了约 20%。为统一口径，本文利用全国原粮与贸易粮折合率将原粮口径的粮食产量折合成贸易粮，本文按公式 5 计算 1953—1966 年各地区粮食征购率pr_{it}。各地区粮食产量、征购量数据来源于 III。

$$pr_{it} = PR_{it} / Q_{it}. \qquad \text{公式 5}$$

3.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率

灌溉面积数据来源为 (2)，其中黑龙江、上海、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宁夏、新疆 8 地区只有 1952 年、1957 年、1962 年、1965 年、1970 年灌溉面积数据，本文研究期间的其他年份数据缺失，本文用插值法估计缺失年份数据。本文认为，灌溉面积与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成正比，因此以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为调整因子 (湖北、四川、宁夏分别以农业机械动力、基本建设投资、地方财政支出作调整因子)。在正常时期灌溉面积应该随着调整因子增加而提高。以 1952—1957 年期间缺失数据估计为例，具体调整方法如下：(1) 求两个时期灌溉面积之差：$\Delta IA_{52-57} = IA_{57} - IA_{52}$；(2) 求出调整因子环比数：$\Delta FE_t = FE_t / FE_{t-1}$，$t = 1953—1957$，并累计 1953—1957 年的 ΔFE 值 $\sum_{53}^{57}\Delta FE_t$；(3) 求出每一年份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在 1953—1957 年累计增长率中的比重 $\Delta FE_t \Big/ \sum_{53}^{57}\Delta FE_t$；(4) 估计缺失年份灌溉面积 $IA_{53} = IA_{52} + IA_{52-57} \times \Delta FE_t \Big/ \sum_{53}^{57}\Delta FE_t$，其他年份以此类推。按此方法得到的 1957 年的估算值与实际值相等，只是将 1957 年与 1952 年灌溉面积之差根据调整因子分配到各年。

各地区耕地面积数来源于 (4)。1958—1966 年天津耕地数缺失，本文以估算值代替，估算方法是：当复种系数不变时，耕地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成正比，因此可以根据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率推算耕地面积。如果考虑复种系数，则先将农作物播种面积除以全国的复种系数 (假定天津和复种系数与全国复种系数变化成正比)，计算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增长率，以 1957 年耕地面积为基期，根据 1958—1966 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率计算缺失年份耕地面积。按这种方法估算的天津耕地数是按照 1958 年行政区划的数字。

参 考 文 献

[1] Alsop, J.,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 11, 21—37.

[2] Ashton, B., K. Hill, A. Pizza, and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4), 613—645.

[3] Becker, J.,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8.

[4] Berstein, T.,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3), 339—377.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曹树基,"1958—1962 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 年第 1 期,第 57—67 页。

[7] 曹树基,"1959—1961 年中国人口的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 1 期,第 14—28 页。

[8] Chang, G., and G.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1), 1—34.

[9] Chang, G., and G. Wen, "Food Availability versus Consumption Efficiency: Causes of the Chinese Famin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57—166.

[10] Coale, A.,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4.

[11] Davies, R., and S.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2] 杜润生,《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制(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年

[13] Eckstein, A. *et al*.,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 12, 19—53.

[14] Edmondson, C., "An Inquiry into the Termination of Soviet Famine Relief Programmes and the Renewal of Grain Export 1922—23", *Soviet Studies*, 1981, 33(3), 370—385.

[15] Ellman, M., "The 1947 Soviet Famine and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to Famin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24(5), 603—630.

[16] Ellman, M., "The Role of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of Intent i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1—1934", *Europe-Asia Studies*, 2005, 57(6), 823—841.

[17] 范子英、孟令杰,"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2006 年第 8 期,第 104—113 页。

[18] 范子英、孟令杰,"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2007 年第 6 卷第 2 期,第 487—512 页。

[19] 范子英、孟令杰、石慧,"为何 1959—1961 年大饥荒终结于 1962 年",《经济学(季刊)》,2008 年第 8 卷第 1 期,第 287—306 页。

[20]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21] 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89)》,1980 年。

[22]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

[23]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年。

[24] 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

[25] Haggard, S., "Let them eat Juche", *The Economist*, May 8th, 2008.

[26] Haggard, S, and M. Noland, *Famine in North Korea Redux?* Working Paper Series, WP 08—9, Washington D. 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27] Johnson, G., "China's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03—109.

[28] Kung, J., and J.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1), 51—73.

[29]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第** 1—14 **页**。

[30] Li, W., and D.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4), 840—877.

[31] Lin, J.,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6), 1228—1252.

[32] Lin, J., and D. Yang, "On the Caus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the Great Leap Famin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25—140.

[33] Lin, J., and D.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9(460), 136—158.

[34]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中国人口科学**》,1987 **年第** 1 **期**,**第** 56—63 **页**。

[35]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 **年第** 3 **期**,**第** 46、64 **页**。

[36]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载**《**中国人口年鉴**(1987 **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 **年**,**第** 94—106 **页**。

[37] Mallory, W., China: *Land of Famine*.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6.

[38] **绵阳地区农业局**,《**四川省绵阳地区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资料汇编**(1961—1975)》,1976 **年** 10 **月**。

[39]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0—1983)》,1983 **年** 11 **月**。

[40] **农业部计划局**,《**农业经济资料手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 **年**。

[41] O'Grada, C. 2007, "Making Famine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5(1), 3—36.

[42] Ravallion, M., "Famine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3), 1205—1242.

[43] Riskin, C.,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11—124.

[44] Sen, A., *Poverty and Famine*. Oxford, U. K.: Clarendon Press, 1981.

[45] Sen, A.,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Economic Journal*, 1983, 93(372), 745—762.

[46] W. K., Communist China's Agricultural Calam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1, 6, 64—75.

[47] Walker, K.,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48] 新逸、葛玲,"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83—89 页。

[49] 薛暮桥,"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50] Yang, D.,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1] Yang, 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Famine of 1959—1961: A Survey and Comparison to Soviet Famine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 50, 1—29.

[52] Yang, D., and F. Su, "The Politics of Famine and Reform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41—156.

[53] 杨大利,"'大跃进'与当代中国",《二十一世纪》,1998 年第 48 期。

[54]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年。

[55] Yao, S., "A Note on the Causal Factors of China's Famine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6), 1365—1369.

[56] 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简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2 年。

[57] 周飞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映和救助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54—64 页。

Great Leap Forward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State, Collective and Peasants in Centralized System

YUAN LI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suffered the most severe famine in human history from 1958 to 1961. The causes documented in prior studies include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communal dining system, urban bias policy, food deficient regions bias policy, political radicalism, inadequate government relief and historical memory on famine.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people's commune accompanied b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another important cause of the famine.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data from 1953 to 1966, we find that people's commune drastically raised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and thus led to a sharp decline on

peasants' individual food consumption. We argue that the loss of peasants' political rights in centralized system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of famine frequently occurred in traditional socialism.

JEL Classification I38, N55, Q18

第 9 卷第 3 期　经 济 学 (季 刊)　Vol. 9 , No. 3
2010 年 4 月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April , 2010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
——政治权利的视角

刘　愿[*]

摘　要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提出的评论意见，本文再次澄清以下问题：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分析，“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大饥荒成因实证研究中的计量问题。最后，本文提出，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问题的钥匙。

关键词　集体积累，饥荒，政治权利

在一个计划的制度中，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

——哈耶克 (1940，第 297 页)

半个世纪前，中国在“大跃进”运动背景下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大跃进”饥荒是多重因素所致，这在学界已达成共识。但在诸多成因中，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如何，人们仍众说纷纭。时任国家统计局及国家计委领导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在 1959 年 6 月反思“大跃进”运动的危害时，精辟地分析了农民缺粮的原因：“去年农民多吃了约 350 亿斤，城市多销了约 100 亿斤，多留种子约 200 亿斤，因此今春农民吃粮供应比较往年更加紧张。”[1]换言之，农民口粮不足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二是城市偏向的国家粮食高征购，三是人民公社集体高积累。公共食堂制度及粮食高征购两个因素已得到较深入的研究，但集体高积累这一因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以下简称《饥荒》) 一文则尝试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将集体高积累因素融入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的分析之中。

杨涛和范子英分别对《饥荒》一文提出了建设性评论意见，包括：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是否适用于分析中国“大跃进”饥荒；集体高积累是否真的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实证研究中代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如何理解具体制度背后的政治激进主义对“大跃进”饥荒的作用。本文在回复上述评论意见基础

[*]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地址：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510006；电话：(020) 39310072；E-mail：hope428@163.com。

[1] 薛暮桥(1984，第 90 页)。

上，提出从政治权利缺失视角理解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饥荒问题的新思路。

一、食物获取权缺失的两个维度：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

在森的开创性研究之前，人们对饥荒成因的认识停留在粮食总供给层面。森基于 1943 年孟加拉大饥荒和 1974 年埃塞俄比亚饥荒的研究提出食物获取权理论，从而将饥荒成因研究扩展至分配领域，大大加深了人们对饥荒问题的认识。根据森的《贫困与饥荒》，不可否认的是，森对饥荒的分析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其所定义的权利包括个人资源禀赋（所有权组合）和交换权利映射（为个人的每一资源禀赋组合规定他可以支配的商品组合集合的函数），权利失败包括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前者指可供自己消费的粮食产量减少，后者指一个人通过贸易获得的粮食减少，即初始资源禀赋及相对价格变化是权利失败的原因。[2] 在森的语境下，直接权利失败并非范子英所指的“（农民）对自己生产的粮食的处置权”的失败。例如，森举例说牧民既食用自己的牲畜，也卖出牲畜换取粮食消费。[3] 以此推理，如果牧民牲畜产量下降，可供他直接消费的牲畜量减少，表现为直接权利失败；由于牲畜产量下降通过交换获得的粮食下降，表现为贸易权利失败。

的确，森的饥荒理论并没有完全忽视政治因素的作用。Sen（1983）比较了民族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认为缺乏自由新闻媒体和政治压力集团导致政府未及时救灾是中国“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并指出权利研究必须超越纯粹的经济因素，同时考虑政治制度安排。但森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政治权利因素没有真正融入其分析框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大跃进”饥荒是农民食物获取权的失败所致，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食物获取权的失败究竟是源于经济因素还是政治因素？森研究孟加拉大饥荒发现，“受灾最严重的职业组是渔民、运输工人、稻谷脱皮者、农业工人、‘其他生产性职业’中的就业者、工匠和城市工人，受灾最轻的是农民和收益分成佃农。”（森，2001，第 92 页。）然而，中国“大跃进”饥荒受灾最严重的恰恰是农民这一群体。如果中国农民拥有支配和消费粮食的自主权，即使粮食大幅度减产也不至于发生如此严重的饥荒，至少农民不会成为饥荒的主要受害者。《饥荒》一文证明，在赶超战略和“大跃进”运动背景下，除了强制性的国家高征购及公共食堂制度等因素之外，人民公社的集体高积累进一步减少了农民个体可消费的粮

---

[2] 森定义了职业组 j 中每个人的最大食物权利 $F_j = q_j p_j / p_f$，或 $F_j = q_j a_j$，其中 a_j 是职业组 j 的食物交换比率 (p_j / p_f)，直接权利失败和贸易权利失败分别表现为 a_j 和 q_j 的下降。(阿马蒂亚 ·森，2001，第 62—69 页)

[3] 阿马蒂亚 ·森(2001，第 69 页)。

食是“大跃进”饥荒的又一重要原因。可见，农民的食物获取权遭受国家和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剥夺。[4]

正如 Grada 在其新著作中所说的那样，苏联、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饥荒恰恰是在宣称要根除贫困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不无讽刺意味。[5]新中国“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建国以来的一系列集体化运动也已将农民个体之间的财产权利平均化，公共食堂制度又彻底取消了私有财产。因此，按照经济权利分析框架，饥荒在农民内部的影响应该是均等的。然而，“大跃进”饥荒的分布即使在同一个村庄内也存在显著的阶层性，表现为干部与群众分布不均衡、不同政治成分群体分布不均衡。

例如，在信阳事件中，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五类分子[6]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的生产队干部死亡占 8. 8 %（204 人，死亡 18 人），社员占 26. 7 %（1 515 人，死亡 404 人）；左围大队的干部死亡占 11. 8 %，社员死亡占 15. 24 %；左围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其总人数的 13 %，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 31 %。[7]又如，据安徽亳县典型调查，1960 年 1 —5 月间，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贫雇农占本阶层的 28. 25 %，中农占本阶层的 12. 5 %，地主富农占本阶层的 44 %。[8]

既然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经济权利是无差异的，为何农村干部及其家属、政治成分好的阶层更容易在饥荒中幸存？显然，政治权利的差异是不同群体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原因。公共食堂将口粮强制性集体化，农村干部享有支配农民口粮的特权。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干部及其家属的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导致粮食分配不均，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被扣饭、体罚甚至殴打致死。

概言之，无论是从城乡之间还是村庄内部微观层面来看，中国的“大跃进”饥荒是农民政治权利缺失而非经济权利失败所致，将政治权利因素融入

4　范子英引用 Berstein (1984) 的研究结果，认为“苏联提高征购率是有意而为之的，中国的征购率的提高是由于对当时情形误判造成的，过高的征购率只是提高征购量一个未预料的结果”；从新近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一结论值得商榷。1953 年实施统购统销以来，中国农民“基本没吃饱过”(杨继绳，2008，第 831 页)。由于国家征购粮食过多，1954 年四川即爆发了 1949 年以后的第二次饥荒(只不过这次饥荒的严重程度和范围比“大跃进”饥荒要小)，李井泉以富农煽动闹粮为名予以镇压(东夫，2009)。因此，高征购并不纯粹是浮夸风造成的，也并非对当时情形的误判造成(1954 年没有浮夸风)，而是赶超战略背景下的一种具有一定刚性的制度安排。另外，范子英认为苏联逼债也是中国粮食高征购多出口的原因之一。这一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沈志华考察了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提出“至于传闻中所说苏联曾追逼中国还债的情况，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2002，第 93 页) 他却发现了 1961 年 3 月苏联为缓解中国的饥荒提供援助的资料(2002，第 86 页)。实际上，中国提前还清债务，并不是苏联逼债，而是毛泽东为了“争一口气”主动提前还清的。(杨继绳，2008，第 594 —595 页。)

5　Cormac ó Gráda，2009. 转引自 David Rieff (2009，p. 46)。

6　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

7　杨继绳(2008，第 51 页)。

8　杨继绳(2008，第 272 页)。

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饥荒分析框架。

二、集体高积累是否减少农民口粮消费

如上所述,“大跃进”饥荒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明确且唯一的,即农民无法获得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粮食。如《饥荒》一文图 1 所示,农民口粮不足可能的原因有:粮食生产大幅度下降使“蛋糕”变小;国家高征购从农村转移了超额粮食;人民公社提高集体积累挤占了农民口粮;公共食堂浪费及干部腐败减少了农民口粮。杨涛和范子英均对集体提高积累挤占农民口粮提出了质疑。杨涛认为,《饥荒》一文无法解释 1960 年集体提留比例下降而当年饥馑状况未见显著好转,集体高提留对饥荒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分析:一方面高积累与抽调劳动力、体能高消耗工程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集体提高提留只会挤占农民的现金和其他分配,不会直接消减口粮;在存粮即将耗尽时,公社可以利用多提留的种子、饲料和储备粮应急救灾,并不一定挤占消费。范子英主张大量的集体提留粮食主要用于增加“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的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消费,并认为“除此之外,很难找到集体提留的用途和原因”。

的确,抽调农村劳动力、兴办体能消耗高的工程、集体高积累是农村“大跃进”政策的共同后果。不过,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确实是为了兴办包括水利和炼钢工程在内的扩大再生产活动而提高集体积累的。根据 1958 年 8 月 22 日《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和消费问题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迅速增加的公共积累,首先应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增加基本建设,扩大再生产。”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部分,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公益金用于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大跃进”运动期间,农村市场取消,集体收入主要以实物(粮食或经济作物)形态存在,现金只占很少比例。[10]从粮食分配角度看,集体提留包括种子、饲料粮、储备粮和其他用粮。种子用于来年农业生产,饲料粮用于发展集体家畜家禽的养殖,储备粮用于农村备荒备灾、互通有无,其他用粮为集体用于发展社办工业的资金来源。因此,集体增加提留势必减少农民口粮消费。例如,农民人均收入从 1956 年的 43 元降至 1959 年的 37.6 元(减少 5.4 元),其中人均现金收入从 10.6 元降至 9.4 元(减少 1.2 元),实物形式的收入减少 4.2 元,占 78%。[11]需指出的是,我国农村收益分配主要集中在秋收以后,因此集体收益分配对粮食消费及人口死亡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1959 年集体提留比重最高,以致 1960 年死亡率最高;1960

[9] 黄道霞等(1992,第 507 页)。
[10] 农村产品被国家低价收购,因此集体现金收入有限。
[11] 国家统计局(1980,第 4 页)。

年集体提留比率下降, 是 1961 年饥荒结束的原因之一。

表 1 详细列出了农村集体各收入分配环节。农村集体总收入在扣除当年各项费用 (主要是生产费用) 后的纯收入在国家税收、集体提留和社员之间分配, 集体提留以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为主。炼钢铁、修水利属于扩大再生产活动, 主要支出是劳动力的粮食补贴, 作为生产费用列支, 来源则是此前各期的集体积累。[12] 如表 1 所示, 农村集体生产费用从 1957 年的 92. 4 亿元增至 1958 年的 104. 6 亿元, 集体提留则从 1956 年的 12. 4 亿元增至 22. 6 亿元; 1959 年的春荒使农村“大跃进”有所退却, 但夏天的庐山会议再次掀起“大跃进”高潮, 农村生产费用从 1959 年的 95. 6 亿元增加至 1960 年 99. 3 亿元, 集体提留在 1959 年达到最高值。因此, 在产量不变的情况下, 集体提留增加确实会减少农民在下一个分配年度前的口粮消费; 当集体积累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和粮食增产时, 农民未来的口粮消费才可能增加。然而, 由于自然灾害及人为政策失误, 粮食产量在 1959 —1961 年三年间连续下滑。

表 1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单位:亿元

年　份	总收入	各项费用		纯收入	国家税收	集体提留			社员分配	
		合　计	# 生产费用			合　计	# 公积金	# 公益金	合　计	# 现金
1956	343. 9	78. 7	77. 0	265. 2	33. 8	12. 4	10. 3	2. 1	219. 0	54. 1
1957	367. 5	97. 3	92. 4	270. 2	36. 2	22. 6	18. 0	4. 6	211. 5	52. 2
1958	410. 2	109. 3	104. 6	300. 9	39. 0	47. 4	40. 6	6. 2	214. 5	53. 0
1959	384. 0	102. 8	95. 6	281. 2	38. 4	48. 1	39. 6	6. 9	194. 7	48. 7
1960	367. 7	106. 5	99. 3	261. 2	36. 4	16. 2	11. 0	3. 7	208. 6	51. 5
1961	412. 3	110. 1	101. 0	302. 2	26. 4	28. 0	17. 3	8. 2	247. 8	61. 7
1962	423. 3	119. 6	109. 6	303. 7	27. 5	27. 6	18. 7	6. 1	248. 6	60. 9
1963	440. 5	124. 7	115. 7	315. 8	28. 8	30. 9	22. 7	6. 7	256. 1	63. 2
1964	489. 6	141. 4	133. 3	348. 2	33. 2	45. 7	35. 0	8. 3	269. 3	66. 2
1965	531. 7	149. 8	133. 2	381. 9	29. 8	47. 5	34. 9	7. 6	304. 6	77. 2

注:总收入 - 各项费用 = 纯收入,生产费用占各项费用 90 %以上;纯收入 = 国家税收 + 集体提留 + 社员分配;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社员分配包括实物(主要是粮食)和现金两部分。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 ,第 510 —511 页) 。

据上引薛暮桥的估计, 1958 年我国农村多留了种子约 200 亿斤, 仅此一项集体提留就相当于当年农村留粮的 6. 2 %, 相当于当年农村粮食消费量的 9. 3 %, 无疑会减少农民 1959 年春口粮消费。当然, 在正常情况下, 在农民口粮不足时公社将利用多提留的种子、饲料粮和储备粮应急救灾, 从而缓解饥荒。不过,“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国家和集体本位主义思想使这一本能的救

[12] 1961 年 3 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大队兴办基本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应该从公积金内开支”(黄道霞等,1992,第 634 页)。

灾机制基本失效，以致出现了农民饿死在堆满粮食的仓库边上的怪象。[13]因此，集体高积累的确减少了农民口粮消费。

如表 2 所示，在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省，“大跃进”时期大幅度提高集体提留，其后集体提留显著下降帮助农民摆脱饥荒。从 1961—1963 年，四川绵阳地区农村粮食分配中集体提留的比重从 20. 5 %降至 17. 5 %、13. 4 %。其中，种子比重从 12. 5 %分别降至 10. 8 %、9. 2 %，饲料粮比重从 4. 6 %降至 3. 4 %、2. 2 %，储备粮比重从 2. 3 %降至 1. 6 %、1. 5 %，其他用粮比重 1961 年为 1. 1 %，1962 年略增至 1. 7 %，1963 年降至 0. 6 %。社员分粮比重则从 47. 1 %增至 60. 4 %、62. 2 %，社员人均分粮从 225 斤升至 335 斤、377 斤。[14]可见，减少集体提留比重及总量有效增加了农民口粮消费，反之亦然。

表 2 1961—1963 年四川省绵阳地区农村人民公社粮食分配比例

年份 / 分配项目	1961		1962		1963	
	比例(%)	人均(斤)	比例(%)	人均(斤)	比例(%)	人均(斤)
粮食分配总数	100	474. 6	100	554. 5	100	606. 4
征购	32. 1	152	22. 0	122	24. 4	148
集体提留	20. 5	97. 4	17. 5	97. 3	13. 4	81. 4
种子	12. 5	59. 2	10. 8	60. 0	9. 2	55. 5
饲料	4. 6	21. 9	3. 4	18. 7	2. 2	13. 6
储备粮	2. 3	11. 1	1. 6	9. 0	1. 5	8. 6
其他用粮	1. 1	5. 3	1. 7	9. 6	0. 6	3. 4
社员分粮	47. 4	225	60. 4	335	62. 2	377

数据来源:绵阳地区农业局(1976 ,第 114 —138 页) 。

实际上，农村集体积累政策在饥荒前后发生明显转变。1958 年 8 月《指示》要求“尽多地积累一些”[15]，导致 1958—1959 年集体提留占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纯收入的比例高达 15. 8 %、17. 1 %。为缓解饥荒，1961 年 3 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规定“生产大队扣留的公积金和公益金一般控

---

[13] 例如,在 1960 年信阳事件中,信阳共有 40 亿斤的粮食库存,但政府未及时开仓放粮导致农村人口大规模死亡,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杨继绳,2008 ,第 54 页。) 1960 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每天降为 4 两(16 进位,相当于 10 进位的 2. 5 两) ,省委负责人提出“吃四两是马列主义,超过四两的是非马列主义”。张家口市蔚县为了模范执行省委指示,做一个“真马列主义者”,将农民口粮标准再压低一两,规定每天定量为 3 两,导致蔚县死亡人口迅速增加。唯独该县东城公社书记武万升秘密召开大队书记会议并决定:从公社掌握的粮食储备中给全社每人分 10 斤粮食,增产队可以分 15 斤。为此,武万升做好了丢官的准备。1960 年冬,张家口地区要杀一批过不了冬的牲口度荒,市委书记胡开明请示省委领导刘子厚,刘子厚不敢决策直至亲自请示毛泽东并得到毛应允后才敢杀牲口救荒。(杨继绳,2008 ,第 494 —495 页。) 可见,在大饥荒时期,集体提留作为一种集体财产受到严格保护,擅自挪用救灾者将冒巨大的政治风险,以致开仓放粮这一公共赈灾救济机制失效,农民有粮却不能吃。从这个角度看,范子英引用的 Berstein (1984) 对饥荒的解释 ——“一些人为或者自然的因素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同时粮食储备又不足以抵消风险,于是饥荒便发生了”,也是不可信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粮食储备不足,而在于救灾机制失效。

[14] 当然,1962 —1963 年的粮食增产对增加农民口粮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15] 黄道霞等(1992 ,第 507 页) 。

制在大队可分配收入的 5 %左右 ”。[16]这种政策的调整, 说明集体提留的确影响了农民生活, 以致社员将集体公积金和公益金提留称为 “二公粮 ”[17], 其作用与国家税收相似。如图 1 所示, 在 “大跃进 ”运动时期, 农民年度的粮食生产收入如一个带有可移动漏口和木栓的水桶, 产量高低决定了木桶最高水位, 国家税收、国家统购[18]、集体提留、公共食堂是水桶由上至下的四个漏出口, 国家和集体通过调节漏口和木栓的位置决定国家征购及集体提留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 粮食总产出在漏出国家征购及集体提留之后的余额才是农民名义的口粮消费, 公共食堂制度又使得农民口粮消费实际量远低于名义量。换言之, 在集权体制下, 农民个体的食物获取权排在国家和集体之后, “大跃进 ”运动中集体高积累挤占农民口粮消费是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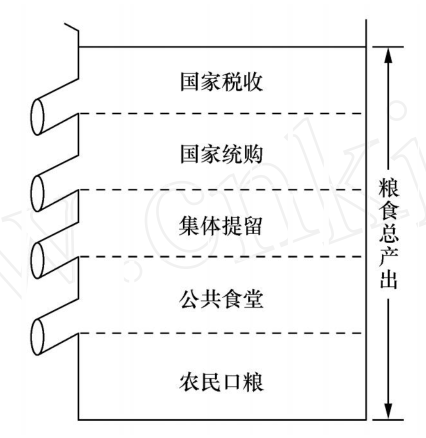


图 1　“大跃进 ”饥荒中农村粮食分配机制

三、实证研究的问题及方向

如上所述, “大跃进 ”饥荒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 由于缺乏完整的数据, 确定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成为大饥荒研究的难点。表 3 总结了国内外关于 “大跃进 ”饥荒成因的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变量及结果。Yang (1996, pp. 59 —64) 以 1959 年各地区党员人口密度作为代理变量, 分析政治激进主义对公共食堂参与率及人口死亡率的实际影响。Chang and Wen (1997) 以 1959 年各地区公共食堂参与率与累积的过度死亡率做相关性分析。Lin and Yang (2000) 用乡村人口比例作为代理变量检验了城市偏向假说。Kung and Lin (2003) 在模型中同时引入地区解放时间、公共食堂参与率、党员人口密

[16] 在 1961 年 6 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五条规定生产大队扣留的公积金控制在大队可分配的总收入的 5 %以内,公益金扣留比例 3 % —5 %(黄道霞等,1992,第 634、643 页) 。
[17] 新逸(2005,第 54 页) 。
[18] 国家统购对农民集体而言本是一项收入,但由于统购价格过低,实质上构成了一项净漏出。

度，发现以地区解放时间衡量的高消耗工程对饥荒有显著作用。曹树基 (2005) 发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与“大跃进”时期地区死亡率之间负相关。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2007) 以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人均农地资源禀赋作为代理变量对其缺粮区偏向假说进行实证研究。

表 3 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实证研究概况

作 者	假 说	关键变量和指标	数据和样本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Dali Yang, 1996	政治激进主义	地区共产党员人口比 DPM，人均国民收入 NIPE	25 个省 1956 年 DPM 和 1957 年 NIPE	简单线性回归	DPM 与饥荒严重程度成反比，NIPE 不显著
Chang and Wen, 1997	公共食堂制度	公共食堂参与率 DHPR	1959 年 25 个省公共食堂参与率与非正常死亡率	简单线性回归	公共食堂参与率与非正常死亡率显著正相关
Lin and Yang, 2000	城市偏向	以地区农村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以两年移动平均人均粮食产量衡量 FAD	28 个省级地区 1954—1966 年数据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城市偏向政策比 FAD 对饥荒的影响更大
Kung and Lin, 2003	政治激进主义	以地区粮食净征购率、农村人口比例控制城市偏向，以地区党员密度 PMD、公共食堂参与率 MHPR、解放时间 TOL 衡量激进政策执行	21 个省级地区 1958—1961 年数据	单向固定效应模型	TOL 显著影响地区死亡率，PMD、MHPR 不显著
曹树基，2005	历史记忆说	1851—1875 年和 1959—1961 年分府死亡人口比率	以清代“府”级为分析单位，涉及 18 省 248 府	简单相关性分析	百年间地区死亡率负相关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	缺粮区划分	以地区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 IP、人均播种面积 CPP 衡量新缺粮区和传统缺粮区、农业人口比重 UP 衡量城市偏向	28 个省级地区 1954—1966 年数据	Probit 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IP 显著降低地区死亡率，未发现 UP 对地区死亡率差异有显著影响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7	缺粮区划分	以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 IP、人均耕地面积 POP、城镇人口比重 UP、粮食征购后人均拥有的粮食数量 CCP	江苏省 55 个县 1954—1977 年的数据	双向固定效应	IP、POP、CCP 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不稳定，UP 对地区死亡率显著影响但绝对量较小

注：本表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在现有实证研究中，Kung and Lin (2003)、曹树基 (2005) 所使用的变量较好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Kung and Lin 的模型以地区解放时间先后排序作为政治激进主义的代理变量，符合计量分析外生性要求。地区解放时间对于大饥荒死亡率而言是外生给定的，但由于后解放的地区南下干部为表示对中央的忠诚而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从而跟政治激进有关。曹树基使用的太平天国时期地区累计死亡率对于“大跃进”饥荒人口死亡而言也是外生给定的，且由于百年前经历过严重灾荒的地区存在“历史记忆”而尽量避免粮食高征购，所以与“大跃进”饥荒人口死亡率负相关。因此，解放时间、地区饥荒史均可以作为广义政治激进主义的工具变量。但这类变量是截面数据，没有反映时序变化的信息。[19]

[19] 令人疑惑的是，解放时间作为截面变量在 Kung 和 Lin 的固定效应模型中应该被舍弃掉，但文章报告了该变量的结果。

其他研究所使用的变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内生性问题。Dali Yang 使用的 1959 年地区党员人口密度与解放时间变量本应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一般来说老解放区党员人口密度较高，但 1959 年的数据掺杂了太多饥荒的因素。例如，如果农村党员享有食物获取优先权，那么党员密度高的地区死亡率较低。公共食堂参与率、乡村人口比例、经济作物播种面积等变量均可能是政府政策选择的结果：政治越激进的地区，公共食堂参与率越高以显示拥护社会主义道路，城镇人口增加越迅速以加快城市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越多以支持工业化。

《饥荒》一文分别以灌溉面积比例、集体工业产值和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作为集体积累的代理变量，可能存在类似问题；而且前两者也是衡量激进主义和高强度劳动体能消耗的变量（Yang，2010）。《饥荒》一文的模型中引入了诸多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其研究意义有二：第一，文章在数据收集和处理上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推进了一步。例如，我们在衡量 FAD 因素时考虑了粮食库存及省际调拨的影响，并将粮食计算口径统一为贸易粮；以农村返销粮准确度量了缺粮区偏向因素。第二，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影响包括生产效应、健康效应和分配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饥荒》一文扩展了 Kung and Lin（2003）的研究，突出分析了集体积累的分配效应。如何定量分析这三种效应是研究的难点。Li and Yang（2005）已研究了“大跃进”运动的农业资源转移对生产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区分健康效应和分配效应对饥荒的作用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实证研究的内生性问题还有一个未引起注意的方面，即饥荒因果关系存在联立性。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一系列激进政策对人口死亡的影响，实际上，饥荒反过来对政策调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事实面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在 1961 年春开始调整政策：在城市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20] 在农村降低粮食征购、减少集体提留、加强对农业的支援、解散公共食堂、缩小农村经济基本核算单位等。[21] 在饥荒后期，一般来说，人口死亡越严重的地区政策调整也越迅速、越彻底，该地区饥荒结束得也越早。[22] 因此，激进政策与人口死亡互为因果关系，要准确衡量各因素对饥荒的作用必须考虑这种联立性问题，这是未来计量研究的另一方向。

---

[20] 柳随年(1982，第 11—12 页)。

[21] 例如，粮食征购率从 1959 年的 39.7%降至 1961 年的 27.4%、1962 年的 23.8%(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 342 页)，集体提留比例从 1959 年最高值的 17.11%降至 1960 年的 6.2%(刘愿，2010，表 1)。1961 年 3 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明确了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1961 年 6 月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解散公共食堂。调整后的社队数量增加、规模减少，农村普遍实行了粮食分到户的办法，公共食堂正式解散，见 1961 年 9 月 6 日《毛泽东对〈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的批示〉》。(黄道霞等，1992，第 647 页。)

[22] 饥荒结束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达尔文效应，而是人口过度死亡后的政策调整。具体见文贯中和刘愿在《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四、跳出具体政策看“大跃进”饥荒——饥荒理论的政治权利视角

既然饥荒成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大跃进”饥荒的作用便成为研究的重点。范子英指出了这种综合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认为“简单将这些解释糅合在一起则会更加混淆，以此来判断各解释的重要性则可能是错误的”。考虑到各项激进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担心不无道理。不过，各项激进政策对饥荒的作用机制是有所差异的，在政治激进主义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各项具体政策对饥荒的作用机制及其相对重要性，具有现实可行性和重要意义。尤其是，透过这些激进政策探讨其根源至关重要。根据森(2001，第 55 页)的定义，饥荒是“食物消费水平的突然大幅度下降”引起的。问题是，为何饥荒受害者的食物消费水平突然大幅度下降了？综合现有的研究，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是：在粮食减产的背景下(尤其是 1959—1961 年)，国家通过高征购和集体通过高积累减少了农民名义上可支配的粮食，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的一系列恶果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实际消费的口粮。

正如两位评论人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国家高征购、集体高积累，还是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政治激进主义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在集权体制下，普通农民因政治权利缺失，其食物获取权遭受国家、集体和乡村特权阶层的剥夺，导致“大跃进”饥荒的发生。虽然饥荒研究已经发展了丰富的概念框架和完善了有关实证研究，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饥荒的理解仍然是相当初步的。[23] 回顾历史，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饥荒发生频率最高、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人口死亡最多。[24] 因此，饥荒在集权体制与分权体制下的发生机制有所区别。

在 20 世纪初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的大辩论中，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以中央计划机构的偏好取代个人自由选择来解决社会选择问题。[25] 哈耶克敏锐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中央计划机构指导活动必然侵犯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哈耶克认为，在一个计划的制度下，所有经济问题都变成了政治问题，计划经济要求社会成员就各种不同需求的相对重要性达成广泛共识，而计划当局只得通过使用强力和宣传这类手段来促使人们达成这种共识并且强行实施一种共同的价值序列。[26] 新中国在匆匆完

[23] Ravallion (1997)；O'Grada (2007)。

[24] 在社会主义国家 90 年的历史中共发生了 6 次大规模的饥荒，平均每 15 年就爆发一次饥荒：苏联先后爆发了三次饥荒(1921—1922，1932—1933，1946—1947)，中国“大跃进”饥荒先后持续了四年(1958—1961)并肆虐全中国，朝鲜在 1995—1997 年爆发严重饥荒，十年后又再次面临饥荒的威胁。

[25] Oskar Lange (1936，1937).

[26] 哈耶克(1940，第 293、297—298 页)。

成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后就迅速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赶超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即成为“大跃进”时期中央计划机构要强行实施的价值序列，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吃饭权被强制置于工业化目标之下，其政治权利系统性的缺失最终演化成一场严重灾难。

苏联和朝鲜历史上饥荒发生的根源与“大跃进”饥荒相似。例如，1932—1934 年苏联乌克兰大饥荒也是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背景下发生的，国家粮食高征购如“铁扫帚”(iron broom) 般过度搜刮了农民的口粮，政府隐瞒甚至否认饥荒的事实并拒绝接受国际机构的粮食援助，最终导致约 500 万人口死亡。[27]朝鲜两次饥荒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朝鲜人民忍饥挨饿之际，朝鲜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导弹及核武器技术却突飞猛进，以致 Stephan Haggard (2008) 在分析朝鲜饥荒时不无讽刺意味的说“让朝鲜人民以‘主体思想’为食吧”。[28]因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饥荒发生机制相似，发展一个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饥荒理论，是深入理解集权体制下的饥荒现象的钥匙，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 考 文 献

[1] Almond, D., L. Edlund, H. Li, and J. Zhang, “Long-term Effects of the 1959—1961 Famine: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in Ito, T., and A. Rose (eds.),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the Pacific Rim*, NBER-EASE Volume 1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2]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4] Chen, Y., and L. Zhou, “The Long-term Health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1959—1961 Famine in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07, 26 (4), 659—681.

[5] 范子英，“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季刊)》，2010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1151—1162 页。

[6] Chang, G., and J.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1), 1—34.

[7] 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1980 年。

[8] 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年。

[9]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年。

[10]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年。

[11] 胡代光，“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公共食堂是怎样办起来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58 年第 4 期，第 97—104 页。

[27] 斯大林将农民抵制交粮的行为视为一场由农民发起反抗苏联统治的战争。但正如 Dalrymple (1964, pp. 250—284) 所说的那样，特别奇怪的是，在这种战争中农民唯一的武器是消极的对抗。

[28] 朝鲜“主体思想”(Juche) 最早由金日成于 1955 年底在反对苏联的去斯大林政策时提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分裂的政治压力下逐渐演化成朝鲜国家意识形态。1965 年 4 月金日成进一步提出“主体思想”的三个原则：政治独立、经济自给、国防自卫。1982 年金正日《关于主体思想》一文赋予“主体思想”明确含义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1996 年金正日将“军事优先”政策融入“主体思想”中。

[12] 黄道霞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

[13] Kung, J., and J.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1), 51—73.

[14] 刘愿,"'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经济学(季刊)》,2010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1119—1142 页。

[15] 龙宇文,"公共食堂积弊千日,解散一时——丰城县小港公社公共食堂追记",《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 年第 4 期。

[16]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7] Meng, X., and N. Qian,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of Famine on Survivors: Evidence from a Unique 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China's Great Famine", NBER Working Papers 1491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9.

[18]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0—1983)》,1983 年 11 月。

[19] 农业部计划局,《农业经济资料手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 年。

[20] 四川省农牧厅,《四川省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2)》,1983 年 6 月。

[21] 文贯中、刘愿,"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经济学(季刊)》,2010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1083—1118 页。

[22]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

[23] 薛暮桥,《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24]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 年。

[25] 杨涛,"探讨大饥荒的成因:集权、计划失误与政治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10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1143—1150 页。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

A General Theory on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An Argument on Political Rights

YUAN LI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Yang and Fan's comments, we re-clarify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s Sen's famine theory applicable to the famines in planning economy? Did the excessive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of people's commune during great leap forward decrease the peasants' food rationing? How to empirically measur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famine's causes?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it is the key to develop a famine theory incorporated with political rights to understand the famines in planning economy.

JEL Classification I38, N55, Q18

第 9 卷第 3 期
2010 年 4 月
经 济 学 (季 刊)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 9, No. 3
April, 2010

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

文贯中　刘　愿*

摘　要　针对杨涛和范子英的评论意见，本文沿着“大跃进”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先后顺序再次厘清以下问题：1958 年粮食产量及需要高体力消耗的各种大型工程是否导致饥荒爆发、公共食堂在庐山会议前后的解散和恢复如何分别减轻和加剧了饥荒、公共食堂制度的度量问题及饥荒的结束是缘于达尔文效应还是政策转向等。本文提出，赋予个人自由选择权是解决类似饥荒这样的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可行方法。

关键词　公共食堂，退出权，饥荒

“大跃进”饥荒已过去半个世纪，其成因逐渐得到较深入的研究，国家高征购、集体高积累和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饥荒的三大主要成因。[1]《从退堂权的失而复得看“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和教训》(以下简称《退堂权》)一文从农民自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失而复得对饥荒的爆发、加重和结束的影响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在大饥荒成因中的关键性作用。《退堂权》一文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高征购和集体高积累之余，如果农民口粮得到有效消费，而不是强制性地集体化，大饥荒是否可避免？该文指出，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以及作为其逻辑延伸的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些做法，彻底破坏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机制，使在口粮紧缺情况下传统的公共及家庭层面的赈灾机制失效，从而导致一系列后果，包括粮食首先遭到过度消费，进而遭到干部的贪污和侵蚀，食堂本身的低效和它所代表的基于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理念的收入分配方式，使农民丧失任何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产量的连年下降。这也揭示了为何“大跃进”饥荒竟然绵延三年，直至农民被允许退出食堂，饥荒才在农民人均粮食消费跌至最低点的时候竟又迅速停止。因此，《退堂权》一文在肯定饥荒其他成因的基础上，认为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及其解散是“大跃进”饥荒触发和结束的最重要的成因。

---

* 文贯中，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刘愿，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刘愿，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510006；电话：(020) 39310072；E-mail：hope428@163.com。

[1] 关于“大跃进”饥荒时期中国农村的粮食分配机制，参见刘愿《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辨——政治权利的视角》一文图 1 的描述。

杨涛和范子英对《退堂权》一文提出了若干评论意见。杨涛认为, 集权体制、计划严重失误与政治行为三因素相互作用, 是造成全国粮食产量下降, 继而导致饥馑荐臻的最主要原因。作为一般的原则, 杨涛提出的这些导致饥荒的因素自然是有道理的。将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的极"左"思想视为饥荒的主要原因的假说虽有道理, 但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极"左"的政治行为并不必然导致饥荒, 饥荒成因研究需再往前推进。所以,《退堂权》一文强调, 离开强制性的食堂以及作为其逻辑延伸的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个三位一体的制度, 笼统地讲集权体制、计划经济和极"左"的政治行为都无法解释如下的问题, 即中国的路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至改革开放前变得越来越"左", 领导的方式也越来越集权, 中央计划的失误也因"文革"的原因而越来越严重, 但大饥荒在 1958 —1961 年后再也没有发生。显然, 杨涛提出的三大原因如果不进一步往前推, 其解释力是不够的。

杨涛提出饥荒的爆发及结束可能存在一些公共食堂以外的因素, 如 1958 年部分地区粮食大量外调及高强度劳动, 饥荒后期合理的粮食调配帮助中国走出低谷。范子英认为 1958 年粮食丰收是不可信的, 公共食堂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 且公共食堂制度并未一贯彻底执行。他再次强调了"大跃进"饥荒的缺粮区偏向和达尔文效应。本文沿着饥荒爆发、加剧及结束的线索再次厘清相关问题。

一、饥 荒 爆 发

范子英 (2010) 认为, 从方法论上来说, 中国 1959 —1961 年的大饥荒并不是特例。由于 1958 年农村在"大跃进"运动中粮食生产管理不善, 即使"风调雨顺", 1958 年实际粮食产量也很可能低于 1957 年, 至少"大丰收"是不可信的。因此, 以公共食堂解释饥荒爆发存在不足。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1958 年粮食 (指原粮) 产量为 4 000 亿斤, 比 1957 年增加 2. 6 %。[2] 那么, 这个数字是否可靠呢 ?

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回忆道, 1958 年 2 月 3 日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提出, 1958 年计划粮食产量 3 920 亿斤, 并认为"这个指标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在年景正常的条件下, 经过努力是能够达到的。"[3] 1958 年成灾面积及其比重比 1957 年均大幅度下降,[4] 农业机械的广泛推广和应用又大大减轻了抽调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5] 国家统计局

---

[2]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第 12 页) 。
[3] 薄一波(1997 ,第 687 页) 。
[4] 1958 年成灾面积为 782 万公顷 ,比 1957 年的 1 498 万公顷 ,下降了 48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2000) 。
[5] 1958 年全国大力推广和应用农业机械。其中 ,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为 26 396 混合台 ,比 1957 年增加了 80 %;联合收割机为 3 452 台 ,比 1957 年增加了 92 %(国家统计局 ,1980 ,第 251 —252 页) 。

公布的产量数据只包括已经收获入库的粮食，排除了浪费在地里的部分。[6]因此，4 000 亿斤粮食产量有其合理依据。近四十年后，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及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在其回忆录中介绍了粮食产量数据的来源。[7] 1958 年 8 月国家统计局召开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向薛暮桥反映浮夸的实情，薛暮桥说："现在'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仍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实际数字拿出来。"果然，1959 年 4 月，周恩来就要薛暮桥到统计局核实 1958 年的统计数字，粮食产量从原来的 7 500 亿斤核减到 5 000 亿斤，后来又核减到 4 000 亿斤。[8]从 1958 年 11 月到 1959 年 6 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庐山会议的初衷也是纠"左"的。[9]因此，1958 年粮食产量 4 000 亿斤的数字是比较全面可靠的，根据个别的猜测无法否定 1958 年粮食增产这一事实。具体到四川省的情况，经过反复核实，1958 年粮食产量为 2 245. 5 万吨，比 1957 年增产 5. 4 %。[10]因此，1958 年四川省粮食增产也是可信的。

可见，中国"大跃进"饥荒是在粮食增产情况下首先在局部地区爆发的，从历史上看的确是一个特例。杨涛则指出，即使粮食增产，一些激进的地方政府把粮食大量外调，加上农民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仍可能导致该地区 1958 年死亡率上升。不过，如图 1 所示，即使考虑粮食征购、外调及库存等因素之后，农村留粮数量与人口死亡之间并没有确切的相关关系。作为 1958 年饥荒首先爆发的地区，四川、甘肃、宁夏等省区农村留粮显著增加。[11] 例如，1958 年四川省农村人均留粮比上年增加了 8. 7 %，死亡率比上年骤增了 13. 1 ‰；1958 年甘肃省人均留粮增加 7. 6 %，死亡率比上年增加了 9. 8 ‰。1958 年云南农村人均留粮下降幅度远小于安徽但死亡率却大大高于安徽。换言之，四川、甘肃、云南三省是在农村留粮显著增加或下降不大的情况下首先爆发饥荒的。

---

[6] 例如，薛暮桥 1959 年 6 月在一份材料中说道：去年（1958 年）粮食的实产量估计是 4 600 亿斤，秋收中损失约 300 亿斤，实收到 4 300 亿斤，比 1957 年增加 600 亿斤（薛暮桥，1984，第 90 页）。可见，国家统计局在核实公布粮食产量时已排除秋收粗糙造成的浪费。

[7] 薛暮桥（1996，第 256 页）。

[8] 薛暮桥（1996，第 256 页）。

[9] 杨继绳（2008，第 762 页）。

[10] 根据 1962 年 8 月 25 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58 年四川粮食产量（原粮）为 495 亿斤，四川省统计局 1962 年 5 月提供的统计数据是 492 亿斤。四川省计划委员会认为统计局的粮食产量偏高，1962 年 7 月对 1957—1961 年四川省粮食产量作了回顾性分析，结果是：1957 年 430 亿斤，1958 年 470 亿斤，1959 年 390 亿斤，1960 年 323 亿斤，1961 年 260 亿斤（杨继绳，2008，第 181、217—218 页）。根据 1983 年四川省农牧厅公布的数据，1958 年四川省粮食产量为 449. 1 亿斤，（四川省农牧厅，1983，第 48 页），国家统计局一直沿用这一数据作为 1958 年四川省粮食产量（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 700 页）。

[11] 云南例外，具体见《退堂权》一文第三节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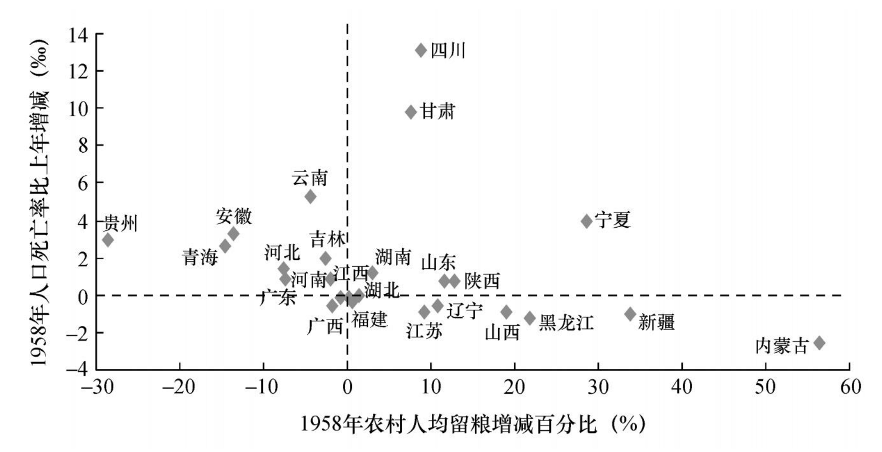


图 1　1958 年各地区农村人均留粮及死亡率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1983)，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1990)。

其次，在大炼钢铁、兴修水利过程中农民被迫参加各种高强度劳动可能导致人口非正常死亡，但这一因素不是四川、甘肃等省首先爆发饥荒的主要原因。如图 2、图 3 所示，从各种指标来看，四川、甘肃、云南三省的农田水利建设在各省区中并不算激进。1958 年四川新增灌溉面积分别为 2 212 万亩 (占比 32 %)、[12]完成土石方 32 亿立方，甘肃、云南农田水利建设规模比四川省还要小。1958 年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省新增灌溉面积及其比重均远远超过四川省的水平：河南省新增灌溉面积 8 254 万亩 (占比 65. 4 %)、完成土石方 65. 4 亿立方；河北新增灌溉面积 6 672 万亩 (占比 71. 1 %)、完成土石方 70 亿立方；山东新增灌溉面积 6 100 万亩 (占比 67. 1 %)、完成土石方 67. 1 亿立方；安徽新增灌溉面积 2 675 万亩 (占比 43. 9 %)、完成土石方 60. 6 亿立方。[13]考虑农村劳动力人均完成土石方数，四川、云南、甘肃分别为 61 立方/人、94 立方/人、288 立方/人，不仅远低于河南、河北、山东和安徽的水平，而且四川和云南的劳均数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

可见，农田水利建设规模更大的省区并不像川云甘那样首先爆发饥荒，高强度劳动并非触发饥荒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在农村“大跃进”运动初期，由于粮食供应比较充裕甚至在公共食堂制度下过度消费，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等高消耗工程并没有立即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只是在口粮供给紧张之后，农民既要从事高强度劳动却又因干部克扣等因素而造成营养不良致死。

[12] 即新增灌溉面积占当年总灌溉面积的比重，下同。
[13] 数据来源同图 2。
[14] 全国平均水平为 231 立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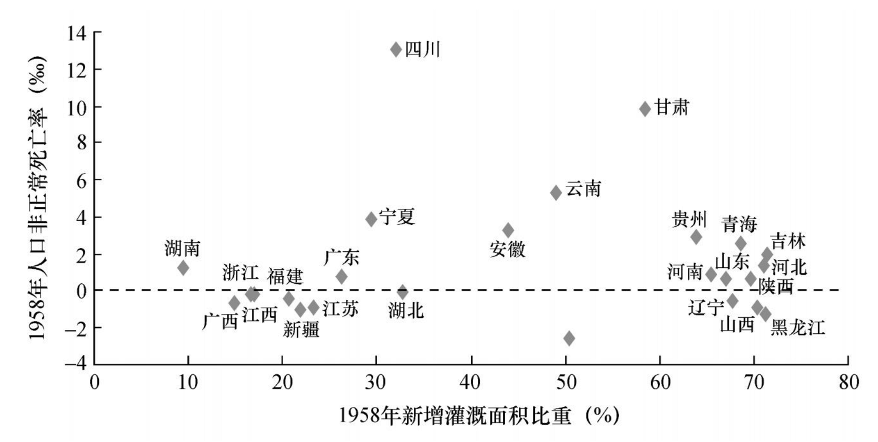


图 2　1958 年各地区新增灌溉面积比重与非正常死亡率

数据来源：农业部计划局（1959，**第** 296 **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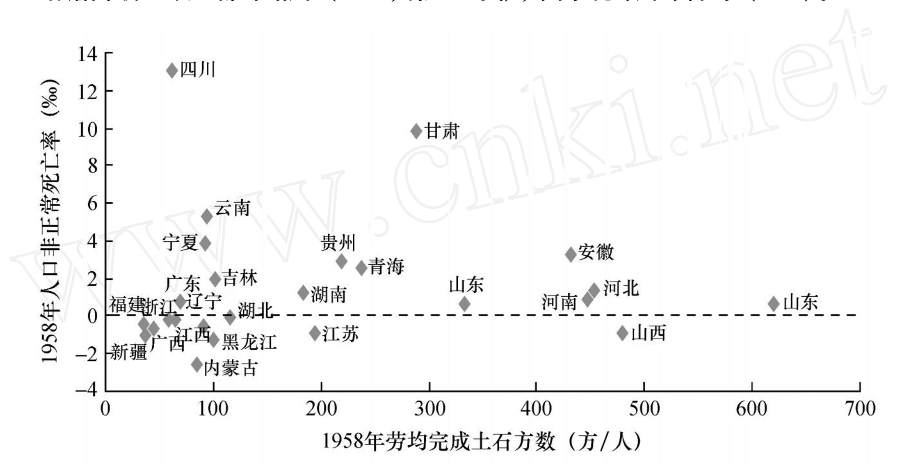


图 3　1958 年各地区农村劳均完成土石方数与非正常死亡率

数据来源：农业部计划局（1959，**第** 32—33、296 **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我们认为，强制性公共食堂的粮食浪费是触发饥荒的重要成因。对于公共食堂制度的粮食浪费，许多研究者半信半疑。[15]《退堂权》一文引用的薛暮桥对 1958 年农民浪费粮食的数据是可信的。如表 1 所示，在饥荒最轻的江西省，据丰城县小港公社张家洲村 1961 年的调查，公共食堂通过公社加工厂对稻谷脱皮加工、生产队分粮两项即克扣掉农民口粮 2.72%；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粮食共计 1 302.5 斤，占口粮总数的 2.16%；食堂保管员称米下锅、量饭、贪污饭票等项又占口粮总数的 2.03%；炊事员明吃暗偷、生产队派员外出搞副业粮食补贴及请木匠、篾匠修补添置农具所需粮食和管理损耗等项又

[15] 例如，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在 2009 年 12 月 18 日关于《退堂权》一文的宣讲会上质疑说，根据“四清”时期的数据，公共食堂时期农村干部多吃多占的程度并不如想象中严重。

占口粮总数的 0.92%。可见，张家洲村公共食堂制度使农民口粮减少了 9.8%。江西省公共食堂制度普及率低且激进程度轻，而且 1961 年春公共食堂制度已经比较松散，张家洲村公共食堂 9.8%的粮食损耗应该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薛暮桥估计 1958 年农民因公共食堂浪费粮食 350 亿斤，相当于农村留粮的 11%，占农民粮食消费总量的 16%，[16] 这一估计是可信的。

表 1 江西省张家洲村公共食堂盘剥农民口粮方式及其占农民口粮比重

江西省张家洲村公共食堂盘剥农民口粮方式	占农民口粮比重(%)
①每 100 斤应出 73.5—74.5 斤米的稻谷,经公社加工厂加工后,只能得到 70 斤或 72 斤米	1.96
②到生产队又一律只按 70 斤的标准折算给社员,而且从加工厂得来的每 100 斤稻谷 1 斤的碎米也不下分	2.72
③生产队干部近 1 年来吃夜餐和到大队、公社开会吃双份粮,以及其他一些名目的贪占,私分大米或粮食 1 302.5 斤	2.16
④保管员称米下锅、量饭、贪污饭票等	2.03
⑤炊事员明吃暗偷、生产队派员外出搞副业每人每天补助大米半斤,请木匠、篾匠修补添置农具所需粮食和管理损耗等项	0.92
各项合计	9.79

资料来源:龙宇文(1988),转引自黄道霞主编(1992,第 586 页)。

二、饥荒加剧

食堂对饥荒加剧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首先，食堂本身的消费低效率和为干部贪污、侵蚀农民口粮大开方便之门减少了农民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口粮；其次，食堂制度代表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使农民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丧失殆尽，使粮食生产连年下降，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短缺。

Kung and Lin (2003)、范子英 (2010) 均认为公共食堂制度并未得到一贯的执行，因此其对饥荒的作用可能被夸大。对此，《退堂权》一文指出，公共食堂确实经历了“一哄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央批准退堂权、食堂全面解散”四个阶段。其中，大批散伙发生在 1959 年春至庐山会议之间，是中共中央在 1958 年“大跃进”狂潮之后、庐山会议结束之前应对春荒的纠偏措施之一。[17] 然而，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和定罪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当时，坚持办公共食堂成为判断农民是否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不少在 1959 年春纠偏工作中解散公共食堂的地方领导受到了批判。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公共食堂又在全国上下被强令恢复。[18] 尤其

[16] 1958 年农村粮食占有量为 3 165.5 亿斤,农村消费量 2 152 亿斤(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 343、538 页)。
[17] 1958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提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黄道霞,1992,第 567 页)。
[18]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 7 月 23 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

是，庐山会议是在夏收完成、粮食上场、饥饿短暂缓解的背景下召开的，这为毛泽东强令恢复食堂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据国家统计局 1960 年 1 月份统计，截至 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 391.9 万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 4 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比例仍高达 72.6 %。而且，在四川、河南、安徽、云南、贵州等饥荒重灾区，公共食堂参与率均超过 90 %。[19] 1958 年年底全国 90 %的农村人口加入了公共食堂，[20] 是农民为吃饭不要钱所吸引，在未能预料其致命弊病的情况下对这种新制度产生一时热情所致；[21] 至 1959 年年底农民已饱受公共食堂制度的危害，仍有 72.6 %的农民被迫加入公共食堂。可见，庐山会议后人民公社不是放松而是加剧了公共食堂的强制性。

一旦食堂存粮告罄，难以为继，很多地方的食堂确实名存实亡，但这并不意味着食堂的危害就解除了。如《退堂权》一文所述，在一些激进地区，在公共食堂无粮可吃时，干部仍禁止农民采集野菜充饥；即使允许采集野菜，也要求上交食堂。在粮食收获之后，口粮供应稍微宽松之际，地方干部即在上级部门的压力下强令恢复食堂。[22] 兴建公共食堂的本意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在无粮可吃情况下允许食堂名存实亡，实际上是人民公社推卸提供口粮的责任；在粮食收获后再次强制恢复食堂，食堂浪费及干部多吃多占又提前耗掉了农民本可维持到下个收获季节的口粮。因此，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陷入了“缺粮解散 - 有粮恢复 - 加剧缺粮”的恶性循环。

《退堂权》一文以地区年底猪存栏数变化衡量该地区公共食堂制度的激进程度。杨涛（2010）认为，当饥饿夺走农民生命时，屠宰牲畜充饥是必然现象，因此猪的存栏数与地方死亡率存在负相关，但不是来源于刮共产风宰杀吃掉家畜的途径。范子英（2010）则提出公共食堂这一变量存在严重内生性，即有一些因素（如大规模耗用劳动力参加水利工程）影响到公共食堂的执行力度，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死亡率；用猪存栏数来代理公共食堂，其包含的噪音比公共食堂本身还多。

以猪存栏数作为公共食堂代理变量，有其合理性。影响猪存栏数的因素有三：家畜流行病状况、饲料粮数量及家畜饲养模式。第一，在大饥荒时期，未发现人和牲畜爆发大规模流行病的记录（人浮肿病除外，实质是因营养不

---

[19] 文贯中和刘愿(2010)。

[20] 罗平汉(2001，第 36 页)。

[21] 胡代光(1958)根据北京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总结了对待公共食堂的三种态度：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多而劳动力少者，妇女特别是青壮年妇女，以及口粮标准低的缺粮户积极拥护赞成；富裕中农，以及有格外收入的家庭，懒汉表示反对；另外 1/3 的人采取观望态度，盘算着在公共食堂吃饭比在家里省钱时则愿意加入，否则不来。

[22] 即使在饥荒较轻的江西省，公共食堂制度的强制性仍得到普遍执行。在丰城县小刚公社张家洲村，1961 年春节发给各户半个月的粮食分户吃饭，春节后农民都不愿吃食堂了，纷纷要求继续分户开伙。结果，生产队长被公社、大队干部批评了一通，大队干部李公华说：“不办食堂就不发口粮。”最后，社员们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又回到食堂吃饭。(龙宇文，1988。转引自黄道霞主编，1992：第 585 页。)

良所致)，因此因素一可视为不变。第二，虽然我们的计量模型未给出饲料粮的数量，但已控制了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这可作为饲料粮的代理变量。因为在大饥荒时期，饲料粮在农村留粮中所占比重是稳定的（至少不会下降)，即农村留粮的变动同时也反映了饲料粮的变动。第三，大饥荒时期猪存栏数大幅度下降，饲养模式由家庭饲养转变成公共食堂饲养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公共食堂初期，共产风迫使农民不得不提前宰杀生猪过量消费；公共食堂办集体养猪场，生猪由私产变成公产，即使公共食堂指定专人负责亦因照料不周而加剧死亡。[23] 在公共食堂解散后，自留地及家庭副业恢复，生猪恢复家庭养殖，导致存栏数增加。

在饥荒的情况下，不排除个别农民因饥饿难忍而杀猪充饥，但这种现象在“大跃进”饥荒时期并不普遍。在公共食堂制度下，生猪作为集体财产受到的保护更甚于农民的生命。在信阳事件中，遂平县嵖岈山公社李尧大队死了一头老母猪，饲养员宋和因偷吃死猪受到吊打游街最后死亡的惩罚；韩楼大队一个老农饿得没办法，偷杀了一只羊被发现后被逼游街吊打最终惨死。[24] 类似案例普遍发生在大饥荒时期。因此，农民宰杀生猪主要发生在公共食堂建立初期共产风兴起之时，在饥荒加剧及后期，包括猪在内的家畜家禽的生存权甚至优先于农民的吃饭权。

官方文件证实了公共食堂制度导致猪存栏数减少。1959 年 6 月 30 日，吉林省委发布文件承认，办全民食堂矛盾较多，社员家庭没有泔水，养猪有困难；[25] 在庐山会议上，周小舟也认为食堂不利于养猪。[26] 1961 年 4 月胡乔木在湖南韶山公社调研后指出食堂的弊病之一是“不利于养猪等家庭副业”。[27]《退堂权》一文的实证模型同时考虑了地区粮食生产、粮食净征购、重工业发展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其他激进政策因素，以猪存栏数的变动较准确地反映了公共食堂因素对饥荒的作用。[28]

三、饥 荒 结 束

“大跃进”饥荒在粮食增产背景下爆发，同样令人疑惑的是，饥荒却是在

[23] 例如，1958 年秋起安徽省农村公共食堂大办养猪场，其中 1960 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区 5 个公社建立 15 个万头养猪场，每个大队建立一个千头养猪场，每个生产队建立一个百头养猪场，还要建立若干个养鸡场、养鸭场。为此，强迫社员交出自己家庭的猪羊鸡鸭，强迫社员搬家拆房盖猪圈，结果集中起来的猪羊鸡鸭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数干部偷吃偷卖了(杨继绳，2008，第 279—281 页)。

[24] 杨继绳(2008，第 55 页、56 页)。

[25] 杨继绳(2008，第 322—323 页)。

[26] 杨继绳(2008，第 671 页)。

[27] 见《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胡乔木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 年。

[28] 关于“大跃进”饥荒成因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参见刘愿《中国“大跃进”饥荒成因再辩——政治权利的视角》一文的论述。

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最低值时结束的。[29] 范子英等 (2008) 提出"大跃进"饥荒的达尔文效应是饥荒结束的原因：饥荒淘汰掉能力最弱的群体，剩余人口的抵御能力较高，因而较易走出饥荒。他们的 Probit 模型发现各省 1964 年人口普查时年龄在 14—43 岁人口的比例 (Yong)、饥荒年份累计的非正常死亡率 (CEDR) 对于饥荒结束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未发现公共食堂因素对饥荒结束的显著作用。范子英 (2010) 进一步指出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结束饥荒的作用。

实际上，《退堂权》一文所定义的公共食堂制度包括三层含义：口粮强制集体化、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是因为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出对口粮的数量和质量有极大的调节作用，因而为了控制口粮，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存废就必然与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的成败密切相关，而解散公共食堂则必然导致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恢复。这三位一体的制度的废除对于饥荒竟在农村粮食消费量降至最低水平的情况下突然结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强制性食堂的解散必然提高粮食的消费效率，而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合法化必然提供及时的食物补充。范子英提出的大饥荒的达尔文效应假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作为饥荒最严重的四川省，累计死亡率最高，但饥荒却结束得最晚。[30] 因此，饥荒结束的达尔文效应假说值得商榷。

首先，如果"大跃进"饥荒存在达尔文效应，剩余的人口不仅要比那些死亡的人口抵御能力更强，而且在口粮下降的情况下，要比自身在饥荒前的状况更优，并至少应反映在粮食生产的增加和其他相关指标的回升上。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饥荒的受害者主要集中在农村，那些剩下的人口基本上是在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下挣扎幸存下来的，其身体素质可能好于那些死亡的人口，但绝不可能优于自身饥荒前的状况。事实是，除了高级干部和少数高级知识分子获得特需供应之外，普通城市居民在饥荒年代也因口粮不足、营养不良而身体素质下降，[31] 普通农民在饥荒后期身体状况之糟糕可想而知，饥荒对幸存者身体状况的破坏影响深远。[32] 因此，饥荒的结束并非幸存者身体更强壮所致。

其次，范子英等 (2008) 以 45 岁作为分界线划分老年人和青壮年，根据 1953 年、1964 年两次人口普查年龄结构的变化说明饥荒的达尔文效应。实际上，这种粗略的划分未能准确反映饥荒对不同年龄人口影响的相对大小。如

[29] 见文贯中和刘愿(2010)。

[30] 四川省 1958—1961 年累计非正常死亡率高达 113.5‰,比排第二位的贵州省的 59.1‰高出近一倍。在其他地区 1962 年死亡率已低于饥荒前的水平时,四川省 1962 年非正常死亡率仍然高达 4.1‰,饥荒结束得最晚。(Chang and Wen, 1997, p. 24。)

[31] 例如,崔柏森 1961 年任第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副所长兼工程师,因口粮不足几次差点晕倒,夫妻俩都因营养不良患上浮肿病(杨继绳,2008,第 563 页)。

[32] Chen and Zhou (2007) 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个体数据研究发现,"大跃进"饥荒对幸存者产生了严重的健康和经济后果。Almond *et al.* (2007)、Xin and Qian (2009) 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图 4 所示，人口学家常用人口年龄结构图反映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变化。如果人口寿命无异常变动维持平稳状态，两次普查期间人口年龄结构应该是对称的。图 4 显示青壮年和婴幼儿两个年龄段人口在饥荒时期遭受严重损失，儿童期人口幸存比例增加。图 5 准确刻画了两次人口普查时各年龄段人口比例的变化。如图 5 所示，饥荒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导致 0—1 岁人口比例骤升。饥荒时期人口生育能力下降导致婴儿延迟出生及幼儿营养不足而夭折，2—5 岁人口比例显著下降。6—17 岁人口比例的二普数比一普数大幅度增加。18 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的二普数均小于一普数，[33] 其中，18—25 岁人口比例降幅最大。考虑到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离饥荒的爆发及结束间隔了 3—5 年，因此，“大跃进”饥荒中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 13—22 岁，幸存人口主要集中在 1—12 岁，范子英强调的饥荒后人口结构优化并不显著。[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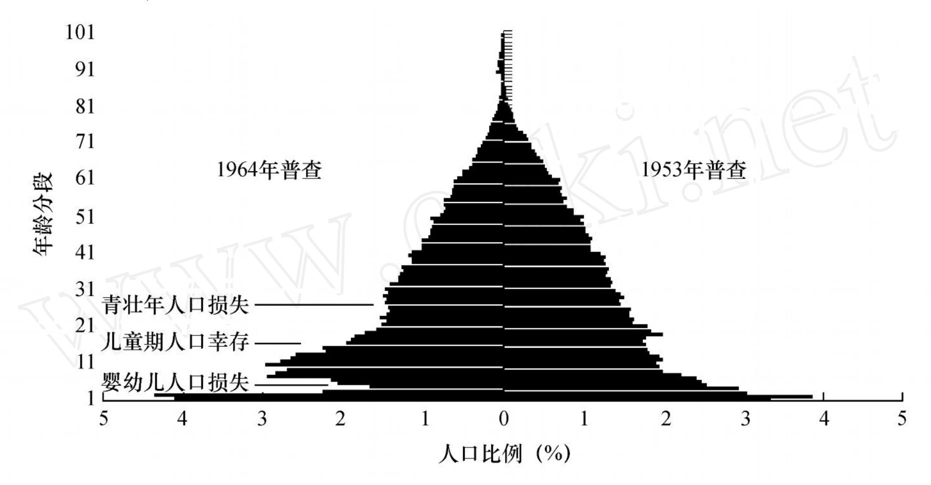


图 4　1953 年、1964 年人口普查年龄结构金字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1988，第 478—481、602—605 页）。

最后，范子英等（2008）的实证模型结果并不能证明“大跃进”饥荒存在达尔文效应。饥荒结束的真正原因是，累计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在饥荒后期政策转向（尤其是公共食堂制度）更加迅速和彻底。《退堂权》一文在分析饥荒结束的原因时比较了安徽和四川的情况。四川和安徽的累计死亡率位列全国各地区之首，[35] 按照达尔文效应理论，四川应该最早结束饥荒。但事实上，

[33] 例外情况是，26—27 岁、30—31 岁人口比例二普数略高于一普数。

[34] 范子英等(2008)之所以得出小于 45 岁人口比例二普数略高于一普数，原因是 6—17 岁人口比例增加的幅度远超过 18—45 岁人口比例下降的幅度，从而产生了饥荒使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假象。饥荒这种对不同年龄人口影响的机制是：对于那些 1—12 岁的人口而言，其维持生存所需的日热量摄入量较低，而且中国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使家庭可能将异常紧缺的口粮留给子女。13—22 岁人口之所以在饥荒中不容易存活，原因可能是这一年龄段人口维持生存所需的日热量摄入量较高，而且还可能从事高强度的劳动。

[35] 四川累计非正常死亡率为 113.5‰，为各地区首位；安徽累计非正常死亡率为 58.9‰，仅次于贵州的 59.1‰，位列第三(Chang and Wen，1997，p.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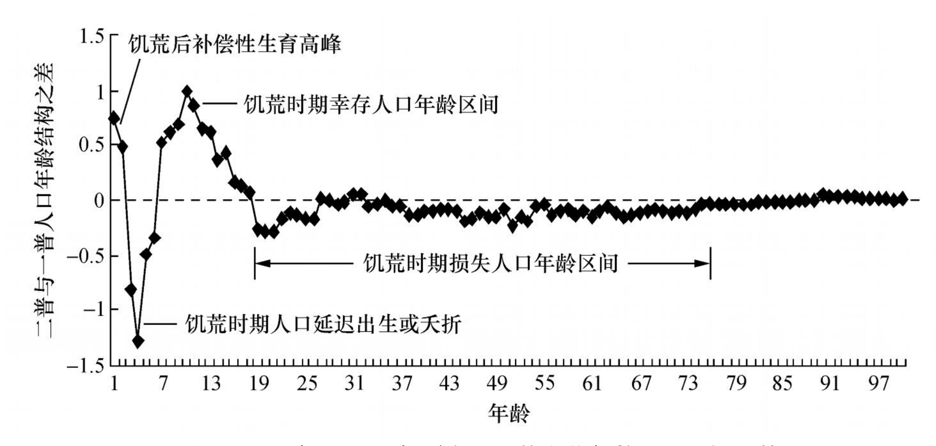


图 5　1953 年、1964 年两次人口普查分年龄人口比例之差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1988，第 478—481、602—605 页）。

四川的饥荒发生得最早（1958 年秋冬起），却结束得最晚（1962 年仍有饥荒发生）。[36]因此，达尔文效应理论无法解释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省的情况。安徽省在 1960 年人口非正常死亡率达到 56.9‰的最高值后，1961 年迅速结束了饥荒，[37]但原因不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而是安徽省政策在 1961 年转变得非常迅速和彻底，包括提前解散公共食堂及随之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甚至推广了包产到户的耕作模式。可见，除了四川省坚持公共食堂制度外，其他地区因为遭受饥荒，在中央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形下必然会改变政策，累计死亡率越高的地区，政策转向越迅速越彻底，饥荒结束越快。

概言之，饥荒结束的真正原因，不是累计死亡率所引起的人口结构变化，而是在中央政策有所松动的情况下，累计死亡率过高所引起的以解散公共食堂及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为主的政策转向。

四、总结：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实质意义

在肯定“大跃进”饥荒其他成因的基础上，《退堂权》一文突出强调了三位一体的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退出权的失而复得在饥荒爆发、加剧和结束中的关键性作用，这可看做是对杨涛提出的集权、计划严重失误及政治行为是大饥荒的三大成因的向前推进和具体化。中国在 1949—1978 年的 30 年间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激进主义政策和集权加剧的过程。但在种种政治激进主义政策中，不管在其他方面如何激进，只要没有强制性公共食堂作为这种激进主义的主

[36] 在其他各地区饥荒均已结束之际，1962 年四川非正常死亡率仍然高达 4.1‰（Chang and Wen，1997，p. 24）。
[37] 1961 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率为 -3.5‰，表明安徽省在该年即迅速结束了饥荒（Chang and Wen，1997，p. 24）。

要内容, 饥荒就没有发生。公共食堂将集权体制发挥到极致, 农民因此丧失了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吃饭权。这在饥荒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也是中国"大跃进"饥荒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人口损失的根本原因。强制性公共食堂制度的实质是, 国家和集体为实现赶超目标剥夺了农民个体的自由选择权, 致使农民陷入一种制度绝境; 公共食堂退出权的实质意义在于, 农民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安排口粮和来自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副食品, 排除了国家和集体对家庭消费的非正义的剥夺。

饥荒, 是人类社会中人际间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 ——部分人可能在粮食产量未显著减少甚至粮食产量增加的情况下因"食物消费水平突然大幅度下降"[38]而死亡。因此, 避免饥荒的方法不仅仅在于增加生产, 更为重要的是要赋予所有个体平等的自由选择权。这或许是上至洛克、休谟、斯密, 下至哈耶克、森等一系列政治哲学家之所以不遗余力阐述自由之重要性的根本原因。

参 考 文 献

[1] 阿马蒂亚 ·森(1981) ,《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年。

[2] Berstein, T.,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3), 339 —377.

[3] 曹树基,"1959 —1961 年中国人口的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 第 1 期,第 14 —28 页。

[4] Chang, G., and G.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 —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1), 1 —34.

[5] Dalrymple, D.,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 —1934", *Soviet Studies*, 1964, 15(3), 250 —284.

[6] 东夫,"'大跃进'时期四川省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2009 年第 1 期。

[7] 范子英、孟令杰,"对阿马蒂亚 ·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2006 第 8 期,第 104 —113 页。

[8] 范子英、孟令杰,"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2007 第 6 卷第 2 期,第 487 —512 页。

[9] 范子英、孟令杰、石慧,"为何 1959 —1961 年大饥荒终结于 1962 年",《经济学(季刊)》,2008 第 8 卷第 1 期,第 287 —306 页。

[10] 范子英,"关于大饥荒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经济学(季刊)》,2010 年第 9 卷第 3 期,第 1151 —1162 页。

[11]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0 —1983)》,1983 年 11 月。

[12] 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 —1979)》,1980 年 5 月。

[13] 哈耶克(1940) ,"社会主义的计算(三) :作为一种'解决方法'的竞争",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

[14] Haggard, S., "Let Them Eat Juche", *The Economist*, May 8th, 2008.

[38] 阿马蒂亚 ·森(2001 ,第 55 页) 。

[15] 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

[16] Kung, J., and J.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1), 51—73.

[17] Lange, O.,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On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36, 4(1), 53—71.

[18] Lange, O.,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Part Two",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37, 4(2), 123—142.

[19] Lin, J., and D.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9(460), 136—158.

[20]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载《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的回顾》。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年。

[21] 绵阳地区农业局,《四川省绵阳地区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资料汇编(1961—1975)》,1976 年 10 月。

[22] O'Grada, C., "Making Famine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7, 45(1), 3—36.

[23] Ó Gráda, C., *Famine: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 Ravallion, M., "Famine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3), 1205—1242.

[25] Rieff, D., "The End of Hunger?" *The New Republic*, December 30, 2009.

[26] 沈志华,"关于 20 世纪 50 年代苏联援华贷款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83—93 页。

[27] 新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

[28] 薛暮桥(1959 年 6 月),"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载《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29] Yang, D.,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evisit the Effect of Free Exit from Communal Dining Halls on the Great Leap Famine

GUANZHONG JAMES WE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rinity College)

YUAN LI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Yang and Fan's comments, we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y following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famine's start, exacerbation and end: Whether the grain

production in 1958 and energy-consuming activities triggered the famine ? How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olidation of the communal Dining halls shortly before and after the Lushan Summit made the famine first lessened and then worsened ? How to measure the impacts of the communal Dining halls ? Was the Darwinian Effect or the policy change that actually ended the famine ? We argue that it is advisable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in human societies such as famines by giving individuals freedom of choice.

JEL Classification N55 , O18 , Q18


藏觀
書察